

区域经济合作与云南省对外开放战略研究
**A Study o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Yunnan
Provincial Strategy for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王 锦

WANG, Jin

博士学位论文
Ph.D

悉尼科技大学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2013**

CERTIFICATE OF AUTHORSHIP/ORIGINALITY

I certify that the work in this thesis has not previously been submitted for a degree nor has it been submitted as part of requirements for a degree except as fully acknowledged within the text.

I also certify that the thesis has been written by me. Any help that I have received in my research work and the preparation of the thesis itself has been acknowledged. In addition, I certify that all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literature used are indicated in the thesis.

Signature of Candidate

Production Note:

Signature removed prior to publication.

目录

Contents

目录	3
摘要	7
Abstract.....	8
绪论	8
选题意义	9
文献综述	12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23
一、研究思路.....	23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23
三、论文基本框架.....	24
第一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研究.....	26
第一节、区域经济一体化概述	26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形态与实质	26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原因与发展现状	30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及其主要内容.....	33
第二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浅析	43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目标及其发展	43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运作原则和机制	44

第三节、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益与增长效益研究	48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	48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增长效应	55
第二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基础分析	58
第一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历程和合作机制	58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	58
二、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合作机制	60
第二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61
一、湄公河次区域五国合作意识的形成与巩固	61
二、湄公河次区域五国经济合作的现实动力基础	64
第三节、亚洲开发银行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作用	66
第四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组织特征和面临的问题	68
一、组织特征—松散型	68
二、面临的问题	69
第三章 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77
第一节、中国加强同东盟经济合作的动因分析	77
一、“两个环境”	77
二、“三个基础”	79
三、“两个事件”	85
第二节、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基础	86
第三节、战略利益观——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理念	89
第四节、中国云南省的后发优势与空间区位优势分析	91
一、关于“后发优势”	91

二、区位和空间区位.....	93
三、为什么云南的空间区位能成为优势？	94
四、中国云南省的“双向桥头堡”作用.....	94
第五节、 区位比较优势转化为区位竞争优势研究.....	95
一、区位优势和区位竞争优势.....	95
二、为什么云南要向高效率区位竞争优势转化？	96
第四章 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战略研究.....	98
第一节、 两条 GMS 经济走廊的概况和特点.....	98
一、南北走廊中线（NSEC1）	99
二、南北走廊东线（NSEC2）	101
第二节、 经济走廊建设的战略意义	104
一、地理区位.....	104
二、经济发展.....	104
三、社会与环境	106
四、政治与安全	107
第三节、 推进经济走廊战略的措施	108
一、 指导原则.....	108
二、经济走廊外延战略	109
三、经济走廊建设的关键环节.....	110
第五章 中国云南省对外开放：桥头堡战略研究	111
第一节、“桥头堡战略”概述.....	111
一、“桥头堡战略”的内涵.....	112
二、“桥头堡战略”的重要意义	113

三、“桥头堡”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与措施.....	116
第二节、“桥头堡战略”与云南省对外开放.....	119
一、从“大、强、道”到“两强一堡”.....	119
二、云南省在“桥头堡战略”中的功能定位.....	121
第三节、“桥头堡战略”实施的国际环境分析.....	123
一、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发展的新机遇为“桥头堡战略”带来有利条件.....	124
二、中国周边形势复杂、严峻、多变，总体上仍是机遇大于挑战，有利于“桥头堡战略”的实施.....	125
三、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的双边关系为“桥头堡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126
四、影响“桥头堡战略”实施的若干因素.....	127
第六章 中国云南省区位优势竞争优势实现的途径研究.....	129
第一节 区位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	129
一、提高交易效率的基础和条件.....	131
二、打破地区封锁，发展国内区际贸易.....	132
三、“走出去”——企业提高交易效率的有效途径.....	134
第二节、初级区位优势向高级区位优势的实现.....	139
一、高级区位优势实现的空间架构.....	141
二、吸引投资 - 中国云南省高效率区位优势实现的重要环节.....	143
第三节、政府在中国云南省区位优势实现中的重要作用.....	146
结语.....	152
参考文献.....	155

摘要

本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博弈论等，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建设，对其贸易效应、直接投资效应、增长效应、收入分配效应以及产业聚集效应等新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文章根据中国云南省特殊的地理位置，着重分析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合作的机制，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动力基础，特别是云南省的战略利益观以及将内地落后省份的劣势转化为后发优势与空间区位优势的对对外开放战略。论文对中国云南省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实现的途径进行了研究，详尽的阐述了区位比较优势转化的基础、条件、架构等重要环节，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在中国云南省区位优势实现中的重要作用。

文章还结合当前国际、区际繁杂多变的形势，特别是 2008 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财政危机，以及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现实影响，把中国云南省对外开放战略放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中进行考察，把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合作提到对外开放战略高度进行考察，把中国云南省对外开放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作用纳入到桥头堡战略进行考察，突出了中国云南省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Abstract

Applying relevant theor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c geography and game theory, this thesis is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Zone, including its effects on trade, investment, growth,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The thesis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foundation and mechanisms of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as well as the driving forces for China's Yunnan Province to take part in this cooperation based on its geographical advantage. The thesis further explores how the strategic interests of cooperation is perceived by Yunnan Province and how Yunnan Province has formulated its strategies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to transform its disadvantages as an under developed inland province into its geographical advantage and late-comer advantage.

The thesis also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Yunnan Province in China's overall strateg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It provides an observation of Yunnan in the wide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ince 2008 and the American strategy of returning to Asia; it takes Yunnan Province'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overall strategy in deal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t explores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Yunnan Province as a "two-way bridgehead" on the international thoroughfar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绪论

选题意义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空前加深。尤其是在世界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异军突起。WTO 公布的数据表明，截止 2007 年 7 月，报告给 WTO 的区域贸易协定达 380 个，其中，正在实施的 205 余个。区域贸易协定内部的贸易总量占到全球贸易总量的 2/3，其中北美和欧盟的区域内部贸易量超过了世界贸易总量的一半。¹中国也已较快的步伐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

2001 年 11 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文莱出席第五次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英文缩写为“ASEAN”）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与东盟 10 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将在 10 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这是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不断发展的现实需要，体现了双方加强贸易合作的共同愿望。2002 年 11 月，朱镕基总理在金边出席的第六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与 10 国领导人就《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达成一致。在金边，朱镕基总理参加了首届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并与其他 5 国领导人签署了《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联合宣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应发挥的作用，中国与东盟双方已将其作为重要的领域合作之一，其战略地位也发挥了重要变化。

温家宝总理参加了 2005 年和 2008 年两次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第二次领导人会议确立了以“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注重实效、循序渐进”为主要内容的合作指导原则，次区域合作由此迈上新台阶。第三次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加强联系性、提升竞争力”的主题，就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运输便利化，构建伙伴关系、促进贸易投资，开发人力资源、增强竞争力，环境管理等合作构想交换意见，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进入了实质性合作阶段。

世贸组织总干事素帕猜曾说过：“中国和她的邻国之间的一个潜在的合作区域是大湄公河流域区域包括中国西南省份—云南。”²位于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结合部的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缘环境，成为中国在该区域经济合作的参与

¹刘方、张立韬：《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内蒙古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 1 月

²《广西“东盟热衷的冷思考”》，新华网广西频道 12 月 11 日电。

者，从1992年就开始作为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主体，参加了亚行倡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多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当前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多哈以及坎昆多边贸易合作谈判陷入僵局，全球化的贸易自由化前景难测，区域合作越来越成为国际合作的主流，中国云南省更深刻的感受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冲击。2001年中国政府提出次区域合作的目标是“把湄公河次区域构筑成我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把湄公河次区域构筑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行示范区。”

2009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景涛在云南省考察工作时指出，“要充分发挥云南作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的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是云南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³依据这一讲话精神，同年12月，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会提出了云南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⁴的战略目标。

中国云南省面向西南开放，主要是以中国—东盟—南亚、东南亚国家为重点，面向印度洋沿岸，延伸至西亚及非洲东部等广大区域的对外开放，可以表述为“一洋四区”。该区域涵盖约56个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能源矿产和农林渔资源，市场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巨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中，南亚地区8个国家，陆地面积约482.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5.5亿，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东南亚地区10个国家，陆地面积约447.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7亿，GDP总量约1.4万亿美元。⁵中国云南省的对外开放战略就是要充分发挥云南的地缘优势，在中国面向西南开放中先行一步，使云南省成为中国从陆路沟通东南亚、南亚，直达印度洋的通道，成为交通、电力、通讯的门户枢纽，成为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中国面向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外向型产业基地和进出口商品加工基地，成为对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窗口。因此，对加强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建设；加快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发展；把云南省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这一系列对外开放战略的研究与探索对进一步改善云南省对外开放条件，有利于更好发挥毗邻东南亚、南亚的区域优势，跨境而居民族的文化优势和源远流长的世代友好交往优势，不断深化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全方位开放合作，深入落实“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方针，切实增强云南省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推动云南省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加快“走出去”步伐，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水平，扩大

³谭晶纯，谢炜.《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新目标振奋人心》《云南日报》2009年12月13日。

⁴白恩培《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云南日报》2009年12月21日。

⁵吴红缨，陈勋儒《将云南建设成为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3月8日。

利用外资规模，加快改变云南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封闭落后面貌具有重要的现实与深远的战略意义。

文献综述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现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趋势之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并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垫脚石，虽然是否能增进全球福利水平，均尚未形成定论。但各经济体通过选择合适贸易伙伴来建立经济一体化组织，以期获得贸易投资及促进经济发展机会，却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研究也在不断拓展。

Viner-Meader 理论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是《关税同盟理论》该理论是由 J. Viner 提出，经过 Meade 等人的扩展，形成 Viner-Meader 框架，着重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对区域内成员方及区域外国家的影响。

关税同盟理论的前提假设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似，即在完全竞争与产品同质的假设下，要素只在各国国内而不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运输成本忽略不计；关税是贸易管制的唯一形式，并为了方便研究且只考虑从量关税；价格能准确反映生产的机会成本；贸易收支平衡；资源充分利用；世界市场产品供给具有充分弹性。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的贸易由生产率差异和要素禀赋差异所导致的比较优势推动，因此生产结构与成本差异是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出现的原因。这事实上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分配效应。⁶

以关税同盟理论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传统理论着重分析成员方参与经济一体化后的贸易流和贸易条件变化。从贸易流来说，该理论主要创造性地提出了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与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的概念，用于衡量一体化组织成立对贸易流量和贸易方向的影响；从贸易条件看，它主要考察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Viner 在《关税同盟问题》中考察了关税同盟对贸易流的影响，认为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是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共同作用的结果。⁷ Meade 发展了 Viner 模式并首次提出关税同盟的消费效应，并从贸易创造效应中分离出生产效应。⁸

⁶ Richard E. Baldwin, Anthony J. Venable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Gene M. Grossman and Kenneth Rogoff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III.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1995, pp.23-56

⁷ Viner J.: *The Customs Union Issu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ress, 1950.

⁸ Meade, J.: "The Theory of Customs Union", North-Holland Amsterdam, 1955.

Johnson、Copper 和 Massell 则进一步论证了在 Viner 模型框架下关税同盟劣于单边关税削减的福利效应的结论，强调只有将“公共产品”引入福利效应分析，才能真正得出关税同盟的全部福利效应。⁹

与此同时，Cooper 和 Massell 也利用对公共产品的分析对关税同盟理论进行了扩充。他们认为，政府可能出于非经济因素考虑而保护国内市场，为此政府保护也会付出代价。¹⁰ Johnson 考察了关税同盟对公共产品的集体性消费带来的福利影响，认为提高公共产品福利也可能是加入关税同盟的动机之一。¹¹

PEM、GEM 均衡模型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贸易流的实证分析，主要是通过事前估计 (ex ante) 和事后 (ex post) 两种方法。事前估计目的是预测 RTA 的成立将带来的效果，主要是建立局部均衡模型 (PEM) 或者一般均衡模型 (GEM)。局部均衡模型的研究思路是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立前后伙伴国与非伙伴国对某一类商品的收入需求弹性的变化，来衡量成立 RTA 对贸易流的影响。从收入需求弹性变化角度分析问题是为了消除 RTA 成立后由于成员方经济增长而对贸易流量产生的影响，Balassa 通过局部均衡模型对欧共体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进行了系统分析。¹² 目前主流的做法是用含有某类商品需求价格弹性或经济一体化组织内外的进口需求回归模型 (DRA) 对以上弹性进行回估，再代入表达式中求解。(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局部均衡模型不能有效确定各种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这会极大影响估计的结果。)

通过考虑各部门间的联系，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可以获得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国与非成员国全面的经济冲击的结论。但是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假设严格，而且对数据的细分程度十分敏感。因此，一般均衡模型由理论上升到实际应用还存在相当的困难¹³。尽管如此，学者们分析了欧洲单一市场的经济效应，还有学者通过一般均衡模型估计了欧盟东扩对欧盟及世界相关各方的经济冲击。¹⁴²⁰

⁹ Johnson, H. G. : “An Economic Theory of Protectionism, Tariff Bargain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Customs Un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3, 1965, pp. 256-283;

Cooper, C. A. and Massell, B. F. :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Customs Un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3, 1965, pp. 461-476.

¹⁰ Cooper, C. A. and Massell, B. F. :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Customs Un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3, 1965, pp. 461-476.

¹¹ Johnson, H. G. : “An Economic Theory of Protectionism, Tariff Bargain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Customs Un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3, 1965, pp. 256-283.

¹² Bela Balassa: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blems and Issu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May 1963, pp.175-184

¹³ Richard E. Baldwin, Anthony J. Venable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Gene M. Grossman and Kenneth Rogoff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III.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1995, pp.28-56

¹⁴ Samson, Ivan and Greffe, Xavier: “Common Economic Space: Prospects of Russia-EU Relations”, *White Book, Russian-Europea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Moscow, October

世纪 90 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GTAP) 也是基于一般均衡模型开发的, 该模型配有专门的软件, 可以很方便的分析区域贸易协定相关方福利的影响, 中国学者李众民运用该方法模拟了中国与不同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的影响。¹⁵

引力模型与虚拟变量

事后评估主要是通过引力模型, 使用虚拟变量对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进行拟合, Tinbergen 首先在引力模型中使用虚拟变量。¹⁶ Frankel 和 Wei 使用两个虚拟变量, 即用一个虚拟变量拟合一体化组织成员国的外部贸易, 如果第一个变量的系数显著的为正, 那么可以认为经济一体化组织出现了贸易创造, 如果第二个变量的系数显著的为负, 则经济一体化组织出现了贸易转移, 这两个系数之和给出了一体化组织对贸易流量的净冲击效应。¹⁷此外, Soloaga 和 Winters 使用了三个虚拟变量, 他们用第一个虚拟变量拟合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贸易, 第二个拟合成员国的外部出口, 而最后一个拟合成员国的外部进口。如果第一个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 那只能证明经济一体化组织成立后, 成员国之间总的内部贸易量增加了。但是, 如果此时第二个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 那么说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减少了对非成员国的出口, 增加了对成员国的进口, 发生了出口方向的转移, 即出现了贸易创造; 同理, 如果此时第三个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 那么成员国减少了对非成员国的进口, 增加了成员国的进口, 即可认为出现了贸易转移。¹⁸

利用虚拟变量拟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会出现虚拟变量难以完全拟合要素的因素, 会将其他没有能进入模型的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全部归因于模型中的虚拟变量, 从而忽略其他一些重要的解释变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有必要在引力模型中构造新的变量结构, 来更精确地考察一体化组织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在实际中, Michaely 设计了一套旨在考察潜在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的指数, 这套指数的优点是从成员国的生产和贸易两方面的实际数据计算出该国的生产和贸易结构, 并以此作为判断经济一体化贸易效应的基础, 避免了使用虚拟变量。世界银行及其他一些学者在研究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效应时, 已经在使用 Michaely 指数。

2002, pp.7-15.

¹⁵ 李众敏: 《中国区域贸易自由化战略研究》, 《世界经济》2007 年第 2 期, 第 71-115 页。

¹⁶ Tinbergen, Jan: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Suggestions for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Press, 1962, p. 134

¹⁷ Frankel, Jeffrey and Wei Shangan: "Trade Blocs and Currency Blocs", NBER *Working Paper*, No. 4335, 1993.

¹⁸ Soloaga, Isidro and Winters, Alan L.: "Regionalism in the Nineties: What Effect on Trade".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2183, 1999.

贸易条件分析

有的学者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外谈判实力变化、贸易规模大小、对外开放程度高低、劳动生产率和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等途径研究贸易条件。

Kemp 和 Wan 等分析了关税同盟的开放程度对贸易条件影响。如果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规模越大，那么关税同盟成立后来自非成员国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可能越多，从而越有利于改善成员国贸易条件。Kemp 和 Wan 认为即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外部贸易条件的改善不足以补偿内部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损失，也可以通过内部的转移支付补偿这种损失。¹⁹

Scitovsky 研究了生产效率变化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促进生产效率提高，但是生产率的提高引起一般物价水平下降出现在出口部门，则不利于关税同盟的贸易条件改善；如果生产率的提高引起的物价水平的下降集中在进口竞争部门，则有利于关税同盟的贸易条件改善。²⁰

从实证分析看，由于价格指数的统计资料难以获得，所以有关贸易条件的实证研究成果很少。有代表性的是 Winters 与 Chang 分析了西班牙加入欧盟后，区域贸易协定伙伴国与区外非伙伴国之间在 Bertrand 垄断竞争模型时的贸易条件效应；²¹而 Chang 与 Winters 则在相同前提下研究了巴西加入南方共同市场后的贸易条件效应。²² Lipsey 通过无差异曲线、Wonnacott 使用提供曲线都证实成员方加入一体化后，即使存在贸易转移效应，但是如果贸易条件改善，该成员方依然可以从加入一体化中获得福利水平的提升。²³因此，Viner 理论只有和贸易条件的分析相结合，才有实际价值。

Lipsey 认为一体化组织建立之前各成员国相互间的进口关税水平越高，建立后的贸易创造效应就越大，而建立后统一的对外关税水平越低，发生贸易转移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小；²⁴ Balassa 的研究表明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之前各成员国相互间的产品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越大，一体化组织建立后的贸易创造效

¹⁹ Kemp M. and H. Wan: "An Elementary Proposition Concerning the Formation of Custom Un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6, No. 1, 1976, pp. 95-97.

²⁰ T. Scitovsky: *Economic Theory and Western European Integ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23.

²¹ L. Alan Winters and Chang Wo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mport Pri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51, No.2, 2000, pp. 363-377.

²² Chang, Won and L. Alan Winters: "How Regional Blocs Affect Excluded Countries: The Price Effects of MERCOSUR",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Vol. 92, 2002, pp. 889-904.

²³ Lipsey, R. G: "The Theory of Customs Unions: Trade Diversion and Welfare", *Economica*, Vol. 24, 1957, pp. 40-46; Wonnacott, Paul and Wonnacott, Ronald: "Is Unilateral Tariff Reduction Preferable to a Customs Union? The Curious Case of the Missing Foreign Tariff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1, No.4, 1981, pp. 704-714.

²⁴ Lipsey, R. G: "The Theory of Customs Unions: A Survey", *Economic Journal*, Vol. 70, September, 1960, pp. 496-513.

应就越大，而一体化组织成员对非成员出口品的需求弹性越小，一体化组织建立后贸易转移的可能性越小，但不利于经济一体化组织贸易条件的改善，此外一体化组织非成员国对于成员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越小，一体化组织建立后其成员国的贸易条件改善就越明显。²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全球范围内整体关税水平的降低，排他性的区域贸易协定产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导致的福利水平下降，经济体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从追求贸易收益转向追求规模经济、国外投资与经济增长等。区域一体化组织也开始涉足深层次的经济合作，如协调贸易和经济政策，即开展深层次经济一体化；大多数一体化组织由一个大国或集团（如欧盟）与一些小国组成，小国实行单边政策，并在一体化组织建立的谈判中让步较大；而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主流等。因此，Burisher等人指出，深层次一体化与南北型的区域贸易协定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于以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显著特征。²⁶

传统的Viner-Meade框架对贸易创造和贸易转化的分析，是建立在国际贸易是由生产要素和要素禀赋差异推动这一基础上。但是由Krugman等学者创建的新贸易理论，强调国际贸易同样可以源于产品的差异性和规模经济。同时，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中知识外溢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断得到重视。很多学者以这些新理论为基础，并结合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博弈论、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开放宏观经济理论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直接投资效应、增长效应、收入分配效应以及产业聚集效应等新现象进行系统的分析，得到了非常丰富的成果。

根据Baldwin和Venables（2004）的分析框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体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获得经济效应可以归结为分配效应、积累效应和区位效应，其中规模经济效应是分配效应的一种；积累效应包括中期的直接投资效应和长期的增长效应；区位效应则包括产业聚集效应、公司区位选择效应及劳动力流动效应等。

小岛清协议分工理论

日本学者小岛清的协议性分工理论也是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规模经济效应的著名理论之一。²⁷小岛清在考察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分工以后提出，在经济共同体内实行协议性分工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该理论认为，为了使区域内

²⁵ Bela Balassa: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blems and Issu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3, No. 2, May 1963, pp.175-184

²⁶ Burisher M. E. Robinson S. and Thierfelder K.: "Regionalism Old and New,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griculture Policy Reform and the WTO: Where are We Heading?* June, pp.23-26.

²⁷ [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周宝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成员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并能协调地扩大成员国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单纯依靠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是不够的，因为传统的供给分工理论是以成本差异和规模报酬递减为基础的，没有考虑成本相同和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协议性分工理论弥补了这一缺陷。协议性分工的基本内容是，在规模报酬递减的部门，不同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协议，相互提供市场，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签订协议的国家就可以共享规模经济效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及影响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会对成员方与非成员方的国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Kindleberger 开创性的提出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的概念，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²⁸ Kindleberger 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经济一体化组织成立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或者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

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都是在假定成员国同质的前提下开始的，但是同质性国家间的经济一体化这一理论前提存在着较大的现实局限性，因为在现实中，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国家与地区在经济规模、资源禀赋等方面具有差异性是一种常态。Devereux 和 Lapham 就指出同质性假设前提使 Rivera-Batiz 和 Romer 模型的结论是不稳健的。²⁹因此，将“同质性国家”这一前提条件放松为“异质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一体化”，会使理论研究的结果更具有现实意义。

Rivera-Batiz 和 Xie 最早在沿用 Romer 模型空间下假定两个拥有不同人力资源禀赋的国家展开一体化进程，模型结果表明在稳定状态下两国经济增长率是相同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仅仅导致在两国研发部门扩张或收缩的程度不一样，人力资本会在两国重新分配。在异质国家和地区间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框架下，Rivera-Batiz 和 Xie 建立了一个两国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禀赋不同的两国间成立经济一体化的情况，认为经济一体化会重新配置两国的人力资源，从而提高两国经济增长，并最终使得两国的长期增长率趋同。³⁰ Frenkel 和

²⁸ Kindleberger C. P.: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1, 1996, pp. 65-73.

²⁹ Devereux M. and Lapham B.: “The Stabilit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9, No. 1, 1994, pp. 299-305.

³⁰ Rivera-Batiz, L.A. and Xie, D.: “Integration Among Unequal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23, 1993, pp. 337-354

Trauth 进一步研究了各国时间偏好率不同和人力资本禀赋不同情况下的经济一体化增长率效应，得出了相似的结论。³¹

当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使产品和资本市场实现完全自由流动后，根据凯恩斯—拉姆齐定律，知识的溢出效应依然存在。³²两国的消费沿相同增长率的增长路径增长。

对于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来说，比较优势并非唯一影响经济活动区位因素的力量。随着一些经济中心的形成，促进产业聚集的机制也开始生效，进而会导致经济行为的集聚，从而使地理上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

产业聚集来源于产业的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作用 Marshall 曾将向心力概况为知识外溢出效应、各种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及需求与供给的关联，而离心力主要是指与集聚有关的负外部性，包括交通拥挤、污染及大城市的高额租金。³³而 Krugman 则根据新集聚地理学提出的核心—边缘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产业集聚的向心力与离心力，Krugman 认为向心力一般包括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效应。³⁴前者又称为后向联系，是指生产分布的变化会引起歧义相对于生产规模的同向变化，而区域生产规模的变化又会导致生产活动的进一步集中；后者又称为前向联系，是指生产活动向某区域的集中会导致该地区相对价格指数下降，在名义收入相同的前提下，相对价格的下降会使实际收入提高，这会进一步提高该地区的吸引力。而这种向心力会相互促进，使产业集聚得以持续。离心力的主要来源是市场竞争，主要是指由于集聚导致的企业增加会使竞争加剧，从而限制企业的获利能力。

Venables 对跨区域贸易的产业集群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然流动，如果中间品受到规模经济与运费的影响，则生产中间品的厂商必然会位于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也就是下游产业集中的地方。³⁵同理，对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厂商，他们必然选择上游产业集中的地方。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厂商利用产业间的关联关系，形成产业集聚。

³¹ Michael Frenkel and Thomas Trauth: "Growth Effects of Integration among Unequal Countries", *Global Finance Journal*, Vol.8, No.1, 1997, pp.113-128.

³² 凯恩斯—拉姆齐定律即经济一体化均等定律，指经济一体化会引起两国利率水平的趋同。

³³ Marshall A. ,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 Macmillan Press, 1920(1890), p.57.

³⁴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es of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9, 1991, pp.483-499.

³⁵ Venables A.J.: "Equilibrium Locations of Vertically Linked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6.

Perroni 和 Whalley 分析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情况，由于美国的消费市场非常庞大，《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签订使得靠近美国的加拿大和墨西哥边境地区的企业消费市场规模就加速扩大，形成了新的产业聚集。³⁶《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订对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产业布局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两国加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便于进入美国市场。

轮轴——辐条理论

21 世纪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中出现了打破地缘性限制、轮轴—辐条结构等新特点，经济体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取向也越来越多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主要进展出现在对轮轴—辐条效应的解释、对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利益的分析以及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成立动因的思考之上。

Andriamananjara 和 Schiff（2001）³⁷通过构造小国间的合作模型，得出研究结论是传统的贸易收益并不是吸引小国进行合作的决定因素。小国之间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是为了提高讨价还价能力和降低谈判成本。而小国的成本就是向大国提供“单方面支付”，这种单方面支付包括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一些具体让步，以弥补大国国内反对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以及放弃对小国实施贸易报复的权利。

就大国而言，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除了追求经济利益外，还要追求非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又分为贸易利益和非贸易利益。非贸易利益主要是指对外部贸易报复能力及整体国际交易谈判能力。获得非贸易利益要以获得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主导权为基础，即通过增加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筹码，进而获得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成员方的地缘性被不断打破，这使得成员国的交易成本提高，因此非经济收益对成员国就更加重要。Fernandez 和 Portes 为了解释某些国家在明显无法获得满意创造效应的情况下仍然会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了区域性贸易协可能会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这些利益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提高可信度。（2）信息传递作用。（3）增强谈判能力。（4）提供保险。（5）促进协调发展。³⁸

此外，由于大国重视全球战略，大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还为获取包括政治利益在内的非经济效益。相比较而言，小国的非经济收益仅限于从区域经济

³⁶ Perroni, C, Whalley, J.:“New Regionalism :Trade Liberalzation or Insurance?”,NBER Working Paper,No.4626,1994

³⁷ Soaniely Andriamannanjara, Maurice Schiff:“Regional Co-operation among Microstate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9,No.1,2001,pp.42-51.

³⁸ Fernandez, R. J. Portes:“Returns to Regionalism :An Analysis of Nontraditional Gains form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2,No.2,1998,pp.197-220.

一体化组织内部获得稳定的公共产品供给。如欧盟的新加入的小国从欧盟的共同农业、地区发展、能源、安全、外交等政策中收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很多国家相互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由于不同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相互交叉与重叠，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自由贸易区的网络结构。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轮轴—辐条”理论影响很大。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轮轴”国家至少可以在贸易和投资两方面获得特殊的优惠，在贸易方面“轮轴”国的产品可以通过区域贸易协定进入所有“辐条”国市场，而各“辐条”国的产品因受原产地规则（自由贸易区协定的一种规则）的限制则无法相互进入；在投资方面“轮轴”国的特殊地位会吸引外部资本（甚至包括“辐条”国的资本）进入。在小国与大国谈判的过程中，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小国有时会成为两个或更多大国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争夺对象。作为大国争夺对象的小国，此时可以获得特殊的利益，因此小国就有可能成为“轮轴”国，如墨西哥、智利和新加坡这三个小国已经或正在成为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轮轴”国。Baldwin 认为某一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的建立增加了非成员国的贸易成本。³⁹提出“多米诺效应”，导致非成员国也可能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组建新的一体化组织，表现为欧盟的扩大及其他一体化组织的建立，这就产生了第二轮效应。这会推动更多的非成员国参加区域贸易安排，并最终形成了多米诺效应”。Baldwin 认为新一轮的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力量在于“多米诺效应”和“轮轴—辐条效应”的结合，并在古典非完全竞争与规模收益不变假设前提下，分析“轮轴—辐条效应”以及“多米诺效应”对不同国家的福利效应。

自由贸易伙伴的选择与比较优势标准

自从 Viner 开创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以来，经济学家就开始关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的选择标准，但是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未有定论，各种观点也仅仅是限制性条件下的特例。近来虽然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但是并没有给这个问题的讨论最终画上句号。

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伙伴国的选择标准，最早的研究集中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潜在成员国在生产与消费结构上是否互补，以及是否已经是主要的贸易伙伴。由于上述两种标准都比较难以界定，20 世纪 90 年代后，

³⁹ Baldwin, Richard E. Adomino:“Theory of Regionalism”,NBER Working Paper, No.4465,1993.

Baldwin, Haaparanta and Kiander,eds. :*The Domino Theory of Regionalism in Expanding Membership of the European Un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45-253

自然贸易伙伴标准开始流行，即指那些距离很近、可以节约贸易运输成本的国家被定义为自然贸易合作伙伴。⁴⁰

自然贸易伙伴的选择标准，是基于运输成本存在，地缘性强的国家间组成区域贸易集团是正确的选择，而不同洲际间的国家组成的贸易集团很难带来福利的增长；而从技术外溢角度看，随着知识输出与输入国家的距离增加，技术知识对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简称 TFP）的影响是递减的。这一方面说明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发达国家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员方，也意味着在同等条件下，选择近距离的发达国家比选择远距离的发达国家要好。

自然贸易伙伴虽然为解决成员国标准问题提供了个途径，但可行性还不足。Schiff 认为在分析自然的贸易伙伴时，不仅应该分析目标国与潜在伙伴国及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要分析后两者之间的关系。⁴¹但是这却被忽视。正是后两者之间的关系限制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前起决定作用的贸易模式与价格。如果考虑到这点，现存的贸易规模就不会带来“自然贸易伙伴”的结果。就运输成本来说，Amjadi 和 Winters 曾指出，在 MERCOSUR 内部，尽管高昂的运输成本为贸易条件的改善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但很少有可以满足这一改善所需要的贸易模式的变化。⁴² NAFTA 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墨西哥在加入 NAFTA 后某些商品的贸易量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因为美国和加拿大成为了仅存的供应商。

比较优势标准是判断区域经济一体化潜在的成员方的另一主要标准，主要考察成员方之间以及成员方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ROW）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标准不仅能界定一个国家理想的贸易伙伴，而且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后，成员方之间的收入是缩小还是拉大提供判断信息。

比较优势标准假定有两个国家 A 与 B，如果每一国在制造业上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均处于比较劣势，但是其中 B 国较 A 国劣势更多，其中的相对劣势源于地理区位、技术以及制度等因素。如果这两个国家建立经济一体化组织，那么 A 相对于 B 国的比较优势会扩大产量以供应整个一体化组织，或者向此方向发展；而 B 国的制造业则会继续萎缩。这种变化会使 A 国距离自身的比较优势更远，而 B 国离比较优势更近。但结果却是 A 国可以从这种重新分工中获利，B 国会受损，同时与 A 国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原因就在于 B 国遭受到贸易转移之

⁴⁰ Summers, Lawrence H. : *Regionalism and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I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rade and Currency Zones*, Federal Reserve Bank Press, 1991, p.16

⁴¹ Schiff, M. : *Will the Real "Natural Trading Partner" Please Stand up?*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Department Press, 1999, p.8.

⁴² Amjadi, Azita, and L. A. Winters: "Transport Costs and "Natural" Integration in Mercosur",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Vol.14, 1999, pp.497-521.

害，而 A 国却在一体化组织的保护下，通过为整个经济一体化组织提供产品而获得收益。

如果继续将各国的比较优势进行排列，那么比较优势处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将从企业贸易协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比较优势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由于其生产效率高，在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前后都是主要的产品供应商，所以贸易模式不会有很大的改变，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则可能会经历进口来源地的转移。因此，可以推论出发达国家间的一体化会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而穷国之间的一体化则会拉大收入差距。如果参与经济一体化国家的比较优势和世界平均水平差别不大，则它几乎一定可以从一体化中获益。

国家类型标准认为发展中国家在选择经济一体化的伙伴方时，选择发达国家会比选择发展中国家获利更多。穷国之间的一体化不仅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与利益分配不均，而且还会导致政治关系的紧张，这种情形在非洲和南美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曾经多次出现。

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建立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政府信誉的增加，这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直接投资，也可以更便利地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则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要素。从技术外溢角度看，南北型的经济一体化也比南南型的经济一体化要有利。南方国家的 R&D 密集型产业主要从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获得知识；而 R&D 密集度低的行业则从与南方国家的贸易中获得知识。可以推测，南北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发展 R&D 密集型产业是有利的；而南南型一体化对低 R&D 密集度的产业发展有好处。因此，可以认为“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阻碍了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效益，延迟了发展中国家走向高 R&D 型经济。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新动向

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热点，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的前沿主要关注如下这些热点。

首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与 WTO 的关系，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广泛的原产地规则和投资自由化规则对未来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区域贸易安排本质上是否与多边贸易体制相冲突，即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具体产业的影响，随着新的空间经济学的兴起，现在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当各成员国组成区域贸易集团后，由于原有的贸易与产业结构被打破，那么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如何发展；原有的产业和贸易中心的地位是否会遭到冲击；是否会通过产业集中和专业化等方式在一体化组织内部形成新的核心—边缘结构，以及形成的条件等问题。最后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开始，发展中国家就开始和发达国家建立一体化组织，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区

域经济一体化时让步更多，需要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本与受益、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优战略、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特殊利益以及和发达国家组建一体化组织的条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此外，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涉及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移民、法规建设、民主进程、政治目标定位与改革、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调等很多议题。这些议题往往成为某个特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非常关注的问题，对某些成员国的福利水平影响很大，甚至会带来整个一体化组织内部利益格局的大幅调整，属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前沿研究的重点之一。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文是我思考和研究中国云南省对外开放战略定位的成果，也是在 2008 年由美国引发的次贷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对世界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减少金融危机带来冲击的一种探索。研究的主要思路如下：

（一）、通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力图把科学发展观运用到中国云南省对开放战略的制定中去；推动云南省在对外开放方面完成后进地区的追赶战略。

（二）、通过对云南省经济发展现状、困难和产生的原因进行理性分析和思考，并结合云南省对外开放战略的研究，寻找区域产业结构发展变化和特色经济布局的一般规律；提出云南省——大湄公河次区域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内在机理、战略措施、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化优势重构的政策思考。这无论在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上、还是实证研究上都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创新。

（三）、针对中国云南省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完善中国云南省参与和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协调发展的思路，为云南省在新形势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模式。

（四）、通过对中国云南省对外开放战略的研究，特别是对桥头堡战略探索，为中国周边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借鉴，为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而为东亚及泛太平洋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参考意见。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本论文是在近年来从事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和云南对外经济合作研究的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的继续研究。是在这些学者的研究理论和经验总结中的进一步探索和发展。

（二）、经济学分析法

具体来讲，将采用如下分析方法：

- 第一、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适当的地方辅以必要的案例或经济数据进行经验实证分析。
- 第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第三、比较分析法。

（三）、田野调查法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综合性极强的开放性研究，将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

三、论文基本框架

本论文是通过文献综述就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用同期主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对相应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进行解释。并结合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博弈论、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开放宏观经济理论等，对其贸易效应、直接投资效应、增长效应、收入分配效应以及产业聚集效应等新现象进行系统的分析。

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六章和结语八个部分，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提出了本文研究的问题、当前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对文章的结构内容进行了概括性的表述。

第二章首先在界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的基础上，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内容出发，构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共同市场理论、大市场理论、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和综合发展战略理论等。文章分别对这些理论进行了评述，并运用这些理论，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进行了研究。

第三章运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基础进行分析研究。其中重点分析了次区域五国合作意识的形成和巩固，以及合作的现实动力基础。明确提出“东盟意识”的认同是他们合作的前提，发展经济的强

烈愿望是他们合作的强大动力。笔者认为由亚行组织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云南省参与次区域合作的主要方向。

第四章是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提出了中国云南省参与和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顺利进行的基本指导理念——战略利益观。文章认为这既是中国和平崛起大背景的要求，也是现实的需要。而且，这一合作观应该成为次区域各国参与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石。然后，文章分析了基于后发优势基础上的中国云南省的空间区位优势，并指出，中国云南省具有“双向桥头堡”和国际大通道优势。因为中国云南省的区位符合国家对外合作战略的需要才成为优势。建立在空间区位优势上的中国云南省区位比较优势面临着次区域其他国家低成本比较优势的挑战，因此，由区位比较优势向区位竞争优势的转化就成为中国云南省的现实选择。

第五章主要对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战略研究，指出经济走廊建设是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路径和突破口，同时也是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形式，是中国云南省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走廊战略的实现必将加快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并为中国云南省对外开“放桥头堡战略”奠定基础。

第六章重点分析中国云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战略”，指出“桥头堡战略”是中国国家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桥头堡战略”的实施为构筑西进通道，突破“马六甲困局”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性，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突破口。加强“桥头堡战略”的实施对确定中国云南省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解决西南周边复杂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第七章主要分析中国云南省区位优势实现的途径，加强对外开放提升中国云南省经济实力，改变中国云南省经济相对落后的现状，实现中国云南省区位优势是本章研究的重点。本章以“服务东盟、服务中国、发展云南”的基本思路为出发点，积极推进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经济走廊战略、“桥头堡战略”。将区位比较优势转化为高层次的区位优势。本文还对政府在转化中所担任的角色进行分析。

结语部分概括了文章的基本结论、主要创新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第一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研究

第一节、区域经济一体化概述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形态与实质

(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然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解尚无一致的定论。据考证，经济一体化一词是在 1942 年以后才出现，到了 1950 年，一些经济学家将经济一体化定义为单独的经济整合为较大的经济的一种状态或过程；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一体化是几个国家为了自身经济发展，而在一定的区域内消除贸易壁垒，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的经济行为。沿着这样的逻辑分析，区域被认为是一个能够进行多边经济合作的地理范围，并且超越了单个主权国家的疆域。地球上的陆地是由几块大陆构成，每一块大陆都有多个国家或地区，每个国家或地区所处的自然地理区域不同，决定了其资源禀赋存在差异，也就是说，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总具有一些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资源与发展条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同一地理区域的国家或地区，以及不同区域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上总是存在互补性，因此，为了消除国家边界对经济发展的障碍，就产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设想。并通过契约的形式把区域内的经济政策及行为界定下来，以规范和统一区域内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行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一体化 (Integration) 一词最初指的是企业之间通过卡特尔、托拉斯等形式组成的产业联合组织，分为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两种形式。区域经济一体化一词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西欧，经济学家艾尔·阿拉格 (AiiM EL-Agrua) 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解释是，“到了 1950 年，专门研究国际贸易的经济学家们赋予这一名词一项明确的定义，特别指将不同经济实体结合成较大经济区的一种事物状态或者一种过程。今天这个名词的用法也仅限于这一含义。更具体地说，国际经济整合能消除参与国之间的所有贸易障碍，并建立一定的合作的协调机制。后者完全依赖于一体化采取的具体形式。”⁴³

⁴³ AiiM EL-Agru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rgration*, London, 1988, second edition, P.1

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 (Bela A. Balassa)⁴⁵在其著名《经济一体化理论》一书中对“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也做了明确的阐述：“我们将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个过程 (a process) 又是一种状态 (a state of affairs)。就过程而言，它包括采取种种措施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的歧视；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差别的消失。”⁴⁶这一定义在西方经济学中具有代表性意义，之后的经济学家在阐释区域经济一体化时，基本上围绕着巴拉萨的“过程”和“状态”而展开。

1952年7月，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1958年1月，《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简称《罗马条约》）生效，标志着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从此，经济一体化不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概念，已经成为内涵丰富、发展前景广阔的经济实体。经济学家维多利亚·柯森 (Victoria Curson) 在1974年从生产要素配置的角度解释了经济一体化，他把一体化“过程”理解为趋向全面一体化的成员国之间的生产要素的再配置。⁴⁶经济学家彼得·林德特 (Peter Lindert) 给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定义是：“通过共同的商品市场、共同的生产要素市场，或两者的结合，达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⁴⁷对此，经济学家彼得·罗伯逊 (Peter Robson) 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并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安排应该体现三个方面的特征：在某种条件下，成员国之间歧视的消失；维持对非成员国的歧视；成员国之间在企图拥有持久的共同特性和限制经济政策工具的单边使用上有一致的结论”。⁴⁸

由此可见，经济一体化就是生产要素不断趋向自由流动的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在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则表现为具体的生产要素流动程度的一种状态。根据经济一体化的概念与内涵，区域经济一体化至少应包括三个内容：第一，一体化的主体，一般是多个国家或地区；第二，一体化进程的推动力，即参与一体化的目的是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分工与合作，以获取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比较优势的发挥；第三，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具有多样化的形式，如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货币联盟、经济与货币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等。

⁴⁵ Bela A. Balass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rgr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65, p.1

⁴⁶ Victoria Curson, *The Essential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4.

⁴⁷ 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页。

⁴⁸ Peter Robso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London, 1991, P.19.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把区域经济一体化（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定义为，通过消除障碍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因素，把地理位置相邻近的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以契约形式组合成为更大规模的经济组织。

（二）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态

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态不尽相同，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与界定。经济学家理查德·利普塞（Richard Lipsey）根据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程度，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分为六种等级递增的状态，即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商品自由流动）、关税同盟（统一对外关税）、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等。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经济学家彼得·罗布森（Peter Robson）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分为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货币联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等五种形态。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包括：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经济同盟（economic union）、完全经济一体化（complete economic integration）等五种形态。

（1）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自由贸易区简称 FTA，是由签订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组成的贸易区。在自由贸易区内，各成员国之间废除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实现区内商品的自由流动，但每个成员国仍保留对非成员国的原有壁垒。近 20 多年来，这种形态的自由贸易区发展十分迅速，几乎遍及全世界的各个地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属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2） 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

关税同盟简称 CU，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最基本的一种形态，它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取消关税或其他壁垒，对非成员国实行统一的关税壁垒而缔结的同盟。构建关税结盟的目的在于使成员国之间的商品置于统一关税的保护之下，在内部市场上排除非成员国商品的竞争，它开始带有超国家的性质，具有代表性的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东非共同市场。关税同盟的基本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关税同盟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减免关税，消除贸易壁垒；第二，关税同盟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政策（CFT）和贸易保护主义。

(3) 共同市场 (Common Market)

共同市场简称 CM，指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除完全消除了关税与数量的限制，不仅实现了商品的自由流动，也实现了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对非成员国则实行共同关税。即成员国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进一步消除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使成员国之间不仅实现贸易自由化，而且实现技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的一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态，如欧洲统一市场等。

(4) 经济同盟 (Economic Union)

经济同盟简称 EU，经济同盟指成员国除实现商品与生产要素完全自由移动，对非成员国建立共同关税壁垒外，还要求成员国制定和执行某些共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逐步消除政策方面的差异，使一体化的范围从商品交换扩展到生产、分配乃至整个资源配置领域。

(5) 完全经济一体化 (Complete Economic Integration)

完全经济一体化简称 CEI，完全经济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形式，在此阶段，各成员国之间不仅消除了商品、资本、劳动力等自由流动的障碍，而且实现了区域内和国内经济、金融、财政等政策方面的一致性，甚至还包括了各成员之间的一些政策的统一。

(三)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是世界多极化，总体来看，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兴起和发展同整个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是一致的。

从发达国家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一方面，全球化伴随着科技进步、国际分工与合作，以及资源的全球配置与整合，产业转移和生产的全球化，国际贸易等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利益的存在，全球竞争不断加剧，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下，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使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受到挑战，“一超多强”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发达国家也寄希望于通过建立区域经济组织来确保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发展中国家则期望

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来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利益，并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预见，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现了国际经济与政治正朝着平等、自由、民主方向发展的趋势，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原因与发展现状

（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原因

随着国际分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了重要的发展形势。同时，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与世界政治、经济的多极化也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了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的重要形式。

（1） 技术进步，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加深，推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国家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了，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广泛开展国际分工与合作，成了一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浪潮，就有必要消除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中存在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等方面的障碍，才能更好地与世界经济接轨。所以，通过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使本国经济很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发展本国经济。各国消除了商品、生产要素、资本以及技术在国家之间进行流动的障碍，促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 WTO 多边贸易体制存在的缺陷刺激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尽管世贸组织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世贸组织的“一揽子接受”方式，要在其成员对各项议题达成一致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注定了要在短时间内所有成员达成共识和消除分歧困难重重。多边贸易谈判前景的不确定性，为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议提供了发展空间与机遇，也为参与全球竞争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因其成员在

自然地理上相邻、经济结构与科技发展水平相近，有类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因而具有开展经济合作的诸多优势和条件。

(3) 缓解区域矛盾，稳定区域局势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区域贸易协议除了促进贸易流动，也对消除政治冲突起着显著的作用。在这方面，欧洲一体化的初始动机和最终目标都是朝着政治一体化迈进的。在 20 世纪上半叶，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洗礼，人们普遍认识到，战争不能解决一切，要实现欧洲的持久和平，必须通过合作、一体化与联合。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为政治上的联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亚洲，1999 年东亚领导人关于东亚合作的联合声明，明确提出了开展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的议题。非洲一些国家政局长期动荡，大多数国家经济又不发达，这些因素促使非洲联盟于 2002 年问世，其目的是试图以政治和经济合作来推动地区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

(4) 推动国内的体制改革

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把参与企业经济一体化作为推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推动力。即通过履行经济一体化的条约责任和具体的承诺来促进国内的经济改革、体制转型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东欧转型国家通过与欧盟签署区域贸易协议的形式，推动国家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5) 寻求与构建多极化的利益集团，谋求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也需要他国的支持与合作。因此，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弱国还是强国，都积极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美国参与跨地区的亚太经合组织，意在抗衡不断扩大的欧盟。欧盟则希望作为一个更加强大的整体，用一个强音在国际上更有力地与美国、日本等大国抗衡，不仅在自家门口加紧对外经济扩张，在拉美和亚洲等地也积极开展经济合作。俄罗斯以独联体为依托，已经建立或正在构建一些区域经济集团，如独联体国家经济联盟、欧亚经济共同体等，以巩固和加强俄的大国地位，重振当年苏联的雄风和国际影响力。东盟国家通过加强内部协调与合作，在世贸组

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多边经济组织中用一个声音说话，来维护日益增强的自身利益。

(二)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早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到了 90 年代以来，一体化进程得到了迅速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几个大的经济集团。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为代表的一批区域经济组织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 WTO 的 144 个成员国中，约有 90% 的国家隶属于不同形式的一体化经济组织。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 1956 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为标志；第二阶段发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其标志是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的诞生；第三阶段则发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态势，并一直持续至今。

(1) 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欧洲的发展

时至今日，欧洲联盟不仅形成了统一市场，而且还发行了统一的货币欧元，已经发展到了区域合作的最高水平。此外欧盟与中东欧国家通过双边协议已联系在一起，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波罗的海地区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已建立了自由贸易区。

(2) 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美洲的发展

除了已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外，美国推动组建几乎包含所有美洲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加拿大与智利已达成了双边 FTA；在加勒比地区，有 13 个成员的加勒比共同体与多米尼加和古巴达成了双边 FTA。

(3) 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亚洲的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 and 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是中国与东盟十国组建的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签署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是世界上三大区域经济合作区，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包括：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即“10+1”。

第一阶段（2002~2010年），启动并大幅度下调关税阶段。自2002年11月双方签署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始，至2010年1月1日中国对东盟93%的产品贸易关税降为零。

第二阶段（2011~2015年），全面建成自贸区阶段，即东盟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四国与中国贸易的绝大多数产品亦实现零关税，与此同时，双方实现更广泛深入的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

第三阶段（2016年之后），自贸区巩固完善阶段。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目标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企业对话与合作；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联系；促进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和东盟合作历程中历史性的一步，它充分反映了双方领导人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良好愿望，也体现了中国和东盟之间不断加强的经济联系，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中新的里程碑。本文也主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构架下研究中国云南省对外开发战略。重点是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及其主要内容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形成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形成与其他理论的形成一样，具有逐渐演变的过程，并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核心部分的关税同盟理论，公认的是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是以瓦伊纳（Viner）的开拓性研究《关税同盟问题》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在关税同盟理论形成的过程中，同时代的德彼尔斯（Debeers）和贝伊（Bye）等人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事实上，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就有学者开始研究有关关税同盟的问题。彼尔斯·罗布森在《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 1818 年到 1914 年间形成的关税同盟有 16 个之多”。⁴⁹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关税同盟中涉及的一些优惠条约，如 1703 年的《梅休因条约》和 1860 年英法签订的《科布登条约》。对于这两个条约，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李嘉图(Ricardo) 等人都对其优惠条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另外，经济学家麦卡洛克(Macculloch) 等人还从 1834 年成立的日耳曼关税同盟进行了研究，并对贸易转移的作用给予了高度关注。1885 年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List)也指出，关税同盟的组成，一方面能有效促进工业发展；另一方面还能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使社会福利得到有效的增进。

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届得主，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 早在 1954 年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和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变量自由化是消极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为积极一体化。1961 年，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ela A. Balassa)在《经济一体化理论》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丁伯根的理论，将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状态。他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要素的流动不受政府的歧视和限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美国、苏联两大阵营，以意识形态作为分界线，一方面，都想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全面超越对方；另一方面，两强的经济技术实力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难望其项背的。一些国家从自身发展角度出发，寻求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最优的资源配置。尤其是欧洲国家开始探索要素自由流动，区域或国际分工与合作的组织形式，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雏形，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在 20 世纪 50 年代达到了第一次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的发展，国家间贸易壁垒的降低，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形成、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到了 1950 年，美国经济学家瓦伊纳(Viner)出版了《关税同盟问题》一书，标志着关税同盟理论的形成。瓦伊纳认为，关税同盟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但对非成员国则实行有差别的贸易保护主义，因此，其建立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福利的改善与增进。他还提出了贸易创造(Trade Creating)和贸易转换(Trade Diverting)两个基本概

⁴⁹ 彼德·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 页

念，所谓贸易创造是在关税同盟国之间消除关税后，国内生产成本高的商品生产被生产成本低的成员国所取代，来自成员国的低价商品替代了本国价格高的商品生产，因此，成员国之间贸易被创造出来。贸易转移则是指一国产品受到另一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影响后，转而大量向其他国家出口。之后的经济学家在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时，广泛使用了这两个概念。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及一体化理论的发展，自由贸易理论也广泛地应用于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问题。如英国经济学家罗布森(Robson)认为，通过消除区内贸易壁垒来实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而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是贸易自由区的基本形式。1956年，斯巴克(Spaak)根据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规模经济理论提出了共同市场理论，它是比关税同盟更高一个层次的经济一体化集团。关税同盟理论和自由贸易区理论假设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不自由流动，而共同市场不仅通过关税同盟实现了贸易自由化，还克服了成员国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实现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之后，经济学家西托夫斯基(Scitovsky)和德纽(Deniau)在共同市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市场理论。大市场理论的核心观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大市场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二是市场规模的扩大激化了竞争，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规模经济效益。

在瓦伊纳(Viner)之后，经过众多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完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体系。

(二)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1) 关税同盟理论

关税同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区域一体化的核心内容。关税同盟理论主要研究对内取消关税和对外统一关税所引起的贸易变化问题，该理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基于比较优势与比较利益为基础的自由贸易能够增进各国的经济利益，带来生产和消费的正向变化。建立关税同盟，在区域内实行关税减免，从而趋向于自由贸易，可以导致成员国的福利改善与增加，对于整个世界而言，福利总水平也是增加的。

①. 静态效应

静态效益主要是指在经济资源总量假定不变、技术条件没有改进的条件下，关税同盟对集团内外国家、经济发展以及物质福利的影响等。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A 贸易创造效应 (Trade Creating Effect)。贸易创造效应是指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 在同盟国内部取消关税, 实行自由贸易, 产品从成本较高的国内生产转往成本较低的成员国生产, 这样, 该产品从成员国的进口量就会增加, 从而创造出了新的贸易。另外, 之前从同盟国之外的国家高价进口的商品会转向同盟国内进口较低的商品所替代, 这也实现了贸易创造。因此, 从资源配置角度看, 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B 贸易转移效应 (Trade Diversion Effect)。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 在同盟国内部取消关税, 对外实行统一的保护关税, 成员国把原来进口同盟国外非成员国的低成本生产的商品转向进口同盟内成员国的高成本商品, 从而使贸易方向发生了转变。从资源配置角度讲, 如果同盟国内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不是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 无疑会使进口成本上升, 支出增加, 社会福利总水平下降。事实上, 这种转移效应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造成了社会福利的损失。

C 社会福利效应 (Social Welfare Effect)。社会福利效应是指关税同盟的建立对成员国的社会福利带来的影响。一个国家在加入关税同盟后的社会福利状况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这些影响主要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价格变动幅度。如果一个国家在加入同盟后国内商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那么社会福利总水平就会增加。第二, 国内商品价格供给和需求弹性。如果一国内部商品价格的供给和需求弹性越大, 那么加入关税同盟后, 消费者获得的消费者剩余就越多, 失去的生产者剩余就越少; 从而导致社会福利总水平上升。第三, 入盟前得关税水平。如果一国加入关税同盟前的关税水平越高, 那么, 入盟后国内价格下降的幅度就越大, 则社会福利总水平也会增加。

②. 动态经济效应

关税同盟的动态效应是指关税同盟对成员国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以及在就业、产出、国民收入、国际收支和物价水平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和投资效应三种。

A 规模经济效应。关税同盟建立后, 成员国超越了单个国家国内市场的限制, 分散的、小规模国内市场转向为统一的区域大市场, 导致市场容量迅速扩大, 形成了区域自由市场, 从而使成员国获得转移与规模经济效益。加入关税同盟后, 成员国之间均能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 参与区域分工与合作, 在成员国内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与整合, 组织大规模生产, 提高专业化水平, 降低生产成本与交易费用, 从而获得规模经济递增收益。

B 竞争效应。关税同盟的建立，一方面使成员国间的市场透明度增加，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程度提高，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成员国之间的市场竞争。由于相互开放市场，实行统一的关税，同内企业无疑会面临来自成员国内同类企业的强大竞争力，在竞争中，一些企业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危险。竞争导致同盟内的企业兼并与整合，可能形成一些同盟区域内的垄断企业或行业，这些垄断企业对于抵御同盟外的企业的竞争压力无疑有积极作用。

C 投资效应。建立关税同盟之后，市场规模扩大、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外来投资将会大大增加。一方面，随着市场容量的扩大，本国及同盟国企业为了生存与发展，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不断增加投资；另一方面，同盟之外的企业为了避开关税同盟贸易壁垒的限制，也会考虑到同盟内进行直接投资，这样，无疑会使投资规模大大增加，产生投资扩张效应。同时，还由于商品与要素的自由贸易，统一市场的形成，投资增加，竞争加剧，企业为了生存与发展，会不断地增加研发投入，加快技术进步与创新步伐。

③. 次优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范纳(Jacok Viner)认为，关税同盟的建立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可能增加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也可能减少成员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福利，这主要取决于产生关税同盟的环境，这就是次优理论(Theory of the Second best)。该理论认为，如果福利最大化或者帕累托最优所需要的条件不能全部满足，那么尽量满足尽可能多的条件是没有必要的，并且这样做通常会导致次优情况的发生。因此，建立关税同盟不仅仅在成员国之间消除贸易壁垒，并不比产生次优的福利状态。所以，要使关税同盟尽可能尽可能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增加福利，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A 关税同盟使得各成员国的海关人员、边境巡逻人员等减少而引起的行政费用的降低。

B 贸易转移型关税同盟通过减少对同盟成员国之外的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进口需求和出口供给，有可能使同盟成员国共同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

C 任何一个关税同盟，在国际贸易投票中以一个整体来行动，较之任何一个独立行动的国家来说，可能具有更强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

D 关税同盟建立后，可减少走私。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商品可在同盟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在同盟内消除了走私产生的根源，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查禁走私的费用支出，还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

(2) 自由贸易区理论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形式,它通过消除区内贸易壁垒来实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是比关税同盟应用更为广泛的一体化形式。关于贸易自由化的界定,根据国际经济学的观点,自由贸易区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达成协议或条约,相互取消关税与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措施而形成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对自由贸易区的定义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领土所组成的一个对这些组成领土产品的贸易,实质上已取消关税和贸易限制的集团。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NAFTA,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美洲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Americas, FTAA,包括美洲34国)、中欧自由贸易区(Central Europ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EFTA,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东盟自由贸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包括东盟十国)、欧盟与墨西哥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等。

自由贸易区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自由贸易区在成员国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对成员国之外的国家不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第二,实行严格的原产地规划,只有原产于区域内或主要在区域内生产的产品才能进行自由贸易。

英国经济学家罗布森(Robson)在《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一书中,讲关税同盟理论应用于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形成了较系统的自由贸易区理论。罗布森从单一国家和两个国家的角度探讨了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问题,与关税同盟的情况一样,自由贸易区也可以有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但与关税同盟的这两种效应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差异。由于自由贸易区对外不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因此,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优于关税同盟,原因在于自由贸易区发生贸易转移的可能性很小,加之原产地规则的影响,导致区外进入自由贸易区获取好处而使间接贸易发生偏转的可能性不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认为:“自由贸易区可以使进口国避免因单边降低壁垒而蒙受不必要的贸易转移损失。这样就可以获得区域外低成本供应来源。同时,已经实行比较自由的贸易体制或愿意放开贸易政策的成员国将不再受自由贸易区的限制。”⁵⁰

罗布森还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扩展传统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提出了针对南南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分析模型。南

⁵⁰ 托利等:《区域性贸易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定期出版物,第93期,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南南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型与传统的国际区域一体化模型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1）传统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型是一种完全的自由贸易模型，而南南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是合理的；（2）传统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型不存在规模经济，而南南型国际经济一体化模型则强调一体化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3）传统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模型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不存在市场扭曲，而南南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型是以不完全竞争为分析前提，存在市场扭曲。罗布森在规模经济和市场扭曲的经济条件下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了效应分析，结论是南南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益处，也就是说，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分享规模经济和其他各种动态效应，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目标。

（3）共同市场理论

共同市场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米德(Meade)和伍顿(wooton)等人，该理论主要分析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对共同市场内部各成员国生产要素的价格及收益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共同市场的建立可以产生净收益，使成员国总的国民收入水平增加。同时，共同市场的建立，还会导致生产技术和和管理方法的转移，从而提高成员国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与关税同盟理论和自由贸易区理论相比，共同市场理论强调成员国之间不仅产品实现了一体化，而且生产要素也是自由流动的，通过消除区域内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实现了要素市场的一体化。

根据共同市场理论，如果消除了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那么生产要素在逐利动机驱使下，会尽可能地流向收益率高的区域。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即使建立了共同市场，有些要素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流动现象，如劳动力等。与劳动力的流动性相比，资本的流动性则要强得多，只要存在资本收益率的差异，那么，资本就会向收益率更高的区域、领域流动，直到各地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相等为止。

从资源配置角度讲，共同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优于关税同盟的配置收益，也就是说，共同市场的建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和收益效率的提高。根据传统理论，加入关税同盟，通过自由贸易促进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趋同化，但必须符合严格的约束条件。而经济运行的现实是，由于成员国之间生产函数的不同，以及生产中规模经济的存在等因素的影响，从关税同盟演化到共同市场成员国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共同市场理论的先决条件是，如果消除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经济一体化进程从关税同盟演化到共同市场，在区域内不仅实现了商品贸易的自由化，而且实现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自然就形成了一个超越国家边界的统一大市场。成员国可以在更大的区域空间自由地配置生产要素和整合资源，无疑会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分工与合作的加深也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和交易费用从而有效地推动与促进本国经济及区域经济的发展。

共同市场理论提出后，率先在欧盟付诸实施，并且取得了成功。在南南型和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还没有得到应用，主要是因为共同市场理论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且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大致相等。

(4) 大市场理论

基于动态角度的大市场理论研究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竞争效应，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西托夫斯基(T. Scitovsky)和德纽(J. F. Deniau)。大市场理论以研究共同市场为基点，认为市场扩大是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前提，因为市场扩大导致竞争加剧，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经营规模是必然的选择。西托夫斯基认为，在各国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前，一般是从本国利益出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面对的主要是狭隘的国内市场，无法在更大的区域内整合资源与要素，生产规模相对较小，规模经济效益较低。“小市场”的经济会出现相对封闭的“恶性循环”，而建立共同市场之后，可以将各国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被分割的市场统一起来，为成员国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市场，这有助于规模经济效应的产生。同时，共同市场的建立，区域内成员国的厂商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压力，规模较小，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会在竞争中被淘汰，整个经济体系逐渐进入以规模经济为主导的大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促使企业间的重组、整合与并购，单个企业的规模会逐渐扩大，核心竞争力增强，整个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德纽认为，由于市场规模扩大，生产设备得到充分利用，企业规模扩张引起分工细化和专业程度提高，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水平上升，生产成本下降，使得商品价格下跌，企业竞争能力增强。另外，还由于关税取消，商品进口价格下降，社会购买力增强，消费者的生活福利将得到改善。消费的扩大引起投资的增加，增加的投资又导致价格下降，工资提高，购买力提高。这样一来，经济就会开始滚雪球式的扩张。

事实上，大市场理论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缺陷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大市场理论对于市场容量很大的国家同样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没有提

供很多的解释；第二，大市场理论认为，建立共同市场是为了克服企业家的保守态度，但是，如果限制国内企业的垄断行为，同样可以强化竞争；第三，如果说激化竞争的规模经济是共同市场产生的依据，那么规模经济效益的获得并非只有经济一体化或大市场的建立一条渠道。

（5）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

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来的，他认为，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区域分工，可能会导致各国企业的垄断和集中，影响共同体内部分工的协调与贸易的发展。因此，要完全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则必须进行成员国之间的协议性国际分工。

所谓协议性国际分工，是指一国基于国内的比较优势，放弃某些商品的生产并把国内市场提供给另一国，而另一国也从本国比较优势出发，放弃另外一些商品的生产并把国内市场提高给对方，即两国达成相互提供市场的协议，实行协议性国际分工。协议性分工并不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自动实现的，而是通过国家间签订某种协议来加以实现，也就是通过经济一体化分工协议化或法律化。如拉美中部共同市场统一产业政策，由国家间的计划决定的分工，就是典型的协议性国际分工。

小岛清认为，要达成协议性分工，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达成协议的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禀赋比例差异不大，都处于大致相同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阶段。

第二，作为协议性分工对象的产品，在每个国家或地区都能生产而且必须是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产品。

第三，协议国际分工的产品在每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成本与收益差别不大，即任何一方的让与都不会产生太大的经济损失，否则就不容易达成协议。

小岛清的协议性分工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在处于大致相同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更容易建立，在地里位置毗邻的国家之间易于产生。并且处于相同水平和相邻区域的国家，在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后，其经济发展越均衡，利益协调也越容易。

协议性分工理论的假设条件是，在实行分工之前，两国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但由于市场狭小，导致产量很小，成本很高，两国经过协议性分工以后，都各自生产一种不同的产品，导致市场规模扩大，产量增加，成本下降，协议双方都享受到了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

针对小岛清的协议性分工理论，也有的学者提出了异议，认为通过协议性分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也不是绝对的，如果区域内的企业生产规模已经达到最优状态，因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导致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反而会导致平均成本上升，交易费用增加等而出现规模报酬递减。

（6）综合发展战略理论

综合发展战略（The Integrated Strategic Theory of Development）是由鲍里斯·塞泽尔基《南南合作的挑战》一书中提出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他认为参与经济一体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战略选择，是发展中国家进行集体自力更生和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手段。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为了避免出现两极分化，确保一体化的正常运作和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共同机构，并制定相应的政策，由各成员国政府来共同推动实施。综合发展战略理论认为，有效的政府干预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很重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是变革世界经济格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素。

根据综合发展战略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立，会促进区域内经济与贸易的增长及成员国之间的国际分工和技术合作，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组合，提高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对外谈判的力量。

综合发展战略理论的基本观点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比如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积极加入区域性贸易组织并且积极参与区域性的贸易交流活动）；第二，它不限于市场的统一；第三，认为生产和基础设施是其经济一体化的基本领域；第四，通过区域工业化来加强相互依存性（形成区域型的产业链也不是局部小范围的产业链）；第五，强调有效的政府干预（政府提供响应的优惠和促进政策）；第六，经济一体化是集体自力更生的手段和按照新秩序逐渐变革世界经济的基本要素。

综合发展战略理论突破了以往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方法，把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发展战略，不必在一切情况下都追求尽可能高级的其他一体化。它把一体化看做是集体自力更生的手段和按新秩序逐渐变革世界经济的要素。另外，它考虑了经济、政治和机构等多种要素，而不是从贸易、投资等层面来考虑经济一体化的效应。综合发展战略理论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提供了参考的框架。

第二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浅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基础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⁵¹1967年东盟在冷战中成立，主要目的是加强本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合作，经济合作没有摆到重要的位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后，东盟作为政治组织的基础发生动摇，东盟要维持和发展下去，就必须把重点放在经济合作上。至此，东盟开始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给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打击，但也深化了东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1998年12月，东盟第六次首脑会议签署了《河内行动计划》，加快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以增加东盟的经济实力。

随着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深，东盟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建立更大的自由贸易区将有利于东盟经济的发展。尽管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提出的，但东盟在其他国家建立FTA中提出了“轮轴—辐条理论”可能是受欧盟建立诸多FTA的影响，主张以东盟为核心，建立诸多的“10+1”自由贸易区。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定，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中国与东盟间的经济交往与合作，而且有利于创建亚洲稳定的政治环境，提高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目标及其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包括四方面：加强和增进各缔约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促进货物和服务贸易，逐步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并创造透明、自由和便利的投资机制；为各缔约方之间的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开辟新领域，制订适当的措施；以及为东盟新成员国更有效地参与经济一体化提供便利，弥合各缔约方发展水平的差距。⁵²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实施了“早期收获”计划，这是WTO分类中PS比较明显的特点，实施早期收获计划主要原因是这些产品不涉及原产地规则，具体

⁵¹ 张彬策：《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9—229页。

⁵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一条。

商品范围主要包括 8 类产品：活动物、肉及食用杂碎、鱼、乳品、其他动物产品、活树、实用蔬菜、实用水果及坚果等。

中国—东盟早期收获计划于 2004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⁵³中国—东盟《原产地规则》于 2003 年 10 月正式签署并于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⁵⁴中国与东盟原产地规则问题达成协议，是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早期收获计划后又一个重要成果。2004 年 11 月，中国和东盟十国的政府代表签署了《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4 年 11 月 29 日《货物贸易协议》签署，2005 年 7 月 20 日全面启动降税计划，中国和东盟六国于 2010 年将绝大部分正常产品的关税降为零。2007 年 1 月签署了《服务贸易协定》，并于当年 7 月实施。

从发展目标和进程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目标不是很明显，主要体现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但自 2009 年 3 月 1 日结束的第 14 届东盟峰会决定将东盟的发展目标定为 2015 年建成经济共同体，实行共同的对外政治、经济和安全政策，内部实行贸易、投资、人员、货物、劳务的自由流动。东盟目标的改变，将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产生影响。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运作原则和机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依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10+1 协议”）建立的，“10+1 协议”虽然是由 11 个国家组成，但是东盟国家可以看做是一个统一的组织，“10+1 协议”有双边区域经济组织的性质。在东盟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新加坡人均 GDP 已经接近或者超过某些工业化国家的水平，而新加入东盟的老挝、柬埔寨、缅甸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另外，后加入东盟的四国有的还不是 WTO 成员，所以“10+1 协议”有自己独特的运作原则和机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在运作原则和机制方面没有单独条款进行综合阐述，以下的运作原则与机制是依据“10+1 协议”相关内容的分析。

⁵³ 尚国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试验田：早期收获计划》，《国际商报》2005 年 8 月 2 日。

⁵⁴ 商务部网站公布，文件号 2003 年第 81 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由海关总署、商务部、质检总局公告 2003 年第 81 号文件发布，并于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一）“10+1 协议”的运作原则

概况起来，“10+1 协议”的运作原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最惠国待遇原则

由于东盟国家中，有的成员不是 WTO 成员，所以强调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即中国自本协议之日起给予所有东盟成员国最惠国待遇。

（2）区别对待的原则

在“10+1 协议”中，区别对待的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现自由贸易区建成时间上的区别对待，中国与老东盟六国自由贸易区计划于 2010 年建成，与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建成自由贸易区则是 2015 年；二是在最惠国待遇领域，对东盟新成员的要求比较宽松。“10+1 协议”涉及的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实施的最惠国待遇的时间都是 2003 年 7 月 1 日，包括各自对其他国家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对于新成员而言是指 2003 年 7 月 1 日仅对中国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而不包括对其他国家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税率。

（3）敏感产品例外原则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给各缔约方提供了灵活性，以解决各自在货物、服务和投资方面的敏感领域问题，此种灵活性基于对等和互利的原则，经谈判和相互同意后提供。在“10+1 协议”的附件中列出了一些东盟国家在“早期收获计划”中的例外。

其他领域，包括国家安全及保护具有艺术、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文物所采取的措施，或保护公共道德所必需的措施，或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措施都可以列为例外。

（4）东盟的全体一致和不干涉内政的组织原则

长期以来，东盟形成了一套具有东南亚的决策方式，在松散灵活的决策机构下，“东盟方式”实行一致和不干涉内政的组织原则。已有经验表明，这一方式在东盟建立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其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对于提高东盟各国内部协调能力，加强凝聚力，该方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二）“10+1 协议”运作机制

“10+1 协议”运作机制与一般的 RTA 的运作机制有所差别，主要原因在于东盟是由 10 个国家组成的区域经济组织，本身有一套运作机制，主要机构有首脑会议、部长会议（外长会议、经济部长会议、其他部长会议等）、秘书处、专门委员会以及民间和半官方机构。首脑会议是东盟最高决策机构，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已成为东盟国家商讨区域合作大计的最主要机构，主席由成员国轮流担任。外长会议是制定东盟基本政策的机构，每年轮流在成员国举行。

目前中国—东盟首脑会议依然是“10+1 协议”的最高级会议。

中国—东盟贸易谈判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执行“10+1 协议”中所列的谈判计划，中国—东盟贸易谈判委员会定期向中国商务部部长和东盟经济部长汇报其谈判进度及成果；无论中国—东盟贸易谈判委员会与何时何地进行谈判，东盟秘书处和商务部都应联合给予必要的行政支持。⁵⁵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运作内容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由于各方经济发展中存在弱势领域，所以在商品贸易自由化领域存在例外。与其他 RTA 不同的是“10+1”包括了早期收获计划。⁵⁶

(1) . 关税。“10+1”的关税自由化体现在“货物贸易”条款中，条约规定，各缔约方的关税消减或取消计划应要求逐步消减列入减让表的产品关税并在适当时依照本条予以取消。纳入关税消减或取消计划的产品应包括没有本协议第 6 条所列的“早期收获”计划涵盖的所有产品，这些产品应分为正常类和敏感类产品，条约对两大类产品关税的取消在时间上进行了规定，并对敏感类产品数量设立了上限。

(2) . 非关税措施。“10+1”的非关税措施也体现在“货物贸易”条款中，条款指出，“非关税措施”应包括非关税壁垒，是指对货物贸易或早期收获计划涵盖的任何产品的进口或者出口、出口销售采取的数量限制或禁止，缺乏科学依据的动植物卫生免疫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应该被取消。

(3) . 服务贸易。为了服务贸易的发展，各缔约方同意进行谈判。逐步实现涵盖众多部门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此种谈判应致力于：逐步取消彼此或各国间存在的实质所有歧视，和/或禁止采取新的或增加歧视性措施；在 GATS 所做

⁵⁵ 引自《10+1 协议》。

⁵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1 年 11 月 6 日。

承诺的基础上，继续扩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深度与广度；加强各缔约方在服务领域的合作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并实现各缔约方各自的服务供应商的服务供给与分配的多样化。

(4). 投资。为了促进投资并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并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各缔约方同意：通过谈判逐步实现投资机制的自由化；加强投资领域的合作，便利投资并提高投资规章和法规的透明度；提供投资保护。

(5). 早期收获计划。为了加速实施“10+1”协议，各缔约方同意实施早期收获计划，早期收获计划包括的产品以农产品、植物、动物产品为主，同时早期收获采用了临时原产地规则。

(6). 原产地规则。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规则规定，“完全在一成员方获得或生产”以及“非完全获得或生产”，即原产于任一成员方的成分应不少于 40%；或原产于任一成员方境外（即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材料、零件或产物的总价值不超过所获得或生产产品离岸价格的 60%，且最后生产工序在成员方境内完成的产品为原产地产品。⁵⁷

(7). 经济技术合作。各缔约方同意在下列五个优先领域加强合作：农业、信息及通讯技术、人力资源开发、投资以及湄公河盆地的开发。合作领域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金融、旅游、工业合作、交通、电信、知识产权、中小企业、环境、生物技术、渔业、林业及林业产品、矿业、能源及次区域开发等领域。

(8). 最惠国待遇。中国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应给与所有非 WTO 成员的东盟成员国符合 WTO 规则和规定的最惠国待遇。

(9). 一般例外。在遵守关于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各缔约方彼此或各国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要求前提下，“10+1 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保护其国家安全，保护具有艺术、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文物所采取的措施，或保护公共道德所必需的措施，或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10). 争端解决机制。各缔约方应在本协议生效 1 年内，为实施本协议建立适当的正式的争端解决程序与机制。在争端解决程序与机制建立前，任何关于本协议的解释、实施和适用的争端，应通过磋商和/或仲裁以友好的方式加以解决。

⁵⁷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规则二、三、四。

“10+1”活动不涉及政治领域的内容，主要涉及经济领域的内容，这从“10+1”的称谓，即《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就可以看出。“10+1”合作的重点在贸易、投资、服务、经济技术合作四大领域，其他几个方面的内容都与这四个领域相关或为之服务的。

第三节、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益与增长效益研究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

“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的时间比“北北型”稍晚，但数量众多，比较有影响的“南南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拉丁美洲的中美洲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集团、加勒比共同体、拉丁美洲一体化联盟、南方共同体市场；非洲的中非关税与经济同盟、西非经济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南非洲共同市场、马格里布联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亚洲的阿拉伯共同市场、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等。

尽管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一体化的热情很高，“南南型”区域经济合作众多，但真正取得成功的却很少。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数据，目前绝大部分“南南型区域经济组织3的内部贸易占各成员对外贸易的比重都不超过15%，一般都在10%一下，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和中美洲四国集团的这一比重超过了20%。也就是说，“南南型区域经济组织对成员国贸易和经济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大多数“南南型组织内部贸后上升幅度很小，有的甚至是下降的。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选易的比重在组织成立择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南部非洲非洲共同体和南方共同市场三个区域作为“南南型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案例，通过实证分析，说明三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效应大小。

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贸易效应的衡量方法与度量NAFTA贸易效应的方法相似，参考Magee(2004)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和反事实估计。标准模型依然取决于下面这个计量方程：

$$m_{ijkt} = \alpha_{ijk} + \alpha_{jkt} + \beta m_{ijkt-1} + \sum_{y=t_0}^{t_1} \gamma_y RTA_{y,ijt} + \sum_{y=t_0}^{t_1} (\varphi_y RTA_{y,ijt} + \delta_y TD_{y^2,ijt}) m_{ijt-1} + \varepsilon_{ijkt}$$

(1.1)

上式中各参数的含义同“NAFTA贸易效应”部分内容。我们对(1.1)式进行回归估计，将估计出的系数值代入原计量方程中，并令 $RTA_{y,ijt}=0$ 和

$TD_{y,jt}=0$ ，计算出不存在自由贸易区的情况下在 t 期国家 j 从国家 i 对 k 类商品的进口量 \hat{m}_{ijkt} 。 $m_{ijkt} - \hat{m}_{ijkt}$ 表示自由贸易区对商品进口量的影响。

进一步，我们定义 TE (Trade Expansion) 是自由贸易区带来的区内贸易的扩展，既包括贸易创造效应，也包括贸易转移效应。我们认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消除了区内贸易的障碍，将有利于贸易的增加，也就是说反事实估计的 \hat{m}_{ijkt} 小于实际的进口值 m_{ijkt} ，因此 TE 大于 0。下面将给出具体的关系式：

$$TE_{ijkt} = \max(m_{ijkt} - \hat{m}_{ijkt}, 0) \quad i \in RTA \quad (1.2)$$

那么从贸易扩展中分离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根据 Viner (1950) 对贸易转移的定义，可知成员国从区外国家的进口减少，成员国从区内国家的进口要增加，且贸易转移为这两者中的最小值。具体公式如下：

$$TD_{jkt} = \min \left\{ \max \left[- \sum_{i \notin RTA} (M_{ijkt} - \hat{M}_{ijkt}), 0 \right], \sum_{i \in RTA} TE_{ijkt} \right\} \quad (1.3)$$

(1.3) 式测算的是对进口国而言总的贸易转移效应，当我们要细分针对不同的进口来源国的贸易转移效应时，则要用到下式：

$$TD_{ijkt} = TD_{jkt} \times \frac{TE_{ijkt}}{\sum_{h \in RTA} TE_{hjkt}} \quad (1.4)$$

(1.4) 式中， TD_{jkt} 是在 t 期国家 j 与自由贸易区内所有的伙伴国之间 k 类商品贸易转移效应的总和，而 TD_{ijkt} 表示 t 期国家 j 与自由贸易区内的某一伙伴国 i 之间 k 类商品贸易转移效应。

当区内贸易的增加不能完全被区外贸易的减少所弥补时，那么，两者之差就是贸易创造。 TC_{ijkt} 是 t 期国家 j 与自由贸易区内伙伴国 i 之间 k 类商品的贸易创造效应，具体的公式表示如下：

$$TC_{ijkt} = TE_{ijkt} - TD_{ijkt} \quad (1.5)$$

国家 j 和国家 i 间总体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就是 (1.4) 式和 (1.5) 式对所有的年份和所有类别的商品求和得到的。

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所以本节选取了中国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每类商品的年度进口数据。为了更精确地进行计量分析，本节选取的时间序列为 1984~2007 年。

在对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之前，先来看看中国进口数据的概况，如下表 5-12 所示。总体情况来看，由于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贸易往来，所以样本个数较多。从单方面来看，样本数据分布极不均衡：年份越早样本数据越少，进入 21 世纪以后的样本数据较多；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及欧美发达国家贸易往来较多，所以这些国家的数据比较齐全，缺失现象较少；另外，从商品类别来看，第 4 类和第 9 类的样本数据较少，其他类别的商品数据则较为丰富，多为 2000 多个，可研究性强。

表 1-1 中国进口分类数据概况

商品分类	0 类	1 类	2 类	3 类	4 类	5 类	6 类	7 类	8 类	9 类
平均值	45.1	7.21	144	245	36.1	242	277	779	161	28.6
标准差	146	23.8	662	862	139	1030	1170	3870	1000	157
最小值	0.000 001	0.000 01	0.000 001	0.000 012	0.000 012	0.000 001	0.000 001	0.000 001	0.000 001	0.000 011
最大值	1730	293	12400	11900	1640	15200	17300	64700	17000	3300
样本个数	2231	1086	2780	1410	880	2345	2732	2512	2312	957

我们在此选取的年度数据较长，且样本数据丰富，有利于进行反事实估计，为下面的实证检验分析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打下了基础。需要确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进口产生影响的实际时间。由实际统计数据可知，2002 年年初中国从各国的进口增速明显加快，2002 年可以看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一直以来，中国都在积极地扩大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双方都采取很多措施来促进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说 2010 年 1 月 1 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但是在这之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进口已经产生了影响。特别是 2001 年年底一致同意在 10 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开始着手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以我们将 2002 年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进口产生影响的起点。

我们仍然将 10 类商品的方程联立成的方程组, 写成以下的形式:

$$\begin{pmatrix} y_1 \\ y_2 \\ \vdots \\ y_{10} \end{pmatrix} = \begin{pmatrix} \alpha_1 \\ \alpha_2 \\ \vdots \\ \alpha_{10} \end{pmatrix} + \begin{pmatrix} \chi_1 & 0 & \dots & 0 & \beta_1 \\ 0 & \chi_2 & \dots & 0 & \beta_2 \\ \vdots & \vdots & \dots & \vdots & \vdots \\ 0 & 0 & \dots & \chi_{10} & \beta_{10} \end{pmatrix} + \begin{pmatrix} \mu_1 \\ \mu_2 \\ \vdots \\ \mu_{10} \end{pmatrix}$$

采用 Stata9.0 软件对该矩阵进行回归运算, 我们得出了实证结果:

表 1-1 和表 1-2 给出了中国 0~9 类进出口商品的 SUR 估计结果。从这 10 个方程的拟合优度 R^2 来看, 除了第 1 类和第 9 类的方程可决定系数分别为 0.6791 和 0.6507, 其他类别的商品方程的可决定系数都在 0.7 以上, 第 5、7、8 类商品的方程可决定系数在 0.8 以上。各个方程的 P 值为 0, 所有的方程都通过了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方程的构建是有效且合理的。

表 1-2 中国 0-9 类进口商品的 SUR 估计结果

商品分类	0 类	1 类	2 类	3 类	4 类	5 类	6 类	7 类	8 类	9 类
β	0.84	0.85	0.85	0.85	0.84	0.90	0.89	0.93	0.94	0.80
γy	-0.07	0.70	-8.79	0.94	-8.65	-2.85	-9.42	-2.36	0.94	0.29
ϕy	0.07	-0.27	0.43	0.06	0.65	-2.86	0.49	0.12	-0.10	0.03
δy	0.05	-0.19	-0.06	0.10	0.17	0.13	-0.03	-0.04	-0.07	0.07
RMSE	1.82	1.87	1.61	2.15	1.80	1.82	2.00	2.06	1.74	2.08
R-sq	0.7100	0.6791	0.7471	0.7363	0.7347	0.8001	0.7787	0.8298	0.8386	0.6507
chi2	4969	44491	243446	68432	45950	155207	146111	119073	128388	33724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样本个数	2030	962	2563	1269	753	2139	2512	2287	2097	842

注: 括号内为对应的标准差。

表 1-2 给出了反事实估计的结果。中国在 CAFTA 中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分国家的结果体现在表 1-2 中，且表中所示的数值是贸易转换和贸易创造占该类商品总进口的比值。总体来看，中国在 CAFTA 中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只存在于 2002 年，也就是我们设定的 CAFTA 对中国进口产生影响的年份；很多国家的某些类商品不存在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第 0 类、第 3 类、第 4 类和第 9 类商品不存在贸易转移效应，而仅存在贸易创造效应；第 2 类、第 6 类、第 7 类商品不存在贸易创造效应，而仅存在贸易转移效应；第 1 类和第 5 类商品既不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不存在贸易转移效应。第 0 类和第 3 类商品贸易创造效应涉及的国家最多，为东盟 9 国。

表 1-3 2002 年基于反事实估计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

国家	商品分类	贸易转移	贸易创造
柬埔寨	0	0	0.0683544
印度尼西亚	0	0	0.0729917
老挝	0	0	0.0692419
马来西亚	0	0	0.0723995
缅甸	0	0	0.0725873
菲律宾	0	0	0.0710082
新加坡	0	0	0.0669510
泰国	0	0	0.0725954
越南	0	0	0.0704283
印度尼西亚	2	0.0091624	0
文莱	3	0	0.1047257
印度尼西亚	3	0	0.1026945
老挝	3	0	0.2484318
马来西亚	3	0	0.1025794

缅甸	3	0	0.1326168
菲律宾	3	0	0.1066509
新加坡	3	0	0.1021702
泰国	3	0	0.1053471
越南	3	0	0.1034951
印度尼西亚	4	0	0.1889234
马来西亚	4	0	0.2055750
菲律宾	4	0	0.1462169
新加坡	4	0	0.0640417
泰国	4	0	0.0794732
越南	4	0	0.1097172
印度尼西亚	6	0.0337292	0
马来西亚	6	0.0227892	0
新加坡	6	0.0030968	0
泰国	6	0.0252334	0
马来西亚	6	0.0081335	0
菲律宾	7	0.0037762	0
新加坡	7	0.0066952	0
泰国	7	0.0048483	0
文莱	8	0.0304084	0
柬埔寨	9	0	0.0533378
印度尼西亚	9	0	0.0634737
老挝	9	0	0.0689197

马来西亚	9	0	0.0474580
缅甸	9	0	0.0537204
菲律宾	9	0	0.0490600
新加坡	9	0	0.0489096
泰国	9	0	0.0525125

注：表中没有涉及的国家及商品类别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均为0。

具体来说，对于第0类商品而言，除文莱外，中国从其他东盟9国的进口都存在着贸易创造效应，分别占该国在该类商品进口中的比重为：柬埔寨（6.92%），印度尼西亚（7.30%），老挝（6.93%），马来西亚（7.24%），缅甸（7.26%），菲律宾（7.10%），新加坡（6.70%）泰国（7.26%），越南（7.04%）。对于第3类商品而言，除柬埔寨外，中国从其他东盟9国的进口都存在着贸易创造效应，且非常显著，其中对老挝的贸易创造效应占从该国总进口的比重最大，为24.84%；其次为缅甸，为13.26%；其他国的比重都在10%以上。对于第9类商品，中国对文莱和越南既不存在着贸易创造也不存在着贸易转移效应，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创造效应分别为柬埔寨（5.33%），印度尼西亚（6.35%），老挝（6.89%），马来西亚（4.75%）。缅甸（5.37%），菲律宾（4.91%），新加坡（4.89%），泰国（5.25%）。对于第4类商品，贸易创造效应非常明显，中国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贸易创造效应分别占对其4类商品总进口的20.56%、18.89%和14.62%。

对于第2类商品，中国只对印度尼西亚的进口存在着贸易转移效应，对其他国家既无贸易转移也无贸易创造效应，且对印度尼西亚的贸易转移效应不显著，约为从印度尼西亚第2类商品总进口的0.92%。对于第6类商品，中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进口存在着贸易转移效应，分别是3.37%、2.28%、0.31%和2.52%。对于第7类商品，中国只对四国的进口存在着贸易转移效应，分别是马来西亚（0.81%）、菲律宾（0.38%）、新加坡（0.31%）和泰国（2.52%）。最后是第8类商品，跟第2类商品类似，中国只对一个国家存在着贸易转移效应，即文莱为3.04%。

反事实估计的结果呈现出一下的特点：第一、从估计结果来看，贸易创造效应多于贸易转移效应，且从进口该类商品的比重来说，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也就是说贸易创造效应比较明显。第二，中国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这五国的贸易转移效应明显，只要存在着贸易

转移效应则必定有这五国，而且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因商品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第三，总体而言，中国在 CAFTA 中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不是很明显。

经过实证发现，中国在 CAFTA 中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只存在于 2002 年，并且中国在 CAFTA 中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并不是很明显。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如下：（1）中国与东盟正是接触始于 1991 年 7 月钱其琛外长应邀出席第 24 届东盟外长会议，之后中国与东盟频繁接触，双方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直到 2001 年 11 月，双方同意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 10 年来，双方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到宣布建立 CAFTA 时，双方的贸易空间释放得差不多了。（2）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静态效应，并没有可持续性。刘力和宋少华（2002）认为发展中国家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静态效应很小、更看重的是动态效应。（3）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结构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如 Zhangyong Zhang 和 Ow Chin Hock(1996)、John Wong 和 Sarah Chan（2003）、王学柏和李荣林（2006）中国与东盟国家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和工业竞争力水平上属于同一个档次，因此在进出口商品和贸易伙伴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如出口产品多为资源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产品多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所以在国际商品市场上中国和东盟国家处于竞争的地位；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均集中在美、日、欧三方。因此无论从贸易的商品结构还是从贸易的国别结构来看，双方间的相互贸易很难替代各自与区外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这样双方在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后就保持对发达国家进出口产品的刚性。建立 CAFTA 固然会有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但这些贸易效应不大。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增长效应

根据对实际经济情况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中国和东盟在组建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过程中呈现出共同的经济发展趋势。所以本文只选取了中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效应，这对于评估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增长概况

中国与东盟经济对话早在 1991 年就已经开始，但是由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所以直到 2002 年，双方才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 2010 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正式启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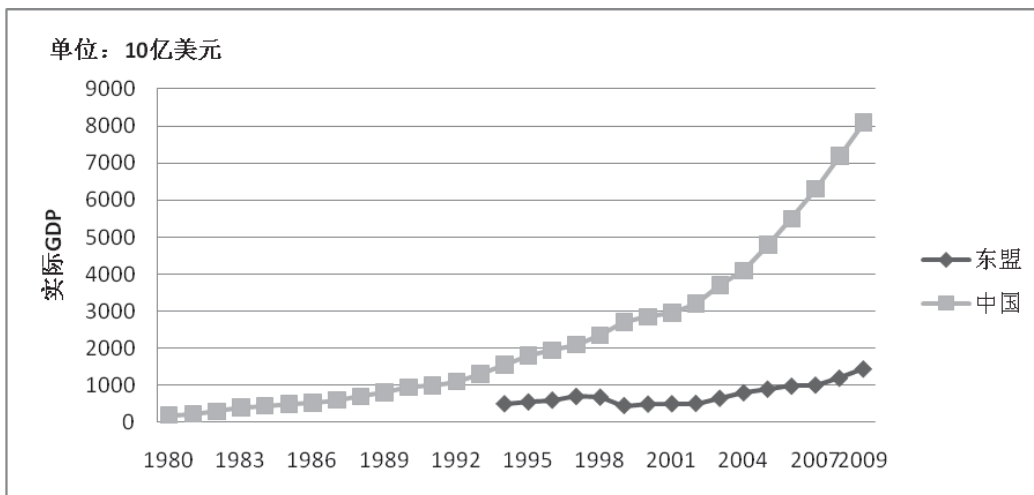


图 1-1 1980-2009 年中国和东盟的 GDP 情况

注：纵轴为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过的实际 GDP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均来源于网上 EIU 数据库。

图 1-1 给出了按购买力平价调整过的中国和东盟的经济规模情况，2008 年中国的 GDP 到达 8 万多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东盟总体经济规模的 5 倍多。而且自 1980 年起中国经济就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经济增长更是稳步上升，2007 年 GDP 增长率高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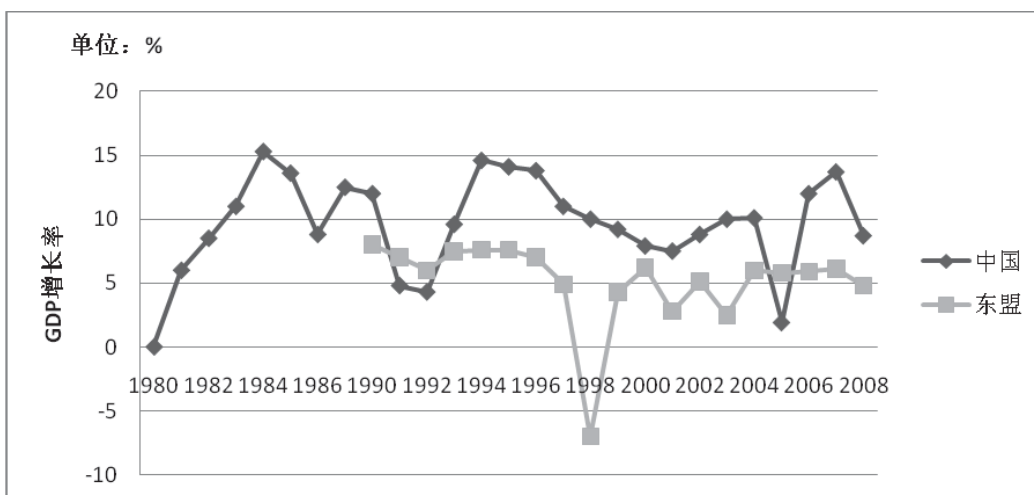


图 1-2 1980-2008 年中国和东盟的 GDP 增长率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均来源于网上 EIU 数据库。

如图 1-2 所示，在 1997-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东盟 GDP 增长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这暴露出各成员国以及各成员国之间金融体系、汇率制度等方面的严重问题。此时，东盟急需地区经济整合来抵御外来的风险。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不仅减弱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也由此应运而生。

第二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基础分析

第一节、大湄公河次区域⁵⁸经济合作发展历程和合作机制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并非从经济合作开始的，最初的范围也并不包括整个次区域的六国。笔者根据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初。这一阶段是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起步发展阶段。合作的地区范围是从湄公河下游开始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1955 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发表了一项报告，提出合作开发与利用湄公河下游的水能资源，该计划被称为“湄公计划”。1957 年 3 月，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举行了第 13 次年会，泰国、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发表了联合公报，提出联合开发利用湄公河。同年 9 月，成立了湄公河委员会，并在亚洲经济社会发展理事会的主导下运作，该委员会还得到了 30 个合作国、17 个国际组织和 6 个国际金融组织机构的协助。40 年来，湄公河委员会对湄公河下游地区的开发利用进行了大量勘测、测绘、分析、研究、论证，并将一些项目付诸实施。由于该地区长期处于战乱状态，“湄公计划”进展缓慢，湄公河的国际合作开发陷于停滞。不过，1957—1988 年湄公河委员会共筹集到 4.2 亿美元的捐款，捐款主要来自联合国开发署、荷兰、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其中，2.68 亿美元用于工程建设投资，1.52 亿美元用于进行投资前的调查和制订计划工作。

第二阶段：从 1992 年到 2002 年，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繁荣发展阶段。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全球冷战的结束和地区局势的缓和，湄公河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重新活跃起来。湄公河沿岸国希望通过发展国际化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也纷纷参与该区域经济合作项目。由此形成了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多种合作机制并存的局面。主要有：由亚洲开发银行推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湄公河委员会主导的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由东盟领导人发起的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由

⁵⁸ 在论文中，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在地域范围上是一样的，但是在文中所指的内容却有所不同。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在文中指，该区域内所有合作机制的泛称；而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则是对亚行主导的合作机制的特指。文中一般将两者简称为“次区域”。另外一个“湄公河次区域”指的是除中国云南外的中南半岛五国。

泰、老、缅、中政府发起的“黄金四角”区域经济合作、由日本外务省主持的印度支那综合开发计划、由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和日本通产省联手的柬、老、缅经济合作工作计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多边组织的合作开发计划等。这一阶段的合作地域范围已经扩展到了次区域的六国，合作的领域也由原来的水资源利用协调合作扩展到经济合作等多个领域。

第三阶段：2002 年至今。2002 年 11 月，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了首次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领导人会议，这是湄公河开发史上最高级别的会议，会议批准了大湄公河次区域未来十年发展战略框架报告，标志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进入实质性合作的新阶段。六国领导人承诺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和各国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能源开发，调动私营部门参与合作，推动贸易与投资，并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也被纳入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成为中国与东盟五个重点建设合作领域之一。2003 年 4 月，在曼谷举行的关于 SARS 的东盟特别领导人会议上，泰国总理他信提出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四国实施经济合作战略行动计划（ACMECS）。同年 11 月 12 日，在缅甸蒲甘四国领导人签署了《蒲甘宣言》，确定在五个优先领域实施合作战略行动计划，即贸易和投资、农业和工业合作、交通网络、旅游合作、人力资源开发等，确定了 46 个共同项目和 224 个双边项目。次年越南加入该合作战略计划。该经济合作战略旨在通过成员国的自力更生和共同繁荣增强自身竞争力，创建和平的政治环境发展经济，来缩小同东盟其他国家的发展差距，为实现东盟经济共同体而努力。

从以上三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战争的结束和地区局势的缓和是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条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扩展：一是合作领域的扩展，由水资源的协调扩展到经济领域等的全方位合作；二是合作地域的扩展，从湄公河下游扩展到湄公河上游，从中南半岛到中国西南地区，经济合作容量不断增大。就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来说，全方位的积极的经济合作从 2002 年开始。因为在这之前，中国虽参加了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新湄公河委员会等各种合作机制，但是在合作的态度和内容上，中国都显得比较被动。从 2001 年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到 2002 年中国和东盟领导人正式确定在 10 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中国加强周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步伐加快。这也就决定了作为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主体的云南省和次区域五国的经济合作在 2002 年之后才有了明确的方向，才开始了大规模实质性合作。因此，以下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基础及动力机制的分析包括两部分，即次区域五国的合作基础及动力机制和中国与次区域五国的合作分析。

二、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合作机制

目前该次区域主要的合作机制有四个：

一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GMS）。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是由亚洲开发银行于 1992 年根据该银行成立时制定的宗旨，和章程中关于促进该银行发展中国家成员间合作的授权，并为贯彻该银行于 1991 年通过的中期发展框架性计划，经与湄公河沿岸中、柬、老、泰、缅、越等六国进行一系列磋商后发起的。旨在改善本区域基础设施，扩大贸易与投资合作，目前已先后开过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并于 2002 年 11 月 3 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了首届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合作范围涉及交通、通讯、能源、旅游、环境、人力资源开发、贸易和投资、禁毒等八个方面，筛选出 100 余个优选合作项目。为扩大本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并从多方面吸引投资，在亚行的推动下，由亚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投资组织先后在区内外多个城市举行过本区域合作优选项目投资机会研讨会。

二是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ASEAN—Mekong Bas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MBDC）。由东盟主导，原东盟七国和中、缅、老、柬共 11 个国家为开发合作的核心国，并欢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和一些国际性或地区性金融组织和机构参与。合作领域包括基础设施（交通、通讯、灌溉、能源）、投资与贸易、农业、林业、矿产资源产业、工业及中小企业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科技等八个方面。这一合作机制的形成与运作，表明澜沧江—湄公河开发合作已作为东盟经济政治一体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合作范围已超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

三是新湄委会主导的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1995 年，在湄公河工作小组的基础上，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四国在泰国清莱签署了《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并正式成立了新湄公河委员会。新湄公河委员会完全是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四国主导的地区性组织，其宗旨是对湄公河的水资源和相关资源以及全流域的开发制定计划并管理实施。新湄公河委员会成立后，每年都制定项目计划，并积极寻找国际援助。新湄委会成立以来获得了一些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的援助。

四是中、老、缅、泰毗邻地区“成长四角”。这是四国有限地区的小区域合作。最初由泰国于 1993 年提出，又称“黄金四角计划”、“五清沟通计划”（清迈、清莱、景栋、景通、景洪。在泰语中，景与清同），其宗旨是建设中国西南通向中南半岛的陆上通道和“经济走廊”，实现两大市场的对接，并促进小区域内的发展。

第二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从区域经济合作的概念来讲，我们所指出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就是区域经济合作的范畴，只不过这里是一个特定的称谓。我们可以将区域经济合作的定义简单的理解为基于一定地理范围的若干独立国家（这里主要是指国家中央政府）为了达成某种目标而进行的经济协调活动。这种目标既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安全的；经济协调活动既可以是松散的、相对独立的政策协调活动，也可以是朝向一个经济共同体而采取的一体化活动。⁵⁹对于一个具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来说，存在一种共同的经济利益或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其他安全利益等，这是合作的基础，是可以协调的利益，否则，就谈不上合作。区域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如果说行为体共同的命运和相互依存提供了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基础，那么行为体的同质性与自我约束则使国家间利益的相互协调成为可能。而共同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相互协调则是国家间经济合作能够启动和不断深化的基础。同时，外部的条件往往也是促成国家间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条件。”⁶⁰这一从欧盟的发展得出的结论同样适合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但是，没有一种合作模式是通用的，对次区域来说，我们必须结合其特殊的区情进行分析。

一、湄公河次区域五国合作意识的形成与巩固

湄公河次区域五国中，除泰国是东盟的创始国外，其余四国都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加入东盟的新成员国。因此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分析就离不开东盟的影响，对湄公河次区域五国合作基础的分析首先从它们合作意识的形成与巩固开始。在笔者看来，湄公河次区域五国合作意识的形成与巩固的过程不但是它们加入东盟、认同东盟意识的过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东盟意识向外扩展的过程。东盟意识在次区域各国形成共识也为次区域合作建立了思想基础。

（一）“东盟意识”的形成

“东盟意识”是东盟成功的关键。在 1976 年东盟第一次首脑会议上通过的《东盟协调宣言》（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就敦促成员国要“大力发展一种地区认同意识（an awareness of regional identity），尽各种努

⁵⁹ 王子昌：《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9—20 页。

⁶⁰ 王子昌：《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0—21 页。

力创建一个强大的东盟共同体（ASEAN Community）”。也就是说，建立一种共同的“东盟意识”基础上的共同体是东盟组织的一个明确目标。如果我们认为东盟组织是成功的话，那么在成功的各种因素中，共同的地区意识无疑是最重要的。

（二）“东盟意识”的扩展

东盟自成立之初就具有强烈的地理整体意识。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东南亚国家联盟，就是要包括东南亚的所有主权国家。当“东盟意识”或者说东盟方式逐渐被成员国和外界所认可时，东盟开始了向大东盟目标的迈进。尤其是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东盟向湄公河次区域的提供了重要条件。东盟的扩展实质是“东盟意识”的扩展，是东盟新成员认可东盟方式、形成合作意识的过程。这一过程以东盟吸收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⁶¹等新成员为标志。

东盟首先是克服了意识形态的障碍，接纳越南入盟。因为在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入盟的问题上，东盟内部分歧明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认为越南等其他印支国家的入盟不需要改变其国内的政治体制。而新加坡方面则认为，印支国家要加入东盟，需要改变他们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然而这种分歧在有关柬埔寨的巴黎和平协议签署后得到了缓解，并于1995年7月将越南接纳为成员国。它的成功为后来新成员的加入树立了典范。其次是克服了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接纳柬埔寨入盟。这一进程对东盟所倡导的不干涉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第三，东盟顶住了外部干预的压力，接纳缅甸入盟。这次东盟面对的不再是内部的分歧，而带有明显的对抗外部干预的意味。至此，包括老挝的入盟，东盟基本完成了“大东盟”的梦想。这其中，东盟强烈的地理整体意识和原则的认同在东盟的扩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这种意识，东盟才能够争取到单个成员无法得到的利益，而且在面对西方大国的压力时，能够采取强硬立场，维护其成员或准成员的尊严。

随着湄公河次区域四国加入东盟，东盟老成员与湄公河次区域新成员的政治两极化冲突逐渐消失，新成员也认识到只有合作才是解决安全问题以及经济发展等问题的关键。湄公河次区域四国之所以加入东盟，利益是一个重要因素，包括政治和经济的。比如越南官方从越南的角度认为加入东盟是受到三个因素的推动，即吸引外国投资，与地区国家发展和保持友好关系，促进越南国内改革进程。

在政治上，东盟的扩展尤其有利于像柬埔寨、老挝这样的小国，这些小国

⁶¹ 王子昌：《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1页。

就像之前加入东盟的文莱和新加坡一样，现在可以期望与比他们强大的邻国以平等伙伴相称。⁶²对于越南、缅甸、柬埔寨和老挝来说，它们成为东盟成员国，标志着结束了他们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东盟成员资格使得华盛顿越来越难以合理解释其孤立河内的政策，也难以继续这一政策了。⁶³作为东盟成员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能够在多边机制中利用协调和集体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保证获得更多的重建和发展的资源。这些新成员也能够通过东盟外长扩大会议（ASEAN-PMC）约束世界主要大国，而对于像柬埔寨和老挝这样的小国，让他们自己谋求约束大国将是很困难的。同样，新成员能够在东盟地区论坛内寻求自己的安全利益，因为东盟地区论坛包括所有影响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主要角色。

在经济上，东盟的扩大增加了地区经济的相互依赖，推动了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这也是集体认同的来源。如果说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表明老东盟国家与湄公河次区域政治冲突结束的话，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大东盟内消除新老成员国的经济两极化问题。东盟新成员国在经济上都是相当落后的，和老成员差距很大。加入东盟后，湄公河次区域的新成员国不但从老成员国那里得到资金和技术支持，而且对外可以从东盟被赋予的“普惠制”中取得贸易福利。一方面东盟为了维护其整体的发展会照顾新成员国，另一方面，新成员国经历过战争的创伤后有发展经济、弥补差距的强烈愿望。在自身经济实力弱小的情况下，通过合作就很必要了。

因此，湄公河次区域五国经济合作意识在柬埔寨问题得以解决后逐渐形成。⁶⁴“东盟意识”的认同是他们合作的前提，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是他们合作

⁶²本部分参考了阿米塔·阿查亚的观点，见《建构安全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7页。

⁶³王子昌：《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1页。

⁶⁴根据阿米塔·阿查亚的描述，笔者认为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意识最早是泰国提出的。在当时，东盟和越南的对抗中，泰国和越南的矛盾是这一问题的核心，泰—越对抗的和解是双方国内变化促成的。这种变化最重要的是发生在越南。当越南进行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时，最初的东盟国家忽略了这种改革带来的深远意义，包括当时的泰国政府。然而，在1988年8月差猜·春哈旺总理当政后，泰国发现了这一转变所带来的潜在利益，提出“新经济管理政策”，旨在“把印度支那的战场变成市场”。通过与泰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推动印度支那的经济自由化，逐步减小越南统治的范围，增强泰国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同时，差猜又提出“黄金半岛”

（Suwannaphum）理念。他们相信，泰国能够成为包括三个印度支那国家和缅甸在内的东南亚大陆部分的核心。这一系列走在其他东盟国家前面的政策，很明显表明泰国竭力推动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愿望。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泰国正是按这些观念来做的。

的强大动力。

二、湄公河次区域五国经济合作的现实动力基础

我们现在看到的湄公河次区域，包括中国云南在内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有关各方都在努力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有条进行，合作热情很高。现在的问题是，湄公河次区域到底有没有经济的互补性？因为次区域各国的资源属于待开发状态，如果这些资源开发出来形成产业，在区域各国间有很强的互补性。但是，在目前看来，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合作基础。它不能解释为什么现在各国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为什么在合作的经济基础相当脆弱的情况下，次区域各方仍在极力推动该区域的经济合作呢？也就是说，在次区域，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其他现实的原因。

第一、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属东南亚的中南半岛（也称印度支那半岛）地域整体意识，这种意识能使它们被东盟接受而显得相当重要。严格来说，湄公河只是将它们联系起来的纽带，是中南半岛的代称。因为对缅甸和泰国来说，对本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河流分别为伊洛瓦底江和湄南河。二是佛文化和儒家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佛儒文化⁶⁵。建立在这种文化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协调地区内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奠定了基础。这种国家利益的可协调性成为次区域各国经济合作可持续进行下去的重要保障。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地域文化基础因素，这种因素可以说是次区域合作基本要素。

第二、强烈的合作愿望

强烈的合作愿望是国际经济合作得以启动和不断深化的动力和条件。而强烈的合作愿望可以来自对合作收益的强烈预期，也可以来自内外部环境的挤压。

在现有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中，强烈的合作收益预期是一个暗含的前提条件。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强烈的合作收益预期吗？王子昌教授在对东盟经济进展缓慢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这一前提条件是以经济比较发达、社会多元化发展比较明显为假定的。而当时东盟内部缺乏合作的强烈愿望，因而经济合

⁶⁵此观点只代表笔者个人观点。因为论文的着重点和时间的问题，笔者没能就是否是这样一种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在这里，也主要是为了表明湄公河次区域各国虽经过历史上的恩怨情仇，但并未形成具有非东亚文化特质的文明。因此，在文化上，次区域是有共同基础的。

作进展缓慢。如此，对次区域来说，也同样缺乏收益预期。但是，如果我们将国际经济合作理论中的合作收益预期内涵扩大，将其延伸到政治、社会、安全等其他领域，丰富合作收益预期的内容，我们发现，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对合作收益的预期十分强烈，包括为国内经济发展争取到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融入地区事务免于被国际社会孤立的政治愿望、争取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和援助资金的期望等等。而且，在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第一阶段，虽然因为战乱和国内时局不稳，湄公河委员会仍然为该地区从国际社会争取到了 4.2 亿美元的资金。这一领域合作的成功所带来的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为次区域如今的合作带来了成功的预期，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前进。

除了次区域各国强烈的收益预期外，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成就了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行。湄公河次区域五国除泰国外，国内政局不稳且战乱不息，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当战争结束后，恢复和发展经济就成为当务之急。而外部环境的影响最终转化为内部发展变化的动力。这种外部环境范围由大到小表现在三个层次上。一是全球背景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多边谈判遭遇重重障碍的情况下，区域主义或者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迅速掀起，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次区域各国加入东盟，也就标志着它们卷入到了这一轮浪潮中。第二，作为东盟新成员，它们和东盟老成员的经济差距非常大，要完成已经取得共识的到 2020 年建立类似欧盟的“东盟共同体”⁶⁶目标，避免东盟分裂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一方面东盟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支持新成员的发展，另一方面新成员国必须通过合作寻求最大收益。第三，“东盟意识”形成的特殊思考和决策方式，使得东盟国家的很多决策项目一般都是由外部组织提出的，从东盟需要加强协调和合作开始到东盟“共同工业计划方案”。之所以这样，是为了避嫌方案偏向某一个国家的利益，达到一种客观性。在湄公河次区域新成员国未加入东盟前，该区域的合作开发也是国际组织提出并实施的，其中以亚洲开发银行牵头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最成功的一个，亚行自然也就是该区域重要的外部力量。亚行不但很好的协调了各方的利益，而且次区域项目的建设成为巩固和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纽带。

第三、泰国在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推动作用

泰国是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在柬埔寨问题还没有彻底解

⁶⁶ 该目标是在 2003 年 10 月 7 日，在印尼巴厘举行的东盟第九次首脑会议上确定的，它包括三份协议构成，即《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统称为《巴厘第二协议》。

决时，泰国就提出“将印度支那的战场变成市场”⁶⁷的政策，这一走在东盟官方立场之前的政策，受到东盟其他成员国带有疑虑的欢迎，而批评者认为这是泰国自我经济利益驱动的自私行为，损害了东盟“协商一致”的原则。其实，在东南亚大陆部分（湄公河次区域范围内），包括差猜后来独创的“黄金半岛”理念，泰国不但渴望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且渴望成为框定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安全重点的领导国家。如果泰国成为东南亚中处于这样一种地位的国家，就会与海上范围内作为政治领导者的印度尼西亚和作为金融与通讯中心的新加坡形成竞争。这才是印尼和新加坡有以上态度的根源。后来泰国政府在1993年又提出“黄金四角经济计划”，得到中国、老挝和缅甸政府的支持和呼应。以交通和发展旅游业为经济合作重点，旨在建成中国通向中南半岛的陆上通道和经济走廊。随后，虽然东盟在1996年发起形成了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但是都未对泰国在次区域的地位产生实质性影响。东盟似乎在看待泰国在次区域日益上升的影响问题上有所转变。在他们看来，与其让东盟外势力去主导湄公河次区域的开发，不如让东盟内部的力量去主导好。而且，泰国始终没有放弃在整个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想法。直到2003年，泰国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机会。这一年的11月12日，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四国领导人在缅甸蒲甘签署《蒲甘宣言》，成立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南河）—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Ayeyawady-Chao Phraya-Mekong 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y, ACMECS）行动计划。2004年5月10日，越南加入该机制。鉴于泰国在次区域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五国一致同意泰国在其中发挥协调和核心作用。可见，泰国在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节、亚洲开发银行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作用

亚洲开发银行（Asia Development Bank, ADB，以下简称“亚行”）发挥主导作用的必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亚行的目标宗旨提供了前提条件；二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区情决定着需要亚行发挥主导作用。

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66年，是一家致力于减少亚太地区贫困的多边发展金融机构。亚行的根本目标是消除亚太地区的贫困。其活动包括三个战略性课题：私营部门发展、区域合作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中区域合作是亚行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内容。亚行自成立时就提出，亚行将促进区域内的经济增长和合作，服务于区域集体或个体发展中成员的经济增长。⁶⁸在必要的情况下，

⁶⁷ 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4页。

⁶⁸ ADB: *The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rticle 1, www.adb.org

亚行将利用自身资源，通过项目贷款、技术援助等形式使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⁶⁹

亚行的区域合作政策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通过相互补充的三个功能体现出来：一是作为信息的提供者；二是作为发展中成员发展的合作伙伴；三是帮助公共和私营部门资源的有效流动，为区域合作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区域合作作为“减少贫困战略”的一个核心主题正是亚行工作的重点。本文研究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就是按亚行的标准划定的。

前面已经分析了次区域的基本区情，在笔者看来，对次区域合作顺利进行产生重要作用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资金的支持；二是一个有力的合作协调组织者。亚行所具有的特殊身份正好符合要求。首先，对于次区域来说，贸易和投资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中十分重要，但是贸易和投资作用的发挥都需要资金的投入。提高贸易交易效率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金，这部分资金是亚行贷款和援助项目的重点。资源的开发利用也需要资金，亚行在其中发挥中介和技术援助作用，大部分靠跨国企业和私营部门的资金。在次区域各国或地区没有能力完全自己解决的情况下，亚行的贷款和援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其次，为了促进次区域各方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促进人员和货物的流动，很多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都是跨境的，涉及到多国多方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协调，亚行在其中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992年开始实施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亚行开展最早的项目，也是该行迄今为止最成功的项目。亚行将在该次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的作用定义为：鼓励沿岸国之间的对话，加强互信；通过具体项目的论证、开发、支持、推动该次区域内的各项经济合作项目的开展。同时，考虑和照顾湄公河沿岸各国的利益，为各国开展区域合作起到协调、提供便利和部分融资的作用。⁷⁰

由亚洲开发银行牵头举行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是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机构。2002年起，又确定今后3年举行一次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启动后，为保证相关的投融资计划与亚行按成员国组成董事会决定重大投融资事项的体制相衔接并讨论和决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大问题，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应运而生。迄今为止已开过13次，⁷¹并于2002年11月3日在柬埔寨金边成功举行了首次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

⁶⁹ ADB: *The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rticle 2, www.adb.org

⁷⁰王勤：《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特点与前景》，载《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4期。

⁷¹有关会议的简要情况请见附录III。见 www.yunnan.cn/282/2003/10/22/64@23602.htm，其中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分别由部长会议会议纪要整理。

第四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组织特征和面临的问题

一、组织特征-松散型

前面已经谈到，东盟的成立不是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而是其成员在内外部安全环境受到挤压的情况下政策协调的结果，合作动力不强，决定着东盟的合作没有超出国家间合作的范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呢？有的认为它是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有的认为它只是国家间的一般合作。笔者倾向于后者，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松散的、开放的国家间合作。

国家间合作就是国家间政策的相互协调，它是以各国政策独立为前提的。而一体化是指国家间把有关事务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汇聚到了一个共同体制下进行的过程。就经济的一体化看，一般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成员国之间歧视的消失；第二，维持对非成员国的歧视；第三，成员国之间在企图拥有持久的共同特征和限制经济政策工具的单边使用上有一致的结论。因此判断是国家间合作还是一体化组织，主要的依据在成员国是否把一部分国家权利赋予了共同的机制。在一体化情况下，组织的决策机构从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出发，制定适应于各成员的法律和政策；组织的执行机构由独立于各国、忠于共同体章程和利益的公务人员组成。简言之，共同的决策和独立的执行机构是一体化的重要特征。原则和政策的协调是国际合作的特征。⁷²

虽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具有某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征，如生产要素会在次区域这个地域范围内趋于自由流动，从而带来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效率得相应提高，表现为在这个地域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但是次区域对区域外的开放性，不存在维持对非成员国的歧视，而且各地区的单边开发也是次区域合作的主要表现之一，这就决定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开放和松散的国家间合作。它是相邻国家之间的一个非正式多边合作机制，各参与国只是在现有关系基础上就基础设施、能源建设、贸易投资等一些特定领域进行自主合作，其目的是使该地区成为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投资场所，更具规模的开放性市场。在 1994 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第三届经济合作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次区域合作项目的参与国可以是次区域内的任何几个国家，无需一定要

⁷²王子昌：《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66 页。

六个国家”，“为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设立基础不是该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合作的思想是建立和扩大现有的关系”。⁷³

这样，次区域各方具有完全的自主权，所有决议的形成均需在一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上进行磋商，亚行是在其间起协调作用。一系列的部长级会议就次区域合作形式达成的协议，主要包括项目优先权的标准、项目的先后次序、机构设置的安排等。在实际运作中，亚行十分注重合作项目实施中取得的一些初步成效，以便使各国保持继续合作的动力。

二、面临的问题

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笔者持乐观态度。这种前景不在于能否完成对次区域合作表示关注的各方所制定的目标，而在于通过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实施的项目建设为加深本地区的经济联系和推动次区域各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从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来讲，认识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笔者将其分为战略上和现实中的两类来分析。

所谓面临的战略问题，一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不甚明朗；二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拓性跨越式发展。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亚行牵头主导的经济合作，他们认为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及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并不是它们的主要任务，这些应该是亚洲各国政府的事情。但是亚行将推动亚洲共同体的形成作为其最终目标，靠支持各次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局部一体化来推动整个亚洲一体化的形成。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协调人和催化剂，它只能通过部长会议通过的项目实施影响合作的进程。而在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各方同意将湄公河流域的开发合作作为五个优先加强合作的领域之一，还提出实施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一次领导人会议所制定的该区域中长期全面发展规划，这表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已融入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的框架内。中国和东盟欲通过自身的力量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行。从长远看，这和亚行的目标并不冲突。通过东盟倡导的与中、日、韩的“10+1”、“10+3”合作机制，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对亚洲经济一体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⁷³王勤：《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特点与前景》，载《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4期。

东盟提出到 2020 年实现东盟共同体的目标，在 2004 年的东盟和中日韩峰会上，又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在 2005 年 4 月 22 日，博鳌亚洲论坛推出 2005 年度《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也就是说，建立“亚洲共同体”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现在的问题是，从局部性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共同体到“东亚共同体”，以至于“亚洲共同体”的形成，是不是要走和欧盟一样的路，是不是要形成和欧盟组织制度一样的体系？首先，笔者认为，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实现“亚洲共同体”虽然困难，但是不是没有可能，关键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其次，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亚洲共同体”的组织框架可能不会和欧盟一样，它具有亚洲的特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诸国，在经历过殖民统治后，形成强烈的民族性格，国家主权意识非常强烈，要像欧洲国家那样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给共同的体制是很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东盟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在内的合作属于松散的国家间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应该是决定两者形不成相同组织体制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影响是不是根本的？由于笔者专业所限，还有待相关学科的学者进行研究。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拓性跨越式发展主要体现在发展路径上。由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属于开放的、松散的国家间合作，不属于经济一体化组织，其核心问题就不是关税和投资贸易壁垒的问题。按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进程和组织形式理论，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向一体化目标迈进，要经历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等六个依次递增的阶段。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就其合作的内容领域来讲，属于区域发展中的合作。这种合作以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衔接、消除贫困、经济增长、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等为主要内容。这也就决定着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下一个演进方向不是“特惠关税区”。其合作程度的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在可扩展性上，包括“自身空间领域的直接扩展”或“通过溢出和扩散效应向区外国内腹地辐射，带动成员国内其他地区以经济的发展”两个方面。⁷⁴由此看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组织应该属于不同性质的并行经济合作形式。也就是说，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合作不能走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演进路径。

然而，在 2002 年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间框架确定后，中国明确提出将大湄公河次区域构筑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行示范区。这样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实际上已纳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框架之中，标志着大湄公河次区域已经开始迈向“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之所以称其在发展路径上具有开拓性，原因正在于此。一般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进建立在

⁷⁴赵永利、鲁晓东：《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作》，载《国际经济合作》，2004 年第 1 期，转引者：www.cafta.org.cn，2004 年 5 月 10 日。

经济贸易联系日益紧密的要求基础之上。而次区域因为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区域内各国间的经贸联系和与区域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要完成经济共同体的建设目标，次区域各国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国家间的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另一方面，要在 2015 年完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任务。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路径上的开拓性跨越式发展正在于在前进中去弥补基础的不足，走其他经济合作组织从未走过的路。至于这一壮举能否成功，关键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国和东盟将大湄公河次区域东盟新成员的建成时间推迟到 2015 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坚定信心基础上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能走向成功。

由于次区域特殊的区情，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相当严峻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⁷⁵

1、次区域合作面临的内外环境困难。表现在：(1)次区域整体经济实力不强，各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2)国际大区域的合作，淡化了次区域合作的作用。当前，国际关注的热点集中在欧盟、东亚、东盟等的合作，而次区域发展步伐相对较慢，有被淡化之势；(3)周边国家和国家环境对次区域发展影响越来越大。次区域在发展中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和科技优势的压力，必然会面临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压力和挑战。但由于次区域特殊的地缘政治特点，围绕合作开发，区域内国家和区域外国家、地区、国家组织纷纷以各种方式进入、多轮驱动、多种合作机制并存、国际关系复杂、竞争激烈的场面。这虽有利于市场竞争，但也会从另一方面干扰合作开发的顺利进行，增加团结协调的难度。

2、次区域合作的基础要素落后。表现在：(1)资金匮乏，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短缺严重制约了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领域的发展速度。从目前情况看，柬埔寨的基础设施最落后，老挝、缅甸、越南也急切要求改善基础设施。特别是次区域国家之间的联系通道还处于相邻而不相通的状态，造成人员、货物流通不畅，贸易成本高，制约了相互间经贸合作的发展；（详见表 4.6、4.7、4.8、4.9）(2)劳动力素质低，缺乏技术及管理技能，严重阻碍该区域经济的发展；(3)市场发育程度低，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经济环境。由于该区域大部分国家过去实行较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现在正处于转轨过程当中，市场机制不甚健全，资本等要素市场尚未形成，制约了次区域开发开放过程。

3、次区域经贸合作基础薄弱。表现在：(1)贸易体制不完善，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和信息化程度不高。次区域各国的投资环境还须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为相互的贸易与投资提供法律上的保证和制度上的便利。目前，次区域国家是以

⁷⁵本部分参照《云南省促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五年计划》（2004—2008）的部分内容。

利益为纽带的非制度化运作模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合作。因此，必须使已有的合作制度化；(2)贸易发展不平衡，层次较低。次区域各国的经济基础及产业结构不同，贸易不平衡，造成中国、泰国与其他四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大，四国的支付能力弱，严重制约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同时，次区域贸易和投资仍处于较低层次，产品的配套能力相对较弱，商品缺乏国家市场竞争能力，难以形成规模化的制造业和加工工业。次区域国家间的贸易保护严重影响区域经济合作进程，非关税壁垒制约了次区域产品及服务的合理流动和发展，形成时冷时热的局面。

4、利益协调困难。次区域的合作机制较为松散，相互间协调、咨询机制不完善，各国间的合作经常产生矛盾或不协调。目前，尚缺乏一个高效、多边、能及时解决实际问题的合作协调机制，从而加快推进次区域合作步伐和领域。由于各国的出发点、利益点、紧迫性等认识尚不一致，因而，对流域的开发在目标和重点上还存在分歧，上、下游国家在利益上也存在矛盾。

表 2.1 大湄公河次区域公路及相关统计 单位：万 Km²、千米、辆

	国土 面积	总里程	油铺 路	入户车辆 数	货车总 数	每千 人拥 有车 辆数	每千 人拥 有货 车数
柬埔寨 (2004)	18.10	35769	1996	918000	32000	68	2
老挝 (2004)	23.68	31209	4497	187000	10000	37	2
缅甸 (2001)	67.66	28790	23179	445000	53000	9	1
泰国 (2005)	51.31	51467	50151	25266000	646000	405	10
越南 (2001)	32.96	15571	11258	7621000	194000	97	2
云南 (2004)	39.4	200333 (2008)	—	4400000	323183	18	8

表 2.2 大湄公河次区域铁路及相关统计

	柬埔寨 (2005)	老挝	缅甸 (2001)	泰国 (2005)	越南 (2004)	中国云南 (2004)
国土面积 (万 Km ²)	18.10	23.68	67.66	51.31	32.96	39.4
总里程 (千米)	650	—	4759	4035	2600	1984
客运量 (千人)	81	—	61280	49671	10627	13605
客运周转量 (万人千米)	45 (2000)	—	4477	9052	3426	3007
货运周转量 (万吨千米)	76 (1999)	—	1171	3621	2000	4634

表 2.3 大湄公河次区域航运及相关统计

	河运			海运		
	河港数 (个)	客运量 (百万人)	货运吞吐量 (百万吨)	海港数 (个)	客运量 (百万人)	国际集装箱 吞吐量(百万吨)
柬埔寨	7	0.07	0.01	2	—	2.11
老挝	—	—	—	—	—	—
缅甸	9	0.21	1.29	9	0.003	10.36
泰国	12	4.14	19.65	15	0.32	142.54
越南	—	—	—	—	0.20	72.78
中国云南	8	3.69	1.69	—	—	—

表 2.4 大湄公河次区域民航及相关统计

	国内航运				国际航运				
	机场数 (个)	客运量 (千人)	货运 量 (千 吨)	起降 班次	机场数 (个)	客运量 (千 人)	货运 吞吐 量 (千 吨)	离港 班次 (千 次)	到港 班次 (千 次)
柬埔寨 (2004)	6	192.4	0.04	5869	2	1442	21.9	7.9	5.8
老挝 (2005)	14	273.4	0.81	8425	3	160	551.3	1.4	1.4
缅甸 (2001)	21	1028.7	3	16567	2	528	11.47	3.0	3.0
泰国 (2004)	29	40352	1122	358155	5	37040	810	153.2	131.3
越南 (2005)	20	—	—	—	2	4992	93.8	—	—
中国云南	9	3666.9	59.6	45568*	1	100.928	61	—	—

“*”表示国内和国际总起降次数。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ASEAN STATISTICS 2006》，由于东盟选取的数据来源于各国网站，数据并非是2003年的数据，而选取最近年份的数据。云南数据来源于《云南统计年鉴》(2006)及相关的统计公报。

第三章 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第一节、中国加强同东盟经济合作的动因分析

2002年11月3—5日,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东盟和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和东盟各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概括起来,中国加强同东盟的经济合作是“两个环境”、“三个基础”和“两个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两个环境”

何谓“两个环境”?在这里,主要是指中国面临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就内部环境来说,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长达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年均增长9%以上的高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新奇迹。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0%。对外贸易总额达到25616亿美元,增长17.8%,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⁷⁶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和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有力的拉动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尤其是周边国家和地区。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贸往来增长很快,2006年中国对该地区贸易额达到5024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32.5%。⁷⁷而且同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2007年中国与东亚地区贸易逆差有875亿美元,其中同东盟贸易逆差是28.3亿美元,⁷⁸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复苏所产生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同时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为适应WTO规则而进行的经济结构与体制的调整,将使中国经济释放出更大的潜能,实现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巨大进口需求,将为东盟和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巨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合作机遇。这要求我们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增长和完成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和交往,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

就外部环境来说,可以分为政治安全环境和经济安全环境。中国之所以在与东盟有不断增长的庞大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建设自由贸易区,从政治上上

⁷⁶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1/22/content_10700948.htm

⁷⁷ <http://news.sohu.com/20070714/n251055942.shtml>

⁷⁸ http://www.gx.xinhuanet.com/dm/2009-01/20/content_15501771.htm

看，是战略性的考虑，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这种战略性是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决定的，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选择。由于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安全，但是，这又往往会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中国与东盟在充满变数的国际关系中，如何寻求一个固定的对话渠道，使充满变数的关系得到一定的控制，避免外部力量的卷入使问题变得复杂化，是双方要考虑的战略问题。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如何调整外交战略，在与中国交往中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与中国的关系中东盟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也是崛起的中国如何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能使与东盟的合作效益最大化所面临的一个现实的战略问题。相互关系中的这种战略考虑，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得以顺利启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战略的考虑是双方经济合作的主要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安全成为国家综合安全的核心内容。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的地缘经济安全是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和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在全球化、多极化时代，中国要成为现实世界政治经济组织的一员，谋求平等的地位，在处理多边关系时仍要奠基在双边的基础上。在经济合作中，中国应与周边国家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以消除周边国家因中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疑虑和恐惧。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以自由贸易区（FTA）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猛。WTO公布的数据表明，截止2007年7月，报告给WTO的区域贸易协定达380个，其中，正在实施的205余个。区域贸易协定内部的贸易总量占到全球贸易总量的2/3，其中北美和欧盟的区域内部贸易量超过了世界贸易总量的一半。⁷⁹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促进区域经济竞争力、扩大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它也对区域外国家产生歧视和排挤。对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在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基本上没有参加任何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与世界其他贸易集团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中国该怎么办？“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积极参与区域性经贸组织，以使我国贸易不受区域贸易集团的排挤。”⁸⁰通过积极的经济外交，与周边地区国家发展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是我国维护地区经济安全的主要手段。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是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一环。

⁷⁹ 刘方、张立韬：《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月。

⁸⁰ 易小准：首届中国商务发展论坛发言词，2004年11月27日，见 www.cafta.org.cn，2004年11月30日。

二、“三个基础”

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三个基础”指的是政治基础、经贸基础和文化基础。东盟国家是中国的友好近邻，与中国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东盟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友好往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历经风风雨雨，逐渐走向成熟。至1991年，中国与所有东盟国家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5年后中国又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中国与东盟共同确立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近年来，双方合作关系进入了新阶段。

政治基础

中国与东盟本是好邻居，由于受冷战的影响，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几经周折，历经沧桑。在20世纪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五六十年代的对抗和不接触阶段、七十年代的松动缓和阶段、八十年代的平稳发展阶段、九十年代的顺利发展阶段，进入新的世纪双方面向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目标迈进，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密切。

1991年中国与东盟所有国家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后，10多年来，双方高层互访频繁，为双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双方组织机构间的对话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为双方开展全方位合作以及扩大共识、解决局部问题上的争端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深化发展同东盟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为了适应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趋势和为双方在地区性、国际性事务中进行全面合作创造条件，在新世纪双方确定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使得双方的合作领域深入到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领域，合作的基础不断得到加强。

2003年，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关系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10月7—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出席在印尼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在10月7日温家宝总理做的《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振兴》演讲中，对中国一贯奉行的睦邻外交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⁸¹的主张，并强调这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指导中国

⁸¹ “睦邻”是指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与周边国家睦邻相处的原则下，共筑本地区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结构。“安邻”就是积极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合作增进互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为亚洲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地区环境。“富邻”就是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

与东盟关系的基本纲领。从 1991 年起中国出席了东盟成员国外长会议和后来建立的东盟地区论坛，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建立正式的对话机制。2003 年，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盟国家，进一步增强了双方的政治互信。中国愿意与东盟一道，积极落实《中国—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提出的各项措施，巩固双方业已建立的安全合作，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由于历史上的共同遭遇，双方形成了良好的历史共识，都认识到唯有保持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才能保证国内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2003 年 10 月 10 日，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在总结双方关系近年来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与东盟关系做出的新定位，标志着双方关系迈上了新台阶，成为合作的重要法制保障。

2004 年第八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 11 月 29 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双方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以及《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东盟在协议中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些协议表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已进入全面合作的新阶段。

经贸基础

中国与东盟政治关系的良好势头为双方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双方在进出口贸易、相互投资、劳务承包等领域的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中国与东盟已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1、双边贸易

过去 10 年，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长了 6 倍多。1997 年以来，双方贸易以年均 20% 左右的速度增长。⁸²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双边贸易额在 1998 年有短暂的下降。1999 年，双边贸易额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超过 1997 年的水平，达 272 亿美元。自 2000 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都以高于中国总体对外贸易增幅的速度在增长。2004 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为 1059 亿美元，2007 年双方贸易额达到 2025 亿美元，三年间年均增长 24.1%。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10%，东盟已成为中国第 4 大贸易伙伴。2008 年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达 231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9%，增幅因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其中，我出口 1141.4 亿美元，增长 20.7%，较去年同期回落 11.4 个百分点；进口 1169.7 亿美元，增长 7.9%，较

⁸²吴综之：《中国：全球经济中日益重要的角色》，www.cafta.org.cn，2004 年 3 月 9 日。

去年同期回落 13.1 个百分点。我对东盟贸易逆差 28.3 亿美元，同比下降 80%。在东盟国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分别为我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⁸³

表 3.1 中国与东盟历年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		中国对东盟的出口		中国对东盟的进口		贸易平衡	
	中国统计	东盟统计	中国统计	东盟统计	中国统计	东盟统计	中国统计	东盟统计
1993	106.79	88.651	46.83	43.364	59.96	45.28	- 13.13	- 1.923
1994	132.09	110.628	63.79	57.590	68.30	53.03	- 4.51	4.552
1995	203.69	133.306	104.74	71.297	98.95	62.00	- 5.79	9.288
1996	211.59	166.917	103.10	92.176	108.49	74.74	+ 5.39	17.43
1997	251.56	226.508	127.00	134.829	124.56	91.67	+ 2.44	43.15
1998	236.44	204.141	110.35	112.115	126.09	92.02	- 15.74	20.089
1999	272.02	219.225	122.75	123.317	149.27	95.90	- 26.52	27.409
2000	395.22	323.159	173.41	181.370	221.81	141.7	- 48.4	39.581
2001	416.15	319.152	183.85	173.992	232.29	145.160	- 48.44	28.832
2002	547.66	427.597	235.68	232.122	311.97	195.475	- 76.29	36.647
2003	782.6 *	552.220	309.3 *	282.229	473.3 *	269.991	-164	12.238
2004	1058.8		629.78		429.02		+200.76	

⁸³ <http://news.eastday.com/c/20081029/u1a3947030.html> 和 http://www.gx.xinhuanet.com/dm/2009-01/20/content_15501771.htm

2005	1303.7	749.99	553.71	+196.28
2006	1608.35	895.26	713.09	182.17
2007	2025.5	941.8	1083.7	-141.9

注：标“*”见中国贸发网 www.tdctrade.com，转引自黄定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西南民族经济》，2004年版，第35页。

资料来源：中方统计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转引自古小松：《中国—东盟知识读本》，2004年版，第198页。东盟统计数据见东盟秘书处：《ASEAN STATISTICS 2004》。2004—2007年数据见《东南亚经济运行报告（2008）》，2008年10月，第380页。（由于08年爆发世界范围内的经融危机，所以08年以后几年内的数据不具备说明性，暂不引用。）

从表3.1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统计手段上的差别，主要的问题在转口贸易的统计上。这不能影响双方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这些问题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表 3.2 2000—2007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单位：万美元

国别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文莱	7,437	16,540	26,283	34,626	29,900	26,086
柬埔寨	22,355	24,045	27,611	32,065	48,200	56,300
印度尼西亚	746,377	672,360	793,480	1,022,886	1,348,000	1,251,000
老挝	4,084	6,187	6,396	10,944	11,354	12,800
马来	804,487	942,508	1,427,051	2,012,730	1,872,000	3,071,000

西 亚						
緬 甸	62,126	63,154	86,164	107,974	114,000	121,000
菲 律 賓	314,173	356,432	525,940	939,952	1,333,000	1,756,000
新 加 坡	1,082,067	1,091,899	1,403,078	1,934,862	2,668,400	3,315,000
泰 國	662,404	705,096	855,695	1,265,475	1,734,000	2,181,000
越 南	246,641	280,857	326,427	463,945	674,000	819,000
合 計	3,954,151	4,161,079	5,480,127	7,827,462	9,834,858	12,611,19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其中，2004、2005年数据为网站查阅，由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and 2006年中国-东盟博览会 <http://www.gxradio.com/2006caexpo/index.asp>。

双边贸易呈现出以下特点：⁸⁴

（1）双边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中国-东盟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由1975年的3.55%升至2005年1-11月的9.14%。

（2）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双边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在双边贸易中的地位逐年提升。自2000-2004年间，我国与东盟双边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额年均增幅达42%，占双边贸易额比重也从2000年的27.1%增至42.2%，高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占外贸比重的13.9个百分点。东盟成为仅次于欧盟和美国的我国第3大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伙伴、第1大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来源地和第1大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逆差来源地。

（3）双边贸易中中方持续逆差，今年逆差略有减少。自1993年起，中国对东盟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2004年，中方逆差达200亿美元。今年我国对总体

⁸⁴ <http://www.166.cn/html/2006/01/11/3550.htm>

进口实行宏观调控，自东盟进口增幅放缓，1-11月中方逆差同比下降了7.2%，达175.8亿美元。

(4) 三资企业在双边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与东盟贸易中，三资企业进出口额占一半以上。2005年1-10月，三资企业与东盟国家贸易额为637亿美元，占总额的60.6%。东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地区之一。

2、相互投资与工程承包等劳务合作

双边相互投资不断扩大，东盟对华投资已形成相当规模，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快速增长。截至2008年6月底，双方累计相互投资总额已达519亿美元。在华直接投资居前3位的东盟国家分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其中新加坡对华投资累计达300亿美元，占东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约70%。⁸⁵目前东盟10国均已成为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这些都预示着，包括双边贸易在内的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将进一步全面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截至2005年11月，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签订承包劳务合同总金额34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27亿美元。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和越南是中国在东盟国家开展承包劳务合作的主要国家。其中，新加坡已成为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第4大目的地和对外劳务合作第2大市场。⁸⁶

尽管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双方的经贸合作仍处于规模较小、水平较低的层次，潜力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随着中国加入WTO，实施西部大开发和“走出去”战略，将极大地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双边经济贸易、投资、地区经济等合作。

文化基础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正式交流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中国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本质上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其载体是华侨华人文化在东南亚国家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影响。中国的儒家文化几乎走遍了所有的东南亚国家。现在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对文化的认同主要是由不同时代移居过去的华侨华人形成的。他们对东南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在创造东南亚文化成果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将中国文化糅合进去，使东南亚文化带有中华文化的成分。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出国旅游人数

⁸⁵http://www.gxzf.gov.cn/gxzf_gxdm/gxdm_jckmy/jckmy_zgdm/200812/t20081205_94828.htm

⁸⁶http://www.gov.cn/zwjw/2006-01/09/content_152455.htm

都呈现飞跃发展的趋势。作为近邻，双方的旅游游客数量猛增。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双方的文化沟通和交流。双方的艺术交流、商业性演出等活动不断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教育领域方面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学习对方语言的学生人数大大增加。目前，中国出现了“东南亚语言热”，而东南亚国家也出现了“中国汉语热”。这些文化内容的广泛交流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在文化价值上的认同，有力的支撑着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国家关系等领域的广泛合作。

三、“两个事件”

这里所指的“两个事件”是指对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作用的事件，即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两个事件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

1997年中，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随后蔓延到韩国和日本。进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和深化，并波及俄罗斯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引发全球汇市和股市大波动和动荡。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政策帮助东南亚渡过难关。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国政府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并采取措施努力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保持了国内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增长，对缓解亚洲经济紧张形势、带动亚洲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举措使东盟看到，应对经济全球化靠单打独斗不行，在集体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时要选择合适的合作对象。在危机期间，中国没有任何政治或经济附加条件的支持和援助，对东南亚摆脱金融危机起了关键作用，这与美国的袖手旁观大不一样。东盟的目光开始转向日益繁荣且负责任的中国。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起初，东盟认为中国加入WTO将对东盟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形成重要挑战。在2000年11月的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上，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就中国入世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并评估进一步提升双方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包括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等问题。在专家小组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入世虽然对东盟形成挑战，但是由于中国入世承诺一揽子开放市场的措施，由此形成新的机遇远远大于由此带来的挑战，双方的合作是双赢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是可行的。东盟秘书处根据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模型推算得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长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55.1%。同时，自贸区将使东盟GDP增加0.9个百分点，约54亿美元，使中国

GDP 增加 0.3 个百分点，约 22 亿美元。⁸⁷当然这只是局部静态的收益。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让东盟真正认识了中国，将目光转到了中国的话，中国的入世无疑直接决定了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道路上的现实选择。

第二节、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基础

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是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中国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在合作的路径选择上走的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将合作的目标方向确定后，靠地方政府制定有力的政策措施实现目标。因此，中国在与东盟经济合作中所持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中国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指导原则和方向。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除了建立在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基础之上外，还有次区域独有的动力基础和特征。

首先，云南与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对外经贸合作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

表 3.3 云南与湄公河次区域五国历年贸易情况 单位：万美元、%

	1998		2000		2002		2005		2006		2007	
	总额	增速	总额	增速	总额	增速	总额	增速	总额	增速	总额	增速
柬埔寨	52	48.6	66	-	121	-	324	52.4	352	8.7	990	182.1
老挝	1,444	3.8	1,926	25.8	1,655	-9.7	4144	22.7	6932	64.4	8339	20.3
缅甸	38,100	25	36,294	21.2	40,678	16.6	63000	14.6	69208	9.6	87357	26.2
泰国	2,290	-	3,158	29	4,360	0.7	15000	17.0	13069	-9.5	22021	68.5
越南	5,332	14.2	10,000	40	16,266	1	32300	-4.6	50745	59.2	97167	91.5

⁸⁷ 东盟秘书处：《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报告》（英文版），第 31 页。

合计	47,218	—	51,444	—	63,080	—	114768	140305	22.0	215874	53.9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1998—2001年数据来自外经贸部网站，转引自《CAFTA建设与云南面向东南亚开放》；2002年数据见杨明：《云南与东盟外经贸发展的状况和特点》，载《东南亚报告（2003/2004）》第311页；2003年数据见云南省商务厅网站“云南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数值表（2003）”。越南数据见曹大明、齐欢：《走进越南》，第75页。柬埔寨数据由2004年138万美元和增速133.9%求得。2005、2006、2007年数据见《云南经济年鉴（2006、2007、2008年）》

表 3.4 2007 年云南与次区域五国的贸易在云南省和全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

单位：万美元、%

	进出口 总额	占云 南比 重	与中国 贸易 总额	占全 国比 重	云南 出口 额	全国 出口额	占全 国 比重	云南 进口 额	全国 进口额	占全 国 比重
柬埔寨	990	0.11	93399	1.06	990	88293	1.1	0	5107	0
老挝	8339	0.95	26386	31.6	3591	17794	20.2	4748	8592	55.3
缅甸	87357	9.95	207784	42.0	64068	169970	37.7	23289	37814	61.6
泰国	22021	2.51	3463812	0.64	15680	1197343	1.3	6341	2266469	0.28
越南	97167	11.1	1511758	6.4	77773	1189130	6.5	19394	322628	6.0
合计	215874	24.62	5303139	—		2662530	—	53772	2640610	—

资料来源：云南省商务厅网站“云南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数值表（2003）”，《中国统计年鉴》（2004）。

从表 3.3、3.4 中我们可以看出，云南与次区域的经贸合作是云南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最近几年，双边贸易的增速非常快，尤其是与越南和泰国的贸易。柬埔寨作为云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稳步推进。但是如果和全国对次区域各国的贸易情况进行对比，云南仍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上，一方面说明云南对外合作水平层次低，另一方面说明云南对次区域的经贸合作的潜力巨大。如果综合云南最近几年外商投资连续下降的情况，我们发现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基础是较低层次上的经济互补性。主要包括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衔接、消除贫困、经济增长、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等。次区域经济合作重要的动因之一是利用合作方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在区域内的合理配置。由此带来的强烈的预期收益是次区域经济合作能够在较低的经济互补性基础上进行下去的保证。

其次，由亚洲开发银行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已经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亚行为 15 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 2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加上包括私营机构在内的其他合作伙伴的投入，迄今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已达 30 亿美元。⁸⁸交通、能源、农业、环境、人力资源开发等是项目的重点领域。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对次区域的合作有“示范效应”。

此外，来自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外向型偏好”极大地推动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是合作的主体，而且政府的参与使得次区域经济合作体现出鲜明的政治色彩。云南属落后地区，中央政府的支持体现在政策方面的扶持，而较少有资金等其他实质性投入。面对其他相邻省份在对东盟合作中的竞争和国内区域经济合作的“合纵连横”，云南只有从本省的区位优势出发，努力开拓对外合作的新局面，大湄公河次区域将是首选。这种由地方政府提出的政策安排使得次区域合作的成本较低，其承担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也相对较小。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予以确认或支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更乐于推动次区域的经济合作，通过借助国外的力量发展自己。这种政府主导作用成为中国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

面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遇到的问题，作为参与合作的重要一方——中国云南省，应该审时度势，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从次区域整体利益出发，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顺利进行，同时，实现自身经济的发展。因云南具

⁸⁸ 第十二次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会议会议纪要。

有的独特地理位置，处在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陆地连接的交接点上，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中国政府明确把次区域合作作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5个重点领域之一，并把次区域合作的目标定位为：把大湄公河次区域构筑成我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把大湄公河次区域构筑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行示范区。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云南省的基本思路和重点是，通过10—20年的开发建设，把云南建成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在东盟的合作上，云南省提出“服务东盟、服务全国、发展云南”的发展之路。我们很容易从这些发展思路中发现云南最大的优势就是区位优势比较优势，相对于国内其他省份、相对于湄公河五国所具有的区位优势。在次区域贸易和投资发展受制约的情况下，云南应充分发挥所具有的区位优势，通过大通道的建设，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使区位优势转化为区位竞争优势，进而实现区域竞争力的提高，促进云南经济的发展。

第三节、战略利益观——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理念

次区域国家山水相连，交往密切，资源、产业和市场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当前都面临着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艰巨任务。经过十余年来的合作，次区域国家均认为，加强合作，有助于巩固睦邻友好关系和经济联系；有利于对这一地区丰富资源的共同开发，共同受益；有利于处理好有效开发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有助于各国加速实现发展目标。提高整个地区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是次区域国家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开发目标的利益诉求不同以及历史上的恩怨等原因，当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时，次区域的合作就面临着协调困难等问题。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作为地区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的态度和政策将对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笔者认为，要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并为中国日后在次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做准备，战略利益观应该成为中国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参与观。

借鉴国际经济学中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所谓战略利益观，在笔者看来是指，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以本国在资源开发与合作中对第三方所产生的影响为着眼点，通过利益的协调沟通，以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合作观。本质上讲，战略利益观就是一种合作观，是推动多边合作顺利进行而采取的合作观。在涉及多方利益的合作领域中，我们不但要重视本国在资源开发中对别国造成的影响，而且要重视双边或多边合作中，对第三方利益造成的影响。只要各方本着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以维护地区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是

可以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的。对次区域合作来说，这里的第三方除了指代表各国国家利益的政府之外，还有非政府的民间团体以及国际援助组织等方面的力量。为什么中国要采取这样一种合作观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首先，信心和理解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亚行湄公河项目部主任 Rajat M. Nag 在和亚行首席对外关系专家 Tsukasa Maekawa 的谈话中被问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时，他说，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各国自信心的逐渐形成，正像对共同体形成的信心一样，这种信心和相互之间的信任是次区域合作能发展到现代的重要因素。⁸⁹在次区域的多边合作中，我们只有多从对方的或地区共同的利益出发，在发生矛盾和争端的问题上多沟通、多理解才能推动合作的有效开展。

其次，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大背景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开始采取积极战略，全面参与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建设，并在亚洲区域国际机制的建设中承担主导者的角色。中国正在亚洲邻国中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和经济发展主发动机的新形象。⁹⁰要和平崛起，必先取信于人。欲取信于国际，必先取信于邻。中国必须立足于邻近区域，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这又要靠我们所制定战略政策能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预期最大程度的一致。只有这样，它们才不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它们的国际利益构成威胁，能和中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发展更广泛的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地区。从长远来看，随着温家宝总理 2005 年 4 月 11 日访问印度，中印两国确定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合作必将对亚洲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处在中印连接通道上的湄公河次区域对中国面向南亚的合作作用就显得日益重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面对次区域经济合作实施战略利益观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此外，采取战略利益观也是现实的需要。当前，中国或者说云南省在次区域资源开发和合作项目建设上面临几个现实问题：一是南北经济走廊建设进程缓慢。东西经济走廊⁹¹建设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越南辽宝靠近老挝边界由两国共同建设的出口特区已吸引了 50 多家外资企业的入驻。⁹²连接老挝和泰国的跨境大桥也已建成，这些极大地推动了东西经济走廊的建设。在涉及五个国家利

⁸⁹ “Cooperation Pays, Conflict Doesn’t”, *ADB REVIEW*, Volume 36, Number 6, December 2004.

⁹⁰ *Washington Post*, Nov. 15, 2003, 转引自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08—209 页。

⁹¹ “东西经济走廊”是指由越南岷港经顺化、辽宝，通过老挝孟品、沙湾拿吉，到泰国穆达汉、孔敬、彭士洛，最后到达缅甸毛淡棉横贯中南半岛的走廊地带。

⁹² “Cooperation Pays, Conflict Doesn’t”, *ADB REVIEW*, Volume 36, Number 6, December 2004.

益且历史上有过冲突的基础上，越南、老挝、泰国和缅甸能搁置争议，协作发展。对比南北经济走廊建设的中国和次区域四国的合作，不难发现双方在合作的态度上还有某种障碍。这种障碍说到底应该是一种信任问题。二是单方面开发合作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影响估计不足，如中国澜沧江的水电建设问题。由于没能及时和有效地沟通，在水电建设过程中，对下游国家的生态和正常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在1994年漫湾的一次性清空，短时间把水放干，又整个闸门关起来，水量大幅度变化。对中国上游的单方面行为他们觉得非常有必要达成共识，就重新组成了新湄公河管理委员会，现在它成了一个很强的对抗组织。⁹³人为的这些生态灾难给我们国家在东南亚导致了很多负面影响。既然国家把通向东南亚作为国家未来长期发展的突破口，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来讲，我们就更应该照顾到湄公河各国的利益，哪怕付出一些损失和代价，一定要取得下游各国的理解和信任。三是对第三方或民间组织的影响估计不足。应该说在次区域各国总体上讲，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形成民间利益集团的基础薄弱，其力量也相对薄弱。然而，在中国和泰国，这种第三方的力量是不能忽视的。比如中国的绿色环保组织对澜沧江水电建设的反对意见，还有泰国民间环保组织和佛教组织对泰北科技园区建设的反对。泰北科技工业园区是由中国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在泰国北部投资的最大的工业项目，总投资达30亿元人民币。各方对工业园区的建设给予很高的希望。然而，不到一年时间，项目处于停顿状态，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来自这两个民间团体的反对。除了立足于本地区形成的第三方力量外，在次区域还存在关注次区域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其他国际援助或基金组织等。因此，笔者认为，战略利益观不但是中国参与和推动次区域合作，同时也是次区域各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石。

第四节、中国云南省的后发优势与空间区位优势分析

一、关于“后发优势”

从区域发展的相对差异性这一角度，将区域划分成先发区域和后发区域。所谓“先发区域”，是指发展起步较早，发展水平较高，发展阶段领先或超前的一类区域。所谓“后发区域”是指发展起步较迟，发展水平较低，发展阶段落后的另一类区域。⁹⁴先发区域和后发区域这种差异的存在具有其客观性。表现

⁹³何大明：《澜沧江水电开发对怒江开发的启示》，来源：绿家园志愿者整理，转自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2003年11月6日。

⁹⁴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在：一是资源和区位优势具有静态不可逆性；⁹⁵二是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客观性；三是制度变迁和技术创新具有时序性。⁹⁶

何为“后发优势”呢？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 Gerschenkron）。1962年，格申克龙探讨了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其核心假说是相对的经济落后性具有积极作用，即经济上的相对落后，有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爆发性的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陆德明教授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发展动因分析》一书中，初步形成了基于后发优势的“发展动力理论”框架，提出了后发国家的发展动力转化假说。他将后发优势推广到一般领域提出“后发展经济体”的概念，应该包括后发国家、后发区域、后发部门和后发企业等。这样，所谓的“后发优势”就是指后发展经济体因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或迟缓所形成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相对应，“先发优势”就是指先发经济体经济发展领先所产生的各种有利条件或创造的各种先机。⁹⁷

为什么后发区域具有后发优势呢？关于这个问题，格申克龙是从欧洲经济史的研究中提炼出以下的几个方面的：⁹⁸

1. 落后激起国民要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以至形成一种社会压力。格申克龙指出，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会产生经济发展的承诺和停滞的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激发制度创新，并促进以本地适当的替代物填补先决条件的缺乏。

2. 替代性的广泛存在。在吸收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后进国家在形成和设计工业化模式是具有可选择性和创造性。

3. 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

4. 后发国家的资源优势。后进国家自然资源为开发，劳动力成本低，这些都是工业发展的良好条件，可刺激工业发展。

一个区域要获得由区域后发优势带来的区域后发利益，必须通过技术传信和制度移植变迁驱动，而技术模仿创新和制度移植变迁又有后发利益驱动。首

⁹⁵ 李克：《适度差距与系统优化：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经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转引自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⁹⁶ 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⁹⁷ 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⁹⁸ 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张伟：《后发优势与贸易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先，区域技术性后发利益诱导技术模仿创新。其次，区域制度性后发利益诱发制度学习和制度移植。最后，区域技术模仿创新与区域制度移植变迁互动。⁹⁹

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六国来说，总体上，都属于后发展经济体，整个次区域也是后发区域，因此也就具备了利用后发优势获取后发利益的可能性。前面也已经提到，次区域在走一条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没有走过开拓性发展之路。我们有理由相信，次区域通过有效发挥后发优势能取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扭转在区域或国际经济格局中的不利地位。

二、区位和空间区位

区位理论是区域发展研究的七个领域¹⁰⁰之一。它探讨的问题是农业、工业或服务业的单个企业的最佳区位，即企业的区位选择理论；或者是在一个区域体系内所有区位的分布以及区位结构随时间发生的变动，即区位结构理论。这两个方面着重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属于综合区域理论。在这里所谈的区位是区位理论的基本要素，即点的区位属性。它包括两种类型或含义，一是绝对区位（Site），指的是一个点的经纬度位置；二是相对区位（Situation），指一种连接度和通达性度量。比较而言，相对区位远比绝对区位重要，其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地域分工的形成和发展与具有某种相对优势的区位因素密切相关。(2)一个地区的发展潜力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它的相对位置，而不仅仅是它的天赋自然条件。(3)最好的区位也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4)某一活动在某一区位的发展可以带动周围区位相关活动的发展，这是区位因素在空间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乘数效应。¹⁰¹

绝对区位（Absolute Location）和相对区位（Relative Location）合称为地理区位（Geographical Location）或空间区位（Spatial Location）。它是指地理现象在地理空间中发生和发展的具体位置。具体来讲，绝对区位又称数理区位，是指地理因素和现象在三维的地球表面的空间位置，可由经纬度和海拔高度加以精确的测定。相对区位是指一特定地理因素或现象在地理空间中与其他地理事物的相对位置关系和空间联系，可用空间距离、交通运输的难易度，以及经济、政治、社会联系来衡量。与绝对区位相比，相对区位并非一成

⁹⁹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¹⁰⁰区域发展的七个研究领域为：区域分工与贸易、区位理论、经济增长机制、区域（国家）竞争优势、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区域政策等。见陆玉麒：《区域发展中的空间结构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¹⁰¹陆玉麒：《区域发展中的空间结构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不变，而是经常发生变化，具有比绝对区位丰富得多的经济地理内涵，因而更多的被经济地理学家接受，在这里，我们所谈的云南的空间区位优势也主要是指云南所具有的相对区位优势。

三、为什么云南的空间区位能成为优势？

为什么云南的空间区位能成为优势呢？一方面，云南的绝对区位是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云南的相对区位为云南空间区位优势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位于东经 $97^{\circ} 31'$ 至 $106^{\circ} 11'$ ，北纬 $21^{\circ} 8'$ 至 $29^{\circ} 15'$ 之间，北回归线横贯南部，属低纬度内陆地区。东部与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为邻，北部与四川省相连，西北部紧依西藏自治区，西部与缅甸接壤，南部与老挝、越南毗邻，是中国陆路通向东南亚、南亚的要冲。云南的这种相对区位成为区位优势的关键是它与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实施相一致。这是云南所具有的相对区位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先决条件。

云南位于中国西部东侧，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有 4060 公里的边境线，是中国西部走向东南亚的前沿和通道。云南和中国西部与东南亚在资源、产业、人才、科技和资金等方面都具互补性。扩大云南和西部与东南亚的经济科技和人才交流与合作，对中国西部大开发特别是对云南的发展至关重要。由于受到通道的障碍，双方的交往与合作受到严重制约，区位的优势反而视为劣势。因此，开辟西部国际大通道已成为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举措。这为云南国际大通道的建设奠定了十分优越的国内环境和开发条件。

从周边和东南亚形势及国际区域环境来看，东南亚已建立的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如东盟——湄公河流域合作开发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黄金四角经济合作机制和湄公河委员会等，对建设这一地区的国际大通道早已取得了共识，云南实施建设国际大通道的建设无疑符合次区域各方的共同利益，顺应了国家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要求，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陆上通道提供了战略保证。同时，也为巩固中国和南亚地区的战略合作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经济的发展将积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从云南省的实际情况出发，发挥空间区位优势，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

四、中国云南省的“双向桥头堡”作用

云南的空间区位能成为优势，极大地增强了云南在对外经济合作中的竞争力。但是，仅仅意识到有这种优势还不行，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云南的空间区位优势表现在哪些方面，这对我们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将云南视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开放、抢占东盟市场的桥头堡已成为国内政府和学术界共识。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一桥头堡作用只是单向的，即只是从中国的立场看问题。如果我们用战略利益观看待这个问题，从东南亚国家的利益出发，云南基于区位优势空间的桥头堡作用就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一方面，借助云南的通道优势，中国内地的企业将云南视为占领次区域各国以及东盟其他国家市场的桥头堡；另一方面，对次区域各国和东盟其他国家来说，它们也想利用其自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通过便捷的陆上通道，尤其是在次区域基础设施形成比较完备的网络时，借助云南的桥头堡作用，打入中国内地庞大的市场。我们可以说，云南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而形成了相对于内外两区域的区位优势。

因此，双向桥头堡作用是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同时也是面向南亚合作的重要优势。要使这种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关键在建立完备的通道设施，形成发达的交通和通讯网络。这正是云南要积极努力去做的，也是云南积极参与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借以发展自身的重要途径。中国云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战略将在第五章研究。

第五节、区位优势转化为区位竞争优势研究

一、区位优势和区位优势

现在我们将区位优势由狭义上的地理区位延伸到包括经济学内容的广义区位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广义区位优势就是一定区域所具有的区域优势。对云南所具有的广义上的区位优势或者说区域优势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云南省通过发挥空间区位优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

区位优势，即某一地区在发展经济方面客观存在的有利条件或优越地位。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以及社会、经济、技术、管理、政治、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¹⁰²区位优势理论认为，每一个地区具有生产某一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或相对有利的条件，即区位优势。如果每一个地区或

¹⁰² 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6页。

国家根据自身优势发展特定产品生产，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地区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地利用。我们不难发现，区位优势的思想实际上来源于国际分工理论的比较优势理论。区位优势为特定区域创造经济竞争优势创造了先决条件，也成为区域选择主导产业的重要条件。

对应区位理论的两个研究领域，对企业最优区位选择的研究形成了以邓宁（Dunning）为代表的跨国企业选择理论；对区位结构理论的研究形成了区域产业聚集理论。但是，这两个研究领域并非各自独立，区域产业聚集的形成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已成为跨国企业区位选择考虑的重要因素。

区位优势的理论来源于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竞争优势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区位优势，是特定区位系统在特定阶段所具有的低成本优势和高效率优势的集成。低成本优势主要来自要素禀赋及资源的获取方式，是初级的区位优势；高效率优势来源于持续的创新，属于高层次区位优势，二者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层次性。区位优势是一个动态的集成系统，低成本优势和高效率优势可以在特定区位同时并存，其核心是基于集聚效应相关企业集群。集成动力体系包括：一是特定区位对所在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辐射能力，这是区位优势形成的基础；二是特定区位相关产业存量基础、资源获取成本、对资本和技术的吸纳能力，这是生成高效率优势的重要支撑和竞争优势循环升级的基础；三是特定区位创新基础，包括人力资本结构与素质、创新文化、信息质量等，这是高效率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四是特定区位对产业链的融合能力，这是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的关键。¹⁰³

二、为什么云南要向高效率区位优势转化？

由于低成本优势所依赖的要素禀赋及资源获取方式是能够被替代的，且通过降低成本而取得的领先优势只是暂时和有限的，资源的稀缺导致成本上升，进而化解低成本优势；技术革新所形成的初级高效率优势也是因全球技术扩散而无法持续，只有创新所生成的高效率优势可以根本上改变区位优势格局，进而从根本上提升产业竞争力。这也就从理论上论证了由低成本优势向高效率优势转化的必要性。

云南面临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首先，对次区域各国来说，都属于后发经济体，都具有后发优势，而且，柬埔寨、老挝、缅甸以及越南，它们和中国云

¹⁰³ 张明之、乔蔚虹：《基于区位优势的产业竞争力：整合与升级》，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南相比，发展更为落后，也就意味着它们国内生产成本更低。因此，把云南放到整个次区域里，其具有的低成本优势就不明显了。其次，我们说低成本优势来自于要素禀赋及资源获取方式，也就是比较优势，通过国际贸易我们能获得比较利益。过去包括现在，我们太强调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和次区域几个国家的贸易中，我们有绝对的顺差。但是，面对这些国家日益拮据的外汇支付能力，贸易风险正在逐渐加大，云南该如何应对？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此外，我们强调次区域是一个大市场，有巨大的商机，实际上，这都是潜在的，需要我们去建设、去开发。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索取，势必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最后，从云南省的实际情况来看，笔者不认为云南有足够的实力去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顺利进行，并发挥主导作用。作为一个欠发达地区，云南和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就拿最近的四川省，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云南都没有优势。

那么云南未来经济发展以及参与周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建立在区位优势基础上的高效率区位优势是云南最核心的竞争力。其本质是培育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和构建产业聚集区。因为在区域经济中特定的产业链布局和产业集聚有助于强化区位优势：产业链布局取决于产业分工，在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产业流程中的环节集中反映了该经济区位的竞争优势；集聚效应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反映，并且也是影响区位优势的重要因素。云南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向高效率的竞争优势的转变就成为云南的必由之路。

第四章 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战略研究

中国云南省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经济走廊建设是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路径和突破口，同时也是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形式，并将对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经济走廊建设自 1998 年启动以来对次区域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推动作用。2008 年 3 月 27 日~28 日在昆明主办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合作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 年 3 月 30 日~31 日温家宝总理在老挝万象出席 GMS 第三次领导人会议，提出了成立 GMS 经济走廊论坛的倡议，得到了 GMS 其他国家及亚行的支持，并作为一项重要会议成果写入领导人会议宣言。2008 年 6 月 6 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论坛在昆明正式成立。由此可见，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走廊建设仍将是次区域合作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云南省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走廊指的是在亚洲开发银行主导下的，在域内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和中国云南省，以一条或几条主要**交通能源干线**贯穿南北或东西为主线，沿线大力发展各种优势特色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条带状经济区。

其中的主要交通能源线指的是铁路、高等级公路（高速路和一、二级公路）和拟议中的油气运输管道。

根据亚行 2002 年发布的《未来 10 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框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初步研究规划共有五条，其中涉及中国云南省的主要有两条，它们是：

南北走廊中线（NSEC1）：昆明—会晒（大其力）—清迈—曼谷；

南北走廊东线（NSEC2）：昆明—河口—河内—海防。

本章将就这两条经济走廊的概况、特点，对中国及云南省的意义、影响以及今后的发展对策作一粗浅的论述。

第一节、 两条 GMS 经济走廊的概况和特点

一、南北走廊中线（NSEC1）

南北走廊中线北起中国云南省昆明市，沿昆曼公路（中国境内为昆磨公路）经玉溪、思茅、景洪、磨憨出境入老挝；再沿修建中的昆曼公路老挝段经琅南塔和会晒跨湄公河入泰国，期间走廊放射状地带也把缅甸东北角的孟拉、景栋和大其力包括在内；走廊入泰国境内后沿昆曼公路泰国境内段经清莱、清迈、达府、猜纳到达终点曼谷，经曼谷港入泰国湾。

该走廊全线长 1900 公里（按昆曼公路里程计算），其中中国云南省境内 766 公里，老挝境内 248 公里，泰国境内 886 公里。该走廊是五条走廊中长度最长、辐射面积最大的一条。其延伸方向是先偏向西南少许，然后在清莱附近直向正南。

该走廊最明显的交通主干线就是昆曼公路（昆明—曼谷高等公路）。目前云南省境内的高等级路面已占全部线路的 2/3（其中高速路占大多数），剩余部分的高等级路面改造已于 2008 年完成，而泰国境内除与老挝接壤的湄公河沿岸地区的几十公里外已全部建成高等级公路（其中大多数为高速路）；老挝境内 248 公里路面为等外公路，由中、泰、亚行各负责 1/3 路段的高等级公路改造工程，也于 2008 年完成。

该走廊目前还没有铁路主干线，仅泰国境内从清迈到曼谷有一条约 700 公里的米轨铁路，因年代久远、设备老化、运力有限，难担干线重任。

在走廊的中国段，昆明—磨憨铁路线一直都在论证研究中，最近经国家批准的《云南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提出：“中线从玉溪经思茅、景洪至磨憨铁路在 2008 年开工建设，总行车里程约 600 公里，预计总投资将达 200 多亿元，工期为 6 年。”而作为起始路段的昆明—玉溪 90 公里铁路线早已通车。¹⁰⁴

湄公河航运在本走廊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湄公河中游中、泰、老、缅 4 国于 2002 年签订通航协定和有关议定书，经三期航道清障改善工程，目前自中国思茅至老挝会晒 400 多公里河段可顺利通行 150~300 吨客货船只。仅 2004 年，自中国景洪至泰国清盛段货运量就达 26.5 万吨，同比增长 20%。

¹⁰⁴前几年也曾有过泛亚铁路中线一说。铁路有昆明自磨憨出境后，偏离昆曼公路主线，沿老挝中部原有通道自北向南经勐赛、琅勃拉邦、勐蓬抵达万象，然后跨湄公河到达泰国廊开并与泰国铁路相接，经孔敬、呵叻、沙拉武里到达曼谷。不过这条线从老挝境内起即偏离本走廊，不在本文论述之内，况且最近几年也不再提及了。

昆明至曼谷的空中航线十分通畅，平均每天可达两个航班，同时沿途景洪、清迈等城市均可起降民航飞机。

本走廊的水电资源十分丰富，能源开发利用的情景良好。目前沿澜沧江—湄公河云南省境内有五个水电站，有的已经建成运行，有的正在施工，有的正在规划研究。1998年11月中泰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泰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购电的谅解备忘录》，泰方表示希望到2017年从中国云南省（主要是景洪电站）购买300万千瓦时的电力。上述各电站工程均通过了严格的环境评估审查。2003年10月，中泰两国有关部门签订框架协议，中国将于2013年和2014年分别以500千伏线路向泰国各送电150万千瓦时。

该走廊沿线地区经济各产业发展情况差别较大。相对来说，中国云南省部分区域和泰国大部分沿线地区较好，云南省部分地区和老挝较弱。

云南省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只能算是中等偏下，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均排在全国30多个省市区的20位左右，但区位特殊、资源丰富，有一些产业如水电、冶金、烟草、生物制药、机电、农林产品加工等都相对发达。

在走廊云南省境内占多数的山谷河谷地带，农业相对发达；沿途几个较大行政中心和城市都有一些特色产业，有些在全省甚至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如昆明的机电制造、玉溪的烟草、元江的热带作物、磨黑的盐业、思茅的水电、普洱的茶叶和西双版纳的旅游等等。而昆明是中国西南地区最著名的经济发展中心之一，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起点。

走廊老挝境内的南塔、波乔两省就是在老挝国内也属偏远欠发达地区，主要是农业自然经济。

走廊泰国境内有三大经济发展区，一是清迈—南奔地区，二是清莱—清孔地区，三是曼谷—大成地区。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泰国北部的经济中心，矿产资源如锡、石油、褐煤、铁、锰、铝、锑等十分丰富，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工业主要是一些农业和轻工业加工，是泰国除了曼谷和泰国沿海之外的第三大旅游区。清莱—清孔地区位于泰老、泰缅边境地区，北距中国边境200多公里，地理区位十分重要。该地区有一些加工工业，但最为有名的是旅游业（著名的金三角地带）。近年来在清孔地区正在兴建中泰合作的“泰北科技经济贸易开发区”，将建成中期5平方公里，远期30平方公里的加工区、贸易区和物流区。曼谷—大成地区是泰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东南亚最著名的金融、旅游、服务业中心之一；曼谷是湄公河次区域最大的国际化都市，有本地区最著名的现代化港口，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十分发达。

本走廊在五条走廊中，长度最长面积最大，位置最重要（位于次区域中心地带），涉及国家最多，现有基础设施和建设基础较好，建设前景十分光明。

但本走廊在吸引国际支持和重视的程度上不及东西走廊和南部走廊。

中方有关研究部门于 2006 年初完成了《昆明—曼谷经济带（云南部分）2006—2020 年发展规划研究》报告。

二、南北走廊东线（NSEC2）

该走廊北起中国云南省昆明市，大致沿滇越铁路与红河经中越边境城市河口经老街至越南首都河内，再向东行 100 公里至越南北方最大港口城市海防。如按铁路里程计算，该走廊长约 900 公里。走廊呈西北—东南向倾斜，只涉及中越两国。主要交通设施年代久远，有铁路、公路和水运等。

滇越铁路（米轨）自昆明经河内至海防全长 900 公里，其中中国云南省境内 470 公里，越南境内 430 公里。该线建成已近百年，设备陈旧、线路崎岖，运力十分有限。2001 年该线云南省境内国内货运量为 650 万吨，国际货运量为 60 万吨，不仅远远低于云南省内其他铁路的货运量，也远远低于滇越公路货运量。在客运方面国际联运早已停开，国内客运也已停止，中国旅客去河口、越南大多选择汽车和飞机。

但这条铁路越南段情况稍好，货运量超过公路，旅客大多选择乘火车。

目前在中国国内，修建新的准轨铁路线以代替旧有滇越铁路已成定局，在昆（明）—玉（溪）原有铁路基础上，玉（溪）—蒙（自）铁路已经动工，蒙（自）—河（口）铁路正在研究规划中。

据了解越南现已筹款 1.6 亿美元准备进行河内—老街的铁路改造升级工程项目，其中亚行“亚洲发展基金 ADF”贷款 0.6 亿美元，法国贷款 0.8 亿美元，越南政府自筹 0.2 亿美元。

公路方面，昆明至海防线路全长 912 公里，其中中国云南省境内 443 公里，越南境内 469 公里。

中国境内，443 公里路面已于 2008 年全部建成高速路。

越南境内，从老街到保胜 36 公里与河内至海防 107 公里为高速路，由宣光附近端雄至河内 151 公里为 2 级公路，其余为 3~4 级公路。据了解，越南分两批筹款 6 亿美元，已于 2007 年动工兴建老街—河内—海防高速公路。其中亚洲银行贷款 3.1 亿美元，政府自筹 1.8 亿美元，国外融资（COFINANCING）1.2 亿美元。

元江—红河发源于中国云南省的巍山县，沿东南方向流至河口县进入越南，经河内在红河三角洲注入北部湾。干流全长 1248 公里，其中云南省境内 692 公里，越南境内 556 公里。历史上滇越铁路通车前它曾是中越双方交往的主要通道，滇越铁路通车后红河航运逐渐衰落，现在航运条件很差，中上游基本不能通航，下游自越池以下勉强可通 300 吨以内船只。如果从走廊区域来看，红河在中国境内仅从蛮耗开始算起至河口近 100 公里，而红河越南段全部位于走廊范围内。

中越双方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进行红河航运通航开发的接触，双方政府有关部门也已原则上同意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与合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展不大。

中方近期将重点整治蛮耗至河口段 97 公里航道，提至 7 级航道水平，并建设河口、蛮耗码头，共投资两亿元人民币，目前正在研究规划中。

越方对红河航运开发也是十分重视和积极的。从 1996 年开始分两个阶段，在亚洲开发银行和日本政府的资助下，荷兰的 HASNING 设计所和日本的港口理事会分别完成了两个可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主要内容是改变出海口，建设新航道并提高至 1~2 级航道水平（3000 吨海轮从太平省河口直溯河内）；同时越南本国研究设计人员也完成了红河越池至安沛段的航道改善的可研报告，目前由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评审。

走廊内航空运输也于几年前开展起来，目前由昆明至河内有越南航空公司的航班每周三次执行航班任务。

走廊中国境内的能源发展以火电为主，沿线有几座中等规模的火电厂。越南境内靠近走廊的区域有现时越南最大的和平水电站（装机容量 190 万千瓦），目前准备兴建号称东南亚最大的山萝—莱州梯级电站，预计装机容量为 600 万千瓦（其中山萝 240 万千瓦，莱州 360 万千瓦），现已完成可研报告，将与外国合作进行工程设计。

2004 年，云南省电力集团与越方合作，在中国河口与越南老街之间建成了 110 千伏电压等级送电项目，这是中国首次向国外大规模输电的开始。按双方签订的合同，一年内云南省电网将全天候向越方供电。2005 年全年供电量两亿千瓦时，达到合同设计指标，供电范围覆盖越南北部、中部 31 个省。

走廊的中国境内和越南境内均属开发较早地区，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中国境内以个旧、开远、蒙自为中心的有色金属采掘与产品加工业已为时百余年，越南境内河内海防的轻手工业和进出口贸易业向来兴盛。虽因战乱和政治原因几度沉浮几度萧条，但近十几年来迎来了最快、最好的发展阶段。

中国境内，昆明市如前所述是中国西南地区最著名的经济发展中心之一，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起点，尤以各种制造业较为发达，高新技术产业亦形成一定规模。走廊沿线的个旧、开远、蒙自地区将建成“个、开、蒙”城市群，其总体定位是：面向东南亚的现代化开放型大城市，综合实力雄厚，特色鲜明，环境优美，成为滇南中心城市和滇越通道枢纽。总体框架是：“一城四区”，即“个、开、蒙”城市群，包括蒙自中心综合区、红河工业开发区、个旧矿产开发区、开远商贸物流区，建成滇越高速通道。

中越边境的河口—老街地区将建成现代化口岸商贸区和加工储存区。

中越双方有关研究部门于 2005 年底合作完成了《昆明—河内—海防经济走廊建设研究》报告。

走廊越南境内的主要经济带是红河下游平原。在联合国计划发展署（UNDP）的支持资助下，越南政府有关部门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制定了“红河平原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总体规划”包括：“红河平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报告”，30 个行业规划报告，7 个省市规划报告，13 个重要领域和跨领域的专题报告。

红河平原地区是越南全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中心，也是越南全国的两大经济中心之一。这里地理位置优越，是越南北部各省市与世界各国联系的交通枢纽和通商口岸，也是中国西南各省市最近的出海口。越南首都河内和全国第三大城市、北方最大海港城市海防都位于本区。

本区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气候适中。域内工业相对发达，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农业经济较为先进，是全国两大米仓之一，耕作水平高于越南其他地区。本区也是越南全国科学技术中心，科研人员数量占全国总数的 57%，大学和研究院所占全国总数的 64%，集中了全国几乎所有行业、学科的研究院和科学中心。本区总的发展目标：本区经济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速度高 20~30 个百分点，2006—2010 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4%；生产力达到相对现代化水平，全区基本实现电器化。在红河平原将建成 5 个开发区群，共 21 个经济开发区，行业和领域各有侧重。

昆明—河内—海防经济走廊单从面积、长度来说是五条走廊中最小的一条，单从涉及国家来说也是五条走廊中最少的一条。但从开发规模、现有条件方面是五条走廊中较强较好的一条，而且是开发历史悠久，人文社会发展水平高，有一定的国际支持。其最大的弱点是偏离澜沧江—湄公河主线和中心区，属红河流域，只涉及中越两国，其他次区域国家置身事外，不利于整个湄公河次区域的整体经济合作，因此国际支持程度有限。

根据 2005 年 7 月第二届 GMS 领导人昆明峰会的精神，已于 2008 年初步建成东西经济走廊（指主要交通框架，下同），于 2010 年初步建成南北经济走廊。

第二节、经济走廊建设的战略意义

修建 GMS 南北经济走廊对中国及云南省对外开放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分别从地理区位、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和政治作用中体现出来。

一、地理区位

NSEC1 位于云南省中南部和中南半岛中部，地处东盟和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中心地带。由于泰国是东盟和次区域合作的十分重要的关键性国家，而本走廊在中国境外线路大部分经过泰国，有利于充分利用这个区位优势，争取更多重视和支持。

现在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对南亚、中东、非洲和欧洲的进出口货物，都要先经过华东、华南的沿海港口装船，再沿南海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安达曼海。如果将来 NSEC1 建成，再连通东西走廊至缅甸东部港口城市毛淡棉港。以中国西南至中东国家为例，NSEC1 新通道与老通道相比，每趟大约缩短航程两天，节约成本 15 万美元左右。如果能在 NSEC1 连接毛淡棉线路上再修建一条铁路（我们称为“泛亚铁路新中线”），那么效益将更高。

NSEC2 是中国云南省最近的出海通道，从昆明到海防仅 900 多公里，可以就近组织沿线和靠近地区的进出口贸易。但是现在云南省有昆明—南宁铁路，从昆明至北海港和防城港均不到 1100 公里，而且出海后与 NSEC2 一样均需绕行马六甲海峡，因此 NSEC2 的地理区位优势有限。

二、经济发展

两个 GMS 南北经济走廊 NSEC1 和 NSEC2 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和好处都是巨大的，这也是修建这两条经济走廊最主要的原因。两个经济走廊在经济发展上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下七个方面：

1. 有利于推进重点地带的可持续开发，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带

NSEC1 和 NSEC2 云南省部分有着丰富的矿产、水能、森林、生物、气候等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有较强的经济技术基础，目前已经形成了烟草、旅游、矿产、生物资源开发、制药、机电、林纸、农特产品加工等有特色的支柱产业和重点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了昆明—玉溪—思茅—景洪城市带和昆明—开蒙—河口城市带，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同时拥有一定的科技与教育基础，文化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如果借 NSEC1 和 NSEC2 的建设，在交通、能源、基础设施方面有超常和较多的投入，就会加大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预计该两区 GDP 增长速度将超出云南省平均速度 15%~20%，从而带动和拉动整个云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

2. 有利于云南省及各沿线地带深化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对外贸易

2004 年，云南省外贸出口额是 22.4 亿美元，进口额为 15.1 亿美元，进出口额比 2003 年度增长 40%，但外贸依存度只有 10.5%，与全国平均 70% 以上的外贸依存度相距甚远，当年进出口额仅占全国总额的 0.3%，这种情况与云南省地处大湄公河次区域的重要地理区位极不相称。而建设两个经济走廊，对外通道变得更加便捷通畅，可以进一步引进外资和人才技术，云南省也可以“走出去”投资合作，这样就能够极大地促进云南省对内对外的经济技术合作和对外贸易，改变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3. 有利于促进沿线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

云南省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很快，但主要偏重于省内和国内其他省区的联系，与国外连接不够。如能建成 NSEC1 和 NSEC2，在交通方面，就能以高等级公路、铁路、水路、能源管道等方式与 GMS 各国连接起来；在能源方面，也能以输电方式与邻近 GMS 国家互通有无。

4. 有利于加快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促进沿线贫困地区尽快脱贫

两个经济走廊的沿线地带多数是农村地区，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贫困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在沿线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大约占农村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这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于城镇和交通沿线地带。前些年欧盟曾在 NSEC2 的红河、元阳地区有一个农村扶贫援助项目，取得了初步成果。如果这两条经济走廊建成，将大大拉动对外贸易和基础设施服务业，从而促进沿线农村农业的发展，改善农民生活，促进贫困地区尽快脱贫。

5. 有利于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发展产业

在 NSEC1 和 NSEC2 沿线地带，原有经济产业虽比较丰富，但不齐全，尤其缺少外向型服务业、加工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如果两条经济走廊能够建成，对上述产业的需求将成倍增长，非常有利于建立和发展这些新的产业，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稳定发展。

6. 有利于促进旅游事业发展

目前中国云南省与 GMS 其他国家的相互旅游事业发展很快，但受交通基础设施限制较多，尤其是陆路和水路难以形成气候。在 NSEC1 和 NSEC2 建成后，将大大增强以高等级跨国公路为主的陆路和以澜沧江—湄公河以及元江—红河为主的水路游客输送能力，从而大大促进整个地区旅游事业的发展。

7. 有利于缓解油气运输“瓶颈”问题

如果将来 NSEC1 与东西走廊 EWEC 能够相结合（公路、铁路和管道），将形成缅甸印度洋港口经泰国、老挝至中国西南地区的油气能源通道，将比现时经马六甲海峡的通道在时间和成本上各节省大约三分之一。它将分流而不是代替马六甲通道。

三、社会与环境

两条经济走廊 NSEC1 和 NSEC2 在社会环境方面的积极意义与影响。

走廊的建成能够参加人口合理流动。通过让当地居民从不适合人居住的偏远山区向走廊沿线迁移并就业，即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又避免了人口过分向大城市集中迁移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走廊的建成能够间接促进人口素质的提高。在走廊沿线就业的人口可以得到与国际接轨的专业技术培训，从而大大提高他们的文化和专业技术素质。

走廊的建成能够增进沿线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和团结。两个南北经济走廊的云南省部分除汉族外，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所在地区建有西双版纳、红河、文山三个民族自治州和 10 多个民族自治县，有傣、苗、瑶、壮等民族跨境而居。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人民生活还不富裕。中国中央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制定了“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出台了许多优惠倾斜政策。而 NSEC1 和 NSEC2 的建设则有助于这些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从而增进这些地区的安定和团结。

走廊的建成能够促进公民的环保意识的提高。NSEC1 和 NSEC2 的建设会涉及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修建项目，这些项目经过严格的环境评估这个过程，会大大提高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重视，从而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最近完工的 NSEC1 骨干公路之一的思茅一小勐养高速路，被一致认为是一条“生态公路”、“环保公路”，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走廊的建成能够促进提高公民对社会丑陋现象的警觉和抵制。从理论上讲，随着经济走廊的建设与建成，对外交通更便利，贩毒、艾滋病、人口非法流动等社会丑陋现象蔓延和流传的危险会增加。但如果从一开始就重视这个问题，及时制订相应对策措施，与中国国内的“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紧密结合起来，则不但能够有效地预防和减轻这些社会丑陋现象的发生和蔓延，而且能够促进提高公民对它们的警觉和抵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政治与安全

两个经济走廊在政治与安全方面的意义主要在于：

1. 有利于中国开展周边及多边合作，促进与周边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友好合作关系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GMS 是在我国周边地区（还包括我国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的多边合作机制，除我国外其他五国（越、老、缅、柬、泰）均为东盟国家。积极参与 GMS 合作，完全符合我国注重周边与多边合作以及“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战略。

虽然多边合作机制可能会在办事程序上复杂一些、繁琐一些，但它在吸引国际重视和支持方面具有优势。可以通过两条经济走廊的规划和建设，把中国与其他 GMS 五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各国在经济上互为依存，在政治上也有共同利益，而中国在多边合作中可以发挥更加积极、更有活力的作用，极有利于我国“多边合作、稳定周边”和“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外交方针的实施；同时可以增进我国与 GMS 国家的友好关系，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2. 与国际接轨，吸引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参与与支持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目前有三个机制：亚洲开发银行主导的域内 6 国参加的“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机制，东盟主导中国参与的“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AMBDC）”机制，湄公河下游四国主导中缅为对话国的“湄公河委员会（MRC）”机制。

从更高层次来说有中国与东盟合作的“10+1”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与东盟合作的“10+3”机制，以印度为主的南亚联盟与东盟的合作机制（已签订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以及欧盟与东盟的合作机制等。所以东南亚地区成了当今世界上最活跃、最开放的地域之一，东盟也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吸引人的国际区域性组织之一。NSEC1 和 NSEC2 经济走廊是 GMS 合作机制下的一个重要的综合项目，同时它的某些具体内容如湄公河航运业可纳入 AMBDC 合作机制，而且总体上还可以把它纳入“10+1”“10+3”合作机制之中。因此非常吸引域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对 GMS 经济走廊的关注、重视和支持。

3. 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NSEC1 和 NSEC2 经济走廊的建设与建成，将促使 GMS 国家在共同的利益和利害关系下团结起来，求大同存小异，开展紧密有效的合作，共同发展经济贸易，共同解决存在的社会环境问题，共同争取国际上的支持，永做“好朋友、好伙伴、好邻居”，有利于促进该地区的持续和平与稳定。

4. 改善能源安全态势

两条南北经济走廊的建设与建成，再加上与毛淡棉—峴港东西走廊的连接，将有可能形成新的更为便捷、更为有效的油气资源国际运输通道。随着能源运输瓶颈问题的缓解，能源安全形势将得到改善，从而将增进该地区政治与社会的稳定。

两条南北经济走廊对域内其他国家具有对中国同样的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的效益和必要，本文在此不再详述。

第三节、推进经济走廊战略的措施

由于建设 GMS 南北经济走廊地带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各项建设已有较大进展，因此今后重点应从基础设施的综合统筹、补充完善，新路线提出以及基础设施基本建成后的产业选择与布局、通行与贸易投资便利化、生态环境等方面考虑相应的措施。

一、指导原则

对 NSEC1 和 NSEC2 今后发展的指导原则应该是：连接新通道，铁路为纽带，统筹加综合，研究促规划。就是说，两条走廊建设的重要目的和意义是建

立新的连接东亚大陆与印度洋的国际运输通道；而这两条新通道的主要发展方向是铁路，它可作为纽带把有关各国各方的利益紧密相连；无论是沟通、研究和规划，都要综合考虑走廊建设的产业布局、贸易便利化、基础设施保障、生态环境、国际支持等因素。

二、经济走廊外延战略

1、结合 NSEC1 的规划研究，建设新的国际运输通道

把南北走廊 NSEC1 与东西走廊 EWEC 结合起来，在 NSEC1 和 EWEC 的主干道高等级公路全面完工时，连通昆明—磨憨—会晒—清莱—答府—毛淡棉国际通道，作为新的连接东亚大陆与印度洋的最便捷通道，用做进口贸易与能源合作的最佳途径。

2、修建“泛亚铁路新中线”

1998 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首提修建“泛亚铁路”倡议，得到有关各国各方的积极响应。其中的中线方案计划从中国昆明起大体沿昆明—曼谷公路（即 NSEC1）的中老边境的磨憨，入老挝境内后经勐赛、琅勃、勐蓬洪抵达万象，然后跨湄公河到达泰国廊开并与泰国旧有米轨铁路相接并直抵泰国首都曼谷，再经马来西亚到达新加坡。

设想的“泛亚铁路新中线方案”北端与老中线一样，起于昆明，沿目前中国国内已规划的铁路（即大体上的 NSEC1）至中老边界的磨憨—磨丁，然后不再向东南万象方向，而是继续沿昆曼公路（即 NSEC1）向西南方向，经老挝的南塔、会晒和泰国的清迈、清莱、南邦到达府，从答府起离开 NSEC1，沿“GMS 东西经济走廊”主干线公路向西行 150 公里，抵到缅甸的印度洋港口毛淡棉。线路全长 1640 公里，其中中国云南省境内 600 公里，老挝 250 公里，泰国 640 公里，缅甸 150 公里。

泛亚铁路新中线的提出，是因为需要弥补上述新的东亚—印度洋国际通道公路运力的不足，对能源运输特别能起重要作用。

3、NSEC2 增加一条连接中国广西的支线

由于 2005 年中国广西加入 GMS 合作机制，需要一个综合性发展计划融入 GMS 合作，而在 NSEC2 的中间点河内，再向中国广西首府南宁延伸一条支线，就可顺利解决这个问题。这条长度仅 400 多公里，自然条件很好，交通基础设施及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发展水平较高，更有中越两国已经制订的“两廊一圈”合作计划包含了该线地区。这样增加了一条支线的 NSEC2 就显得更加完整，更具活力。

三、经济走廊建设的关键环节

1、注重通行与投资贸易便利化

经济走廊建成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各相关国家之间的通行和随之而来的贸易投资能否顺利和便利进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基础设施就发挥不了相应的作用。目前各有关国家的边防、海关、检验检疫和贸易投资管理部门虽然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签订了许多协议和议定书，但显然还不能适应经济走廊建成后的便利通行和贸易投资扩大的局面。因此有关各方面应该对此加强沟通和研究，制订相应的实施措施和法规。

2、综合考虑生态环境与社会安全问题

GMS 经济走廊能否真正建成，建成后能否有效运行并产生效益，关键之一就是要看生态环境与社会安全问题是否受到重视，是否有坚定、明确、有效的政策措施和保障监督机制，建议沿 NSEC1 和 NSEC2 建立两条环境生态走廊，以高等级公路建设中的环境生态措施为基础，综合配套，逐步扩展，推广至全线和每一项开发项目中。

3、统筹综合，开展 GMS 经济走廊的综合研究、规划工作

目前虽然亚洲开发银行公布了 GMS 经济走廊的走向和项目清单，对其中一些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资助并与相关国家合作开始实施，但总的说来还处于分散和个别状态，总体考虑和统筹综合（如产业的选择和布局）还不够，不利于促进经济走廊的总体规划和相关国家的密切合作。因此，由亚行联系，在 GMS 框架内建立中、泰、老、缅 NSEC1 协调机制，就走廊建设工作进行沟通协调，组织相关各方综合研究、规划活动，显得十分重要。

4、充分利用湄公学院的平台，举办 NSEC21 和 NSEC2 学术研讨交流活动

作为 GMS 经济走廊研究和规划的必要前提，必须要组织相关各方专家学者的交流研讨活动，加强沟通和相互理解，为合作推进打下基础，而设在泰国孔敬的区域性国际培训组织湄公学院正好可以提供一个便捷的平台和渠道。因此，由湄公学院组织，亚行或其他国际组织支持，举办有相关各方面专家学者和国际组织官员参加的 NSEC1 和 NSEC2 综合学术研讨会，提出思路与建议，供有关政府部门参考，也是十分必要。

第五章 中国云南省对外开放：桥头堡战略研究

当今世界，是一个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既和谐发展又充满竞争的世界，这不仅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发展放到了国际化的平台上，也使一个国家中的一些区域的发展政策因其置于这一条件而上升为次形态的国家战略。

中国云南省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地区，也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实施西部大开放战略以来，云南省根据中共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结合云南省的实际，提出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三大目标，实施可持续发展、科教兴滇、城镇化和全方位开放四大战略，突出又好又快发展这个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使云南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

2009年7月，胡锦涛同志在云南省考察工作时提出，要充分发挥云南省作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的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使云南省成为中国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这既是云南省开放发展的必要要求，也使中国富国强国强边的重大决策。中共云南省委顺势而谋，提出了中国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重大决策。2011年5月6日，《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正式颁布，标志着酝酿已久的“桥头堡战略”已成为东南亚和南亚进一步开放的国家战略，而且正式进入实施阶段。¹⁰⁵

第一节、“桥头堡战略”概述

2011年5月6日，《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颁布，标志着酝酿已久的“桥头堡战略”正是进入实施阶段。¹⁰⁶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不均衡、不确定性仍然突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有序推进，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的势头强劲，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剧烈变化，中国经济社会既持续快速发展又面临深刻复杂矛盾的历史背景下，立足战略全

¹⁰⁵ 《云南桥头堡战略凝聚着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各级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深情关怀 鼎力支持》，《云南日报》，2011年5月31日

¹⁰⁶ 《云南桥头堡战略凝聚着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各级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深情关怀 鼎力支持》，《云南日报》，2011年5月31日

局和长远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边疆长治久安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意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云南省省长秦光荣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专访时表示：“桥头堡战略的实施，对云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云南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¹⁰⁷

一、“桥头堡战略”的内涵

桥头堡是陆桥经济研究中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重要概念。港口的性质，运输线路的便捷和政府部门的定位是确定桥头堡的主要依据；融国际运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国际商贸中心，是桥头堡的主要功能定位。比如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连云港，指的是一个经济带的起点城市。”¹⁰⁸

不少学者借用了上述界定，在承认“桥头堡是陆桥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后，将“桥头堡”引申为“中国加强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广大印度洋沿岸国家合作的重要支点”，并进一步阐述说“这里的‘桥’就是通道，‘头’就是前沿，‘堡’就是基地。”也有学者总结说：“桥头堡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具有控制力、发展力和影响力三方面的特征要求。”

因此“桥头堡战略”，是指以沿边省区作为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的重要支点，以连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大通道建设为基础，以外向型特色产业基地为依托，以促进沿边省区与周边国家互利互赢为目的，将中国沿边省区的开发开放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统筹考虑在国家战略层面所进行的长远规划与布局。

严格来说，不是只有云南省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才是唯一的“桥头堡战略”，它只是国家沿边对外开放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如果没有特别指出，后文就以“桥头堡战略”来代指云南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

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知道：

“桥头堡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

¹⁰⁷ 秦光荣：《桥头堡战略对云南具有划时代意义》，《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6月20日

¹⁰⁸ 参见：baike.baidu.com/view/1993845.htm 2011-4-15

“桥头堡战略”是国家指导沿边省区对内对外开放的整体思路与长远规划，它明显不同于各省区自己制定的经济社会“五年规划”或“中长期规划”，它是国家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带有战略性、全局性和长期性。

“桥头堡战略”是国家沿边开发开放战略

强调“桥头堡战略”与沿海地区、中部地区战略规划的不同，主要是中国陆地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总体布局，这就是要求“桥头堡战略”必须结合陆上沿边地区的具体实际来进行科学谋划。

“桥头堡战略”是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战略

“桥头堡战略”是外向型战略，必然涉及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是以连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大通道建设为基础，以外向型特色产业基地为依托，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区域合作战略。

“桥头堡战略”是政府主导型对外开放战略

“桥头堡战略”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战略，各级政府在战略的实施中发挥着规划、组织、领导和协调的重要作用，以科学制定《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总体规划项目2020年》为先导，以重点城市与国际大通道为依托，以重大项目和产业基地为抓手，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结合，上下联动，内外配合，汇集各方面力量来推动“桥头堡战略”的实施。

二、“桥头堡战略”的重要意义

建设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是中国进一步扩大沿边开放，提升开放水平、构建和谐周边、促进世界和平的一个重大战略，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构筑西进通道，扩展经济合作范围

1. 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和层次

以云南省为支点构筑中国进入印度洋的西向贸易通道，将进一步完善中国“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促进”的中、对外开放布局，进一步凸显云南省在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2. 加快推进和谐周边的建设

有利于将陆地接壤优势转化为合作发展潜力，落实“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政策，增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信任和长期友好，加快推进和谐周边建设，为确保国家长期战略目标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格局。

3. 构建“大周边”外交战略

有利于不断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互利共赢的周边区域合作，积极促进中国与西南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突破中国-东盟经济合作范围，构建东南亚、南亚、西亚与泛印度洋经济合作圈。

（二）突破“马六甲困局”，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主要侧重于面向太平洋的东部开放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进入印度洋需绕道马六甲海峡才能达到印度洋沿岸各国。目前中国大约 40% 的对外贸易货物 90% 的进口原油运输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随着中国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和贸易结构的不断优化，加上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这条通道的局限性和风险性日益突出：一是运距远，运时长。内陆省份尤其是西部省份从广州、湛江、北海等地出海达到印度洋仰光、加尔各答、卡拉奇、亚丁、赛得等港口，比从昆明经缅甸进入印度洋达到上述港口运距平均要多走 3400 公里，即 1836 海里，按 13.5 节国际航运平均航速计算，运输时间将多用 6 天。二是通道安全形势严峻。近年来一些国家不时在中国南海挑起事端，企图对中国进行围堵，使中国从东向南进入印度洋的海上贸易通道面临极大风险。因此，扩大向西南开放，开辟一条从陆上通往印度洋的贸易通道，对于缩短中国海上运距，拓展国际发展空间，降低高度依赖马六甲海峡的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意义重大。

（三）“桥头堡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的务实之举

历史上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有着密切的地域、经济联系，在商品交换、民族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有共同的利益。现实中在经济发展上有差异，在农业产业上有梯度，在资源上有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虽然在农产品贸易、吸引外资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但双方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层次和科技水平等方面存在梯次差异，决定了双方的互补性的广泛的合作前景。

东南亚、南亚及其他印度洋沿岸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人口超过世界的40%。随着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内消费也快速增长，市场空间巨大，贸易量迅速扩展。加快建设“桥头堡战略”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这个市场。同时，与中国相邻的国家，特别是靠近中国边境一带还处于贫困水平的国家，都迫切期望通过加强合作开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实现睦邻兴边，和谐稳定。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差异，云南特色农产品的多样性与东南亚、南亚等地有较大的互补空间，云南省的蔬菜、温带水果、畜牧、花卉、林产品等产业有突出的优势，经过多年发展，云南省的烟、糖、茶、橡胶等传统优势产业，在种植面积、产量、加工水平等方面在国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明显的产业发展比较优势。目前卷烟、苹果、梨、葡萄等温带水果、鲜切花，桉叶油等香料油、冷藏蔬菜、果汁、动物制品等特色农产品畅销东南亚、南亚等国家。东南亚国家素有“稻米之乡”的美称，为世界大米主产区之一。除广泛种植稻谷以外，还种植玉米、白薯、木薯、大豆、花生、杂粮作物。经济作物品种繁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橡胶、油棕、茶叶、咖啡、可可、胡椒、丁香、肉桂、金鸡纳霜等。泰国、越南、缅甸是世界著名的三大谷仓，泰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橡胶生产国和出口国，越南咖啡产量居世界第二位。南亚国家盛产黄麻、芒果、蓖麻、茄子、香蕉、甘蔗以及莲藕等农作物在全世界都极为有名；所生产的黄麻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左右。其他的农产品，包括茶叶、稻米、花生、椰子、芝麻、油菜子和橡胶等，也在世界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些产品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四）“桥头堡战略”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突破口

中国实施西部大开放10年来，西部地区的实力显著增强，增长速度加快，发展质量提高，城乡面貌显著变化，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目前，西部省区已经拥有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的实力和愿望。紧邻西部地区的东南亚、南亚以及西亚国家是当今世界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地区之一。通过桥头堡建设，扩大向西南沿边开放，是西部地区融入世界的捷径，也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大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由此，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开放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由开放的末梢成为开放的前沿，依托中国向西南开放的贸易通道，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发展层次和水平。

（五）“桥头堡战略”是云南省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

桥头堡建设将对云南发展产生重大推动和促进作用。特别是能为边境民族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带来强劲动力。云南省 25 个边境县（市）人口占全省的 14.3% GDP 总量仅为全省的 8.9%，人均 GDP 仅为全省的 61.1%，全国的 33.3%，60 多万人处于深度贫困。加快边境地区发展是云南实现统筹发展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通过桥头堡建设，将为边境地区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创造新的发展亮点，形成资金、技术、人才聚集的“洼地”，走出一条以开放促开发、以开放促发展的振兴之路。

三、“桥头堡”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与措施

（一）六个“着力”

1. 着力构建国家战略大通道，增强基础设施支撑保障能力；
2. 着力加强对外经贸交流和合作平台建设，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3. 着力打造特色优势产业基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
4. 着力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5. 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6. 着力推进兴边富民工程，建设繁荣稳定和谐边疆，努力把云南打造成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西南地区经济增长极。

（二）两个阶段的十项目标

第一阶段的发展规划到 2015 年，届时将实现 5 个主要目标：

1. 中缅油气管道建成投产，后续项目及配套设施建设初见成效，相应的港口、通道和物流体系基本完善，交通、能源、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进展；
2. 承建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和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出口加工基地初步形成；
3. 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
4. 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
5. 高原湖泊、重点流域水质恶化和水土流失加剧趋势得到遏制，石漠化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森林覆盖率达到 50%以上，全面完成国家“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

第二阶段的发展目标规划到 2020 年，具体目标为：

1. 基本建成连接国内外的港口、公路、铁路、管道、电网和电信设施，形成交通、能源、物流和信息战略大通道，面向西南开放的平台和窗口作用进一步增强，辐射带动能力明显提升。
2. 外向型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区域布局和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3. 农民人均纯收入长足发展，绝对贫困问题基本解决；
4. 社会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5. 高原湖泊水质改善，江河上游水土流失面积明显减少，石漠化得到有效控制，森林覆盖率达到 55%以上，生态安全屏障作用不断巩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三）七项措施

与发达地区相比，云南省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对外交流合作有待深化，产业综合实力不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压力大，社会事业滞后，扶贫开发和维护边境稳定任务繁重，这些都是加快推进桥头堡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搞好桥头堡建设的主要要从以下七个方面着手：

1.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支撑保障能力
 - （1）加快推进中越、中老泰和中缅铁路和公路的境内段和境外段的规划和建设，构建以昆明新机场为西部重要航空枢纽的机场布局网络
 - （2）建设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保障体系，加快中缅油气管道建设和大江干流水能资源开发，建设跨区域电力交换枢纽。
 - （3）建设国际性的信息枢纽，将云南建设成面向东南亚、南亚通信枢纽和区域信息汇集中心。
 - （4）建设保障有力的水利工程体系，实施“润滇工程”，开展滇中引水前期工作，着力解决云南的工程性缺水问题。

2. 依托重点城市和内外通道，优化区域发展布局
 - （1）按照“一圈一带七走廊”的区域布局，加快昆明、曲靖、玉溪、楚雄的一体化进程，提升滇中城市经济圈的辐射带动能力。
 - （2）以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为重点，建设重要的沿边开放经济带。

- (3) 完善“昆明-河内”“昆明-皎漂”“昆明-曼谷”“昆明-密支那”四条对外经济走廊。
 - (4) 加快推进“昆明-文山-广西北部湾-广州珠三角”“昆明-昭通-成渝地区”和“昆明-丽江-香格里拉-西藏昌都”三条对内经济走廊的建设，增强对内经济走廊的纽带作用。
3. 加强经贸交流合作，全面提升开放水平
- (1) 加强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巩固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 (2) 加强中国-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提升孟中印缅合作层次，实施《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客货跨境运输协定》等协议，全面提升对外经贸合作水平。
 - (3) 加强对替代种植的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
 - (4) 推进云南省与泛珠三角各省区、长三角地区和其他西部省区的合作、深入开展对内区域经济合作，推动西南省区共同向东南亚、南亚开放。
4. 立足资源和区位优势，建设外向型特色产业基地
- (1) 建设优势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和流通中心，做大做强特色农业。
 - (2) 依托境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布局石化基地，载能工作，承接产业转移，升级传统产业，积极探索利用境外矿产、能源和市场的产业发展模式。
 - (3) 依托国家级工业园区，积极培育生物医药、生物技术服务、光电子、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
 - (4) 加快发展物流和会展等现代服务业，把昆明建设成全国性物流节点城市和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
 - (5) 大力提升金融业的支撑服务能力，支持把昆明建设成全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 (6) 推动旅游业跨越式发展，把云南建成中国一流、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5. 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 (1) 加强以滇池为重点的九大高原湖泊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重点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力度。
 - (2) 加强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珠江等流域生态保护与水土流失治理，加快滇东南、滇东北石漠化治理。
 - (3) 加强以滇西北、滇西南为重点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 (4) 加大对化工、建材、钢铁、有色等高耗能行业节能改造的支持力度，开展循环经济重点工程建设，建设循环经济园区，推进节能

减排和循环经济发展。

6. 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 (1) 有限发展教育事业，加大对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支持力度，支持云南建设区域性高水平大学。
- (2) 加快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加强边境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建设区域性国际医疗技术和人才交流中心。
- (3) 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加大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深化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
- (4) 着力完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开展就业援助，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切实加强宗教基础设施和宗教工作队伍建设。

7. 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建设稳定繁荣边疆

- (1) 以滇西边境山区、乌蒙山区、石漠化地区为重点，加强扶贫开发工作，大力实施兴边富民工程和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发展规划，促进边疆和贫困地区加快发展。
- (2) 加大对人口较少民族和特困民族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 (3)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加强边防管控和出入境管理。
- (4) 加快农垦企业改革，统筹农垦与地方协调发展。

第二节、“桥头堡战略”与云南省对外开放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东南亚的越、老、缅三国接壤，与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国临近，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和南亚、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通道。2010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云南考察时提出：“云南在向西、特别是向西南开放中具有特殊、不可替代的优势，也有着一定的国际竞争力，要把这着棋下活，走好，为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一、从“大、强、道”到“两强一堡”

（一）世纪之交确立了“大、强、道”战略目标

云南虽然资源丰富、风光秀美、气候温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远离国内政治经济中心，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祖国内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省内相当部分地区尚处于封建农奴制、奴隶制乃至原始社会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云南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省份，1978年，全省生产总值仅为69.05亿元，仅占全国总量的1.90%；财政总收入仅为11.76亿元，仅占全国总量的1.03%；人均GDP仅为226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9.6%，经济总量在全国省区的排序居20位以后。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一直在积极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1995年，省第六次党代会提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打基础，兴科教，调结构，建支柱，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路，在继续巩固发展“两烟”优势产业的同时，着力培植旅游业、生物资源开发产业和矿产业，随后又把水电为主的电力产业作为支柱来培养。

世纪之交的1999年12月，中共云南省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简称“大、强、道”）的奋斗目标，要求充分发挥优势，“着力发展特色经济。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跨越，这是在深化省情认识基础上，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50年来建设和改革发展经验而提出的。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是云南物质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的形象化概括。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是云南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建设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是云南对外开放的重点目标。当时“大通道”建设的目标是建成“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巴”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和以数字化光纤传输为主导，数字微波和卫星通信为辅助，集信息处理和传递功能为一体的大容量、高速度、交互式的综合信息传输网络。

（二）对外开放战略的升级版“两强一堡”

经过10余年的努力“大、强、道”三大战略目标都取得了初步成效，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大通道”建设方面成就突出，云南连接东中西部的7条干线高等级公路、8条干线铁路，以及经云南通往周边国家的4条干线公路和4条干线铁路均已列入国家中长期公路、铁路网规划，部分建成营运。由云南通往国内城市和东南亚、南亚国家的航空网络基本形成，已建成的12个机场和规划将建设的3个机场基本覆盖全省，昆明始发航线总数达230多条，其中国际航线30多条，通达60多个国内城市和30多个国际城市。已建

成的昆明新国际机场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和连接欧亚的西部国际门户枢纽机场，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 2001 年已实现通航，金沙江-长江航运业正在拓展之中。

如今，国内外的经济社会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云南发展的内外环境和机遇条件也相应发生了积极变化。2009 年 7 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云南时做出了“使云南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重大战略部署。2010 年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不断强化对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发展的扶持。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2009 年 8 月，国务院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节能减排已成为世界性的大趋势，中国明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任务，为绿色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的内涵。

2009 年 12 月，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会在“大、强、道”三大战略目标基础上，提出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三大战略目标，既“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简称“两强一堡”）。

“两强一堡”战略是对“大、强、道”战略的深化，完善和提升，充分体现了云南的特色，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其中，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是对原有战略目标的延伸，但其内涵已发生重要变化，更加强调积极适应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需求，主动推进节能减排，保护好水环境、大气环境、植被环境及城市环境，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力争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建设民族文化强省是对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战略目标的提升。从“大、强、道”，要求不仅注重发展的数量更要注重发展的质量，不仅要注重外延式扩展更要注重内涵的提升。建设中国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是落实胡总书记指示精神的重要部署，是云南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

二、云南省在“桥头堡战略”中的功能定位

在“桥头堡战略”实施中云南要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已有的经济基础，充分发挥云南在国际国内区域合作中的区位优势，多方面挖掘云南的发展潜力，体现云南的发展特色，明确云南在中国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大格局中的特色和应发挥的作用，找准在“桥头堡战略”中的功能定位。

（一）中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

加快外接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内连西南及东中部腹地的综合交通体系、能源管线、物流通道和通信设施建设，构筑从陆上通往印度洋的战略大通道。

为此，云南必须积极推动国际大通道建设，依托亚洲公路网和泛亚铁路网规划，积极与东南亚、南亚国家沟通协调，推进相互间的立体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昆明到河内、曼谷、仰光、加尔各答高等级国际公路的建设，尽快完善与广西、贵州、四川等周边省区间的高速路网，加强省内州市间高速通道，通边公路和重要旅游区快速通道的升级改造工作。加快推进中越、中缅、中老铁路建设，尽快促成中老泰铁路通道开工建设。加快推动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发展，争取伊洛瓦底江国际陆水联运、中越红河航运早日实施。继续增加国内和国际航线班次。加快形成和完善国内电网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电力交易平台和交易机制，构建面向东南亚的境内外电力交换枢纽。加大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充分发挥昆明通讯出口局作用，进一步提升层次和技术水平，实现与东南亚、南亚的互联互通，使云南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信息交换枢纽。加大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口岸综合服务能力和通关便利化水平。

（二）中国沿边开放的试验区和西部地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先行区

在对外经贸合作，对外文化交流、通关便利化等方面先行先试，深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加强与东南亚、南亚合作，拓展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合作。

建立健全对外开放的合作机制，积极推动云南-泰北，云南-老北、云南-越北、云南-印度西孟加拉邦等双边合作机制、形成制度化，努力促成云南与缅甸、孟加拉国等国的双边合作机制。办好昆交会、南亚国家商品展、中国-南亚合作论坛。办好中越、中老、中缅边交会，提升区域性会展活动的规模和层次。办好亚太华商投资项目推介会。支持印度洋沿岸国家在昆明设立领事机构，进一步推进与东南亚、南亚及西亚、东非国家的结好工作。加快推进瑞丽重点试验区建设，推动瑞丽、河口、磨憨等地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同时，在其他沿边口岸建设一批边境经济合作区，提升沿边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加强对外交往，促进与南亚、东南亚、西亚和非洲国家的相互了解、相互认同。在文化、教育、卫生、旅游等方面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活动，切实增强人文外交软实力，使云南成为展示中华文化，增进了解互信、促进国际友谊的示范窗口。

（三）西部地区外向型特色优势产业基地

依托国际大通道，优化产业布局，把云南打造成我国重要的出口加工贸易基地、清洁能源基地、新兴石油化工基地、优势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生物产业基地、战略资源接续地和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

在昆曼、昆河、昆仰、昆明南亚四条国际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城市优化布局生产力，建设一批外向型轻工和农特产品出口加工基地。加快培育发展石化、生物、有色金属和稀贵金属新材料、光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一批战略性产业。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积极发展金融、财务、法律、保险、技术、咨询和信息服务等配套服务业，力争引进一批国际性的金融、会计、法律等中介组织进驻云南。加快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国际合作步伐，建设国家级国际养生、养老示范基地，培养一批文化龙头企业，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化精品。

（四）中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加快建设滇池等高原湖泊水环境综合治理，推进大江大河上游森林生态建设、水土保持和重点区域石漠化治理，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着力提高生态建设的质量，维护流域国家和地区的生态安全。全面推进“森林云南”建设，努力使全省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55%左右。推进节能减排，加强以滇池为重点的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综合防治，有效改善环境质量。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加快发展生态产业、环保产业和低碳服务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用创新的思维和理念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创造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人居环境，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

（五）中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

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良好局面，大力推进兴边富民工程，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第三节、“桥头堡战略”实施的国际环境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的对比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全球与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和平、发展、合作仍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¹⁰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互利共赢原则为指导、以开放合作为共同发展的“桥头堡战略”，既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方针的具体体现，在拓展中国发展战略空间的同时，也契合了周边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列车的现实要求，整体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较为有利于“桥头堡战略”的实施。

一、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发展的新机遇为“桥头堡战略”带来有利条件

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国际体系、国家制度、力量对比、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从2009年开始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地位稳定上升，与美、欧、日经济复苏的疲软形成明显对比，世界经济的不均衡、不稳定性比较突出，发展问题更加受到各方关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愈加受到各方重视，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改革有序推进，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尽管国际安全威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更加突出，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但国际安全形势总体依然保持稳定，国际文化、宗教、思想等领域的交锋、交流与互动更趋活跃，国际形势出现了许多新的重大变化，在国际关系深刻复杂的调整中蕴藏着新的机遇。

中国政府紧紧抓住金融危机后世界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在危机冲击的特色时期及时提出了“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理念，与世界其他经济体共渡难关。中国深入参与和引导国际体系的变革，将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转化成为国际制度权力，在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推动了“20国集团”（简称“G20”）的实质性转变，使之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成为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在新平台上推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全方位的务实外交有力地推动了与大国、周边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保护了中国在海外的合法权益，积极实施公共外交与人文外交，“和谐世界”的理念影响逐步扩大，中国软实力的建设不断提升，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举足轻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与地位日益提升。中国自身经济社会的大

¹⁰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11年3月18日

发展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力量均衡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作出了贡献，也为“桥头堡战略”的实施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

二、中国周边形势复杂、严峻、多变，总体上仍是机遇大于挑战，有利于“桥头堡战略”的实施

中国是世界上有着最多陆地接壤邻国的国家，有 2.2 万公里的陆地边界，与越南、老挝、缅甸等 15 个国家相邻；有 3.2 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和岛屿岸线，与日本、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隔海相望，周边国家无论是领土面积、人口、民族、宗教，还是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社会制度等各方面都千差万别，情况极为复杂，因此，一个总体上保持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是“桥头堡战略”实施的重要前提。

2009 年以来中国的周边热点不断，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周边环境更加复杂。东北亚局势持续紧张，各方围绕朝核问题的博弈仍在继续，“天安舰事件”、“朝核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美韩、美日联合军演更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钓鱼岛主权之争以及 2010 年爆发的撞船事件给中日关系蒙上新的阴影。美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反恐战争远没结束，中亚的民族冲突与宗教极端主义日趋激烈；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引发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和冲突的表面化；中东局势依然动荡，巴以冲突难以调解，伊朗核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北非中东在 2011 年初发生大规模政坛剧变，叙利亚的内战已进入第三个年头。

从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不断涌现来看，美国因素的影响无处不在。就综合实力而言，应该承认一超多强、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总体国际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美关系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美国借“天安舰事件”加强与日、韩盟国的关系，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公开介入南海争端，在亚洲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竞争更加激烈，美国对华遏制的一面明显加强。我们应该看清楚中国周边环境变化的阶段性和复杂性，理性看待周边国家对华战略“两面下注”“大国平衡”“以美制华”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要看到周边国家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受益最多，加强对华合作仍将是周边国家的主流声音。

就西南方向周边国家对我实施“桥头堡战略”的态度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类是持欢迎态度并给予积极支持的国家，包括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南亚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西亚的伊朗以及印度洋各国。第二类是持谨慎支持态度的国家，包括南亚的尼泊尔、孟加拉国，西亚的沙特、

伊拉克。第三类是有一定的担忧和疑虑，有可能会拉拢区域外大国来牵制和平衡中国，但同时又希望从中寻求自身发展利益的国家，包括东南亚的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南亚的印度。

从地区组织来看，东盟对我实施“桥头堡战略”虽有某种担心，但不会有过激反应，基本上持积极态度。南盟则主要视印度的态度而定。海湾合作委员会和非盟将持欢迎与支持的态度，并给予积极配合。

从全球与地区大国的角度看，中国西南周边地区涉及的相关利益方美国、欧盟、日本以及印度，在短时间内尚不能对我西南周边实施有效的影响。美国在亚欧大陆的“大棋局”尚未布局完毕，其战略注意力被牵制在中东、伊朗、阿富汗、朝鲜等地，对东南亚尚处于有心无力、鞭长莫及的状态。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使得欧盟的主要精力被内部事务困扰，短期内无法将更多资源投放到外部事物上，尤其是与其利益相关程度不高的东南亚、南亚地区。日本民主党政府上台后积极推动内部改革，外交政策上推行“外交新思维”，主要精力也转向了国内。印度由于自身的实力有限，内部族群冲突、社会分裂加剧等问题，加上它与周边邻国的领土争端与矛盾，在我西南周边的影响力下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桥头堡战略”实施的周边环境总体上仍是机遇大于挑战，应加快推进。关键在于国家以及云南省各级政府真正从战略上重视周边环境，加大投入力度，通过“桥头堡战略”的实施真正带动周边国家的发展，让周边国家从中国的繁荣、发展中共同受益。

三、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的双边关系为“桥头堡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与西南周边国家普遍保持着睦邻友好的双边关系，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的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人员往来、文化交流都步入了历史最好时期，2002年与东盟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促进了双边的政治互信。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东盟外国家，双方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随着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双边经贸合作不断加深，中国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双边关系持续改善，这一切都为“桥头堡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四、影响“桥头堡战略”实施的若干因素

虽然总体的国际及周边环境有利于“桥头堡战略”的实施，但也应该重视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大因素。

（一）中国与西南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与岛屿争端

目前中国与印度之间共有 12.5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存在纠纷，东段有争议地区面积相当于两个半台湾，处于印度的实际占领之下。西段有争议地区大部分由中国控制。1993 年 9 月、1996 年 11 月，两国政府先后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全的协定》，2003 年签订了《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这些协定都未涉及边界的具体划分，要圆满解决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中国与不丹之间大约 600 公里的边界线，迄今仍未正式划定。

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围绕南沙群岛主权与专属经济区的争端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中国“岛礁被侵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的状况没有任何改观，主权受损的现状没有改变。侵占南沙群岛的东南亚诸国一方面借南海问题炒作“中国威胁论”，利用集体力量抗衡中国；另一方面主动引入美国、印度等外部力量，试图牵制中国，美国也趁势公开宣布介入南中国海争端，从而使南沙群岛争端进一步复杂化。

（二）西南周边面临较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西南周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毒品走私问题、跨国犯罪问题、公共卫生安全问题、非法移民问题、宗教非法渗透问题、跨境民族引发的问题等等。

（三）缅甸北部少数民族武装改编问题趋于复杂化、长期化

缅甸是中国从陆路进入印度洋的最捷径，也是“桥头堡战略”实施在境外的一个关键点，然而，2009 年 8 月“果敢事件”爆发后，缅甸中央政府与北部少数民族武装特区政府围绕改编问题的较量一直在持续，中央政府提出的“缴枪换取和平”的改编方案受到缅北几支主要少数民族武装的联合抵制，导致缅北局势不稳，紧张局面不时出现，2010 年 4 月在密支那的米松水电站发生爆炸事件，2011 年 6 月克钦独立军与政府发生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缅北少数民族武装改编问题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

综合来看，实施“桥头堡战略”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总体上仍是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动摇，高举“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旗帜，立足长远，扎实工作，经济营造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为“桥头堡战略”的顺利推进创造有利的条件。

第六章 中国云南省区位优势实现的途径研究

中国云南省面临的问题是要向高效率区位优势转化，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框架中关于区位优势理论的阐述，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区位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二是低成本的初级竞争优势向高效率的区位优势转化。前者以国际贸易的形式通过市场交易获取区域的比较利益来实现。这其中交易效率的提高成为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关键。高层次区位优势的实现靠持续的创新，包括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对中国云南省来说，我们已不能按层次分别来实现区位优势。作为后发区域，初级竞争优势的实现和向高级竞争优势的转化应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云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第一节 区位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

在现实世界中，比较优势（包括传统的比较优势概念、新贸易理论所涉及的比较优势概念以及波特的竞争优势概念）仅仅表明了比较利益获得一种潜在可能性。事实上，比较利益的“获得”是要以产品价值实现为前提的，而产品价值要通过“市场”才能实现。这就存在一个“交易效率”的问题。在交易效率很低的情况下，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不一定能获得比较利益。也就是说，比较利益的获得还需要一个关键条件，即要有一定的交易效率与之配合。¹¹⁰因此，市场交易效率也成为比较优势向现实的竞争优势转化的关键因素。

交易成本的概念是科斯（R. H. Coase）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引入并阐述的。本文中的交易成本是指交易活动的参与者为实现交易而发生的成本，由信息搜寻成本、交易谈判成本、合同履行成本、交易风险成本组成，包括交易过程中的货币支出，也包括时间、精力等的耗费。在进行贸易时，交易主体在付出交易成本的同时，也获得了交易盈余。交易盈余是指通过交易达到某种“双赢”状态。从宏观层次上讲，此类两两交易的“总和”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进。因此，交易效率可定义为交易盈余与交易成本的比较。交易成本不变，交易盈余增加；或交易盈余给定，交易成本减少；或交易成本减少同时交易盈余增加都可提高交易效率。

¹¹⁰李晓钟：《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理论与实证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9页

国际贸易一般是国际间货物和服务的交换，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交易成本常常高于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第一，由于各贸易国的文化、商业法律、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差别很大，因此相应的信息障碍较多，成本就高。第二，由于国际贸易货物运输里程一般超过国内贸易（边境贸易除外），因而使国际贸易中的交通运输费用、保险、通讯等费用引起的交易成本高于国内贸易。第三，由于各国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所引起的高于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第四，由于买卖双方对交易商品品质的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交易成本。第五，国际贸易的风险较国内贸易的风险大。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贸易由国内贸易发展而来的原因。

这样，在交易盈余一定的条件下，交易成本的变化，即交易效率的变化，对交易主体的行为会产生影响，直接影响国际贸易量的变化。在关税壁垒的总体水平有所降低的情况下，近年来，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效率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交通运输方面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单位运输成本进一步降低；电子商务的发展部分降低了信息搜寻费用和通讯费用。此外，国际贸易规模扩大导致经济主体的重复博弈，也降低了交易风险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而且，交易效率的提高也影响着国际贸易方式和国际竞争优势的变化。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企业可以通过内生交易成本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以提高企业的竞争效率。在国际市场上，经济主体能否获得比较优势取决于基于产品复合生产成本比较优势和基于交易效率比较优势所带来的综合成本优势。因此，在关注经济主体获得比较优势的动力培养和能力提高的同时，若不关注交易效率的改善，经济主体同样也难以获得比较优势。

一般来说，交易效率越高，意味着经济主体获得的交易盈余就越多，而交易效率的提高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¹¹¹

(1)国际层面：不断强化的国际经济规则有利于交易效率的提高；

(2)国家层面：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有利于交易效率的提高；

(3)中观层面：行业协会组织的发展和完善有利于交易效率的提高；

(4)微观层面：有利于企业提高交易效率的途径主要有：其一，企业通过实施品牌战略，可以提高交易效率；其二，企业通过发展电子商务，可以减低交易效率；其三，推行外贸代理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

¹¹¹李晓钟：《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理论与实证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81—88页。

一、提高交易效率的基础和条件

在前面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中已经阐明，次区域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巩固和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云南要充分利用亚行对次区域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的机会，在制定云南的交通规划时，注重和周边国家的合作，加快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开展次区域合作的前提，无论是构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前沿，还是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行示范区，“通”是首要条件，一通百通，交通必然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要求各个国家的商品生产冲破地方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局限性，纳入区域市场的商品经济循环中。这种经济循环运动的速度和地区经济合作的扩大，其决定因素之一的就是交通运输条件，没有便捷的交通运输，地区经济合作难以实现。在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上，笔者认为：一是一定要千方百计的适当超前规划和建设；二是一定要与次区域总体规划积极对接；三是一定要与国内其他相邻省份的交通建设对接，扩充和提高与周边相邻省份的交通运输能力，扩大腹地的范围。

交通联网是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对次区域经济贸易来说，交通运输成本是影响交易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云南要发挥独特的大通道优势，必须加强铁路、公路、水路以及空港的建设。一是发展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各国间开展水路联运，比双方绕道沿海可缩短运距 3000 多公里，运费降低 60%，运转时间可缩短一半以上。¹¹²二是建设昆曼公路、滇越公路、滇缅公路等。这些公路是亚洲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各国经济合作交流的重要通道。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与周边国家联合实现境外公路的高等级化，形成次区域高等级的公路交通网络。三是泛亚铁路。其建设构想由“一线”、“三环”组成：一线即新加坡至昆明；三环由两小环和一大环：由曼谷、金边、西贡、河内、昆明、万象、曼谷组成的东海岸环线；曼谷、毛淡棉、腊戍、大理、昆明、万象、曼谷组成的西内陆环线，构成两小环；曼谷、金边、东海岸线、昆明、西内陆线、曼谷构成一大环。

同时加强与之相关的软件建设，实现交通的联网，促进人员、商品货物的便捷流通。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是软件建设的重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人员出入境便利化，包括统一和规范人员出入境手续、简化出入境程序、采取一致的出入境安检方式和通关报关条文；二是交通运输便利化，如统一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费种及费收、签订次区域五国的汽车运输协定和货物多国跨境运输协定等；三是资金流动和结算方式便利化，

¹¹²贺圣达、王学鸿、宫占奎等：《CAFTA 建设与云南面向东南亚开放》，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8 月版，第 405 页。

探索建立美元和人民币双重中心的“次区域五国货币结算体系”，为今后建立统一的亚洲货币单位（亚元）打下一定的基础；四是投资环境优化，包括次区域各国的交通、能源、通讯、卫生、安全、服务水平和政策措施等。¹¹³

按照云南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服务东盟、服务中国、发展云南”的总体思路，云南作为中国面向东南亚的陆域通道、经贸合作前沿和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充分发挥沟通两大市场、服务两大市场的作用，积极建设交通、贸易、产业、生态、友好“五大通道”，以及信息、贸易、金融、人力资源开发和公共事务“五大平台”，逐步形成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物流、交易、服务、生产、投资五大中心，带动云南相关产业、经济带乃至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¹¹⁴

当前，要加强以昆明为中心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搭建信息平台，发展云南信息产业；构筑贸易平台，打造会展、物流新兴产业；建设中国面向东盟的金融服务中心；构建人力资源开发平台，加强科技、教育合作；建设公共事务平台和友好通道等等。这些目标方向，总的来说都是围绕着如何发挥云南的空间区位优势做文章。通过硬件和软件的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使云南作为大通道的交易效率显著提高，实现云南的区位优势。

二、打破地区封锁，发展国内区际贸易

从理论上讲¹¹⁵，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而言，国内区际贸易的发展对本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创造，进而改善贸易条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区际贸易的发展，扩大了市场范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规模经济的实现。就国内需求水平构成来说，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在生产上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产品，那些国内需求规模相对较大的国家将因为拥有相对的成本优势而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竞争优势；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那些国内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将会因此促使厂商采取新技术，更快地更新设备，从而使其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并且这种由国内需求规模形成的比较优势将会通过国际贸易而得到加强。国内区际贸易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能够生成国内市场的竞争性，从而在国内需求相对大、买者之间的竞争与效仿动态效应强烈的产品类别上建

¹¹³卢漪、贺友华、汤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域探讨》，载《经济问题探索》，2004年第1期。

¹¹⁴贺圣达：《21世纪初云南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载《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¹¹⁵这里的理论不但是指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理论，还指杨小凯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由国家贸易发展而来的阐述。

立起比较优势，并使企业在真正面临进口产品竞争以及国际市场之前能够得到必要的锤炼。

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区际交易效率较低，区际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区际贸易的不发达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制约产品市场的扩大、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企业规模经济的形成，抑制比较优势的发挥、创造，恶化静实物贸易条件，交易效率也难以得到改进，从而影响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提升。这种现象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专家称之为“行政区经济”，即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¹¹⁶因此，努力降低自然及人为原因引起的区际交易成本，提高区际交易效率，推动区际贸易的发展，建立统一开发的市场体系，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改善本国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重要“潜力”因素之一。在今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要突破行政区经济运行格局，首先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整合，包括政府制度和企业制度的创新以及市场体系的培育。

我国“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转变已成为今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向。建立地方政府行为的硬约束机制，是促进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发展区际贸易，提高区际交易效率的重要途径，对增强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¹¹⁷

(1) 法律约束，就是通过健全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手段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进行强有力的约束。在我国，造成地区垄断或市场垄断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不良经济行为，但却没有相应的和有效的法律约束。可以说，这是我国地区封锁行为屡禁不止、一再发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尽快制定出若干针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有关法律法规，诸如反地区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是建立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硬约束的一个重要途径。

(2) 风险约束。在我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一般来说不必承担因决策一旦发生失误而可能带来的风险成本。这是因为，我国地方政府官员作为中观决策者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公司、大企业机构的决策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必须对企业的生死存亡负责，其职业前途好坏总离不开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而前者既不必负担经济上的盈亏责任，其个人的升降奖惩和机构的得失进退也不必依靠市场法则决定，这是助长地方政府社会博弈心理的重要因素。而

¹¹⁶舒庆、周克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1页

¹¹⁷舒庆、周克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165页

地方政府一旦有了社会博弈心理，那么无论是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还是在处理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时，博弈行为在所难免。因此，在当前体制转轨时期，必须构筑一种有效的风险约束机制，来克服地方政府因风险约束不力而可能采取的博弈行为倾向。

(3) 组织约束，就是运用组织手段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加以约束。组织约束的意义在于它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约束往往带有一定的组织原则性，并隐含着一定的政治意义，因而是一种硬约束。因此，通过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就能起到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进行强有力的组织约束效果。“绿色 GDP”考核指标体系无疑是一套科学、合理、规范的考核指标体系，它避免了过去片面追求经济数量指标的倾向。

在这些约束框架内，云南省要积极探索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途径，有力地推动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一方面，云南省要充分发挥作为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主体的特殊身份，利用国家赋予云南“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在对外经济合作的具体实践中发现和总结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政策措施，争取得到国家的支持，使之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推动国内区际间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云南省内各地区也要打破地区封锁，为产品的流动和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创造条件。着眼于国内和周边国家两个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在提高和扩大国内市场交易效率的同时，云南省要站在战略利益观的视角，积极发展与次区域国家的经济合作，推动次区域各国国内的市场建设，实现云南市场和次区域市场的对接以及次区域市场和中国与东盟市场的对接，加速实现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以及次区域的跨越式发展。

三、“走出去”——企业提高交易效率的有效途径

“走出去”是指作为市场经济活动微观主体的企业的跨国投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注重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中国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比东南亚国家对外投资的经验和邓宁以人均 GDP 为标准对一国投资发展周期的划分标准¹¹⁸，中国正在向对外投资的发展

¹¹⁸以人均 GDP 为标准，邓宁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在不同阶段直接投资的流出入状况：第一阶段，人均 GDP 在 400 美元，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由于缺乏所有权优势，因而没有经济实力向国外输出直接投资，由于本国投资环境太差，国外也只有少量资金直接投资流入；第二阶段，人均 GDP 在 400—1500 美元之间，处在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明显增加，外资大量流入，但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外资本输出仍然十分有限；第三阶段，人均 GDP 在 2000—4750 美元之间

期迈进。虽然中国现在正处于吸引外商投资的高峰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不需要对外投资。过去的研究多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理论，随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投资流量的增长，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论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只要一国相对于另一国的某一产业或技术具有比较优势，就会产生小规模的技术优势¹¹⁹，而有对外投资的意愿。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依赖于企业所在国和投资目的地的区位优势的综合分析。

企业跨国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外部交易内部化，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不仅可以使企业能充分发挥其原有的比较优势，而且还可以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由此强化其获得较多比较利益的能力。因此，企业的跨国投资是企业提高交易效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企业跨国投资是将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有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形式，其对外投资行为的模式是由其自身“拥有特定优势（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s）”、“内部化特定优势（Internaliz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和“区位特定优势（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所决定。¹²⁰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中，泰国是次区域对外投资的主体，也是次区域中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其他国家的对外投资能力都比较弱。整个次区域各国都面临着吸引外部资金的问题，这是次区域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因此，中国（云南）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宜采取贸易与投资相结合的投资先导模式。这是因为，(1)建立在资源优势基础上的云南支柱产业已初步具备对外投资的能力。(2)云南独特地理区位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为云南向次区域对外投资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3)这也是云南对外贸易发展的必然。因为在与次区域欠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中，云南获得大量顺差，贸易的风险逐渐加大。要改变这种状况，云南要站在战略利益的高度，通过投资替代贸易的战略，开发次区域落后国家的资源，帮助这些国家逐步建立工业基础，发展当地经济。长远来看，这将有助于云南与次区域各国更紧密经济关系的建立。

，处在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投资大幅度上升，其发展速度有可能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但净对外投资仍为负值；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属发达国家，他们拥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和经济实力，净对外投资成正数增长。

¹¹⁹江小涓等：《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III》，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23页。

¹²⁰张小蒂：《国际投资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转引自李晓钟：《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理论与实践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80页。

首先以贸易带动投资。云南有实力的企业实现跨国经营，在输出技术、品牌、管理和零部件到国外办厂之前，可以先通过贸易方式直接进入目的地市场，通过贸易带动投资。其次以贸易创造投资。云南企业在边境贸易中保持着大量顺差，这种顺差可能使对方减少商品进口，也可能使对方作为债务积欠下来，无论哪种情况对云南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都会造成损害。我们要设法将这种顺差转化为一种长期投资。通过外汇债务以换取邻国企业股权和房地产权，既能消除对方支付能力的困难，又能以资本渗透、市场渗透的形式在国外市场立足。第三，以投资创造贸易。云南省的企业在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中常常遇到对方缺乏支付能力而愿意采取贸易补偿的形式来支付工程款等情况。这种贸易补偿是一种双赢的形式，既能带动对方的贸易出口，扩大双方的贸易总额，还能带动云南的施工机械、成套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输出。¹²¹

根据次区域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现有对外投资的基础，笔者以为，对云南来讲，可以形成“次区域投资循环圈”。首先我们要清楚的是，由于产业间的相互关联性以及产业内上下游之间产业供应链的不同，各个国家形成了对不同层次产业投资的需求结构。一般来说，泰国是次区域其他国家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次区域各国形成了三个工业化层次：泰国属工业化较发达经济体，中国云南和越南属工业化的初期，处于经济结构转轨的关键时期，柬埔寨、老挝、缅甸还处于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这样，就为次区域投资循环圈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泰国的消费需求层次相对较高，显然泰国不会将对机床加工、建材、化肥等的投资放在处在第三层次的老柬缅三国，因为他们虽然劳动成本很低，但是毫无工业基础和熟练的技术工人，总的成本算下来，仍不具有价格优势。因此，处在第二层次上的云南成为泰国投资的目的地。借助泰国的外资，云南的一些产业得以发展，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成长，由此形成对能源、原材料以及对廉价劳动力等多方面的低成本需求。而老柬缅三国的自然资源目前处于待开发状态，云南利用其丰富的原材料加工经验和设备可以投资老柬缅，包括越南四国。云南对四国的投资，可以是寻求资源开发型的，也可以是开发国外市场型的。既可以输入原料国内加工再出口，也可以利用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在东道国生产销售和向泰国等第三国销售。完成商品和投资的循环流动，并由此带来各种溢出效应，不但使次区域各国总体福利增加，也使次区域各国经济合作更加紧密。

就合作的领域，云南应与湄公河流域各国开展农林、矿业、能源和工业四大领域的合作。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各国提供了有利于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利用和配置资源的机会，同时也加剧了各国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市

¹²¹贺圣达、王学鸿、宫占奎等：《CAFTA 建设与云南面向东南亚开放》，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410页。

场和资源的竞争，云南应主动参与境外战略性资源开发，获取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的资源应是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战略选择。

根据商务部、外交部 2004 年发布的《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一）》¹²²的内容，中国对次区域各国可投资的产业部分见表 6.1：

具体到云南省，在现有的一些优势产业或支柱产业中，生物制药、花卉等产业尚处于创新阶段，尚无必要和能力对外投资；烟草、矿产加工、冶金、机械设备制造等产业，已处于成熟阶段或标准化阶段，而且其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因此有必要向国外投资进行转移。另一方面次区域矿产资源丰富，但采、选、冶加工设备和技术则严重不足，对云南省的这些产业也有较大需求。近期内选择贸易和旅游为先导，借助贸易、旅游企业捅开流通和消费环节，扩张商品市场，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密切次区域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形成新的市场活力，疏通各国间经济技术合作的渠道，加速次区域合作的全面展开。

表 6.1 中国对次区域五国投资产业导向目录

国别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
柬埔寨	森林开发；谷物种植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拖拉机的制造；烟草制品业；摩托车、自行车等交通运输设备及零部件制造	建筑；旅游	
老挝	森林开发；谷物种植	钾盐矿	发电机等电气机械制造；电动工具制造；摩托车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造纸及纸制品制造；农副食品加工		电力的生产和供应
缅甸	森林开发；谷物种植；渔业	石油、天然气	农业机械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汽车、摩托车等交通运输设备及零部件制造；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木材加工及	建筑	

¹²²商务部、外交部：《关于发布〈对外投资产业导向目录〉的通知》，2004 年 7 月 8 日。

	业捕捞	钨、 镍、 铜 矿； 宝石	竹藤制品		
泰国	薯类种植；森林开发	钾盐 矿、 钨 矿、 铋矿	纺织业；电动机、空调器、冰箱等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农业机械制 造；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造纸及 纸制品；橡胶制品制造	贸 易、 分 销； 建 筑； 旅游	
越南	茶叶种植；水产养殖	铝土 矿、 煤 炭、 铁 矿、 铬矿	发电机、空调器、冰箱等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造；汽车、摩托车等交通 运输设备及零部件制造；水泥等建 筑材料的制造；农业和农副产品加 工机械制造；造纸及纸制品；饲料 加工；食品加工	贸 易、 分 销； 建 筑； 旅游	电力的 生产和 供应， 铁路 通讯 网络和 信号改 造

值得注意的是，区位的选择对企业跨国经营成功至关重要，它取决于企业的投资动机、企业准备投资的领域和企业规模等。云南企业“走出去”，一定要从自身所具有的区位竞争优势出发，以上处于未开发状态的湄公河次区域四国为主要的投资对象国，获取长远的比较优势。对云南企业的投资动机，要将获取廉价的劳动力、稀缺的天然资源、规避贸易壁垒和占领市场等动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寻找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动机的区位。云南企业要以投资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重视所在国的区位资源状况。一般来说，大型企业相对于中小型企业，在区位选择上有较多的灵活性。在次区域的投资中，云南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对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小型企业轻工业、商品流通与贸易、旅游餐饮等服务领域对外投资的灵活性和潜力。而且，亚行以及次区域各方对鼓励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贸易与投资中的重要作用早

已形成共识。云南省可以充分利用亚行在此类项目上的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扩大企业投资范围，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链，实现云南区位优势。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方面应当提供政策性指导，这有助于减少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区位选择的盲目性，更好的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既定目标。因此，在云南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政府所担当的服务角色功能不容忽视。其关键是要培育高效的中间组织和信息服务机构，发挥商会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包括：为企业提供有关境内外投资信息的收集与整理；为企业提供投资地区环境、税收、法规等咨询服务；代办有关投资手续，使企业少走弯路；为企业提供学术研究与交流、培训等方面的服务等。

第二节、初级区位优势向高级区位优势转化

多数学者提及的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其实是低成本主导的比较优势，其中被提及的最多的是低劳动成本优势。然而仅仅依赖于要素禀赋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是无法获得持续的产业竞争优势的。前面也已经提到，云南的劳动成本优势和次区域的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来比，已经被弱化了。低成本劳动力有助于实施成本领先性战略，但是过于注重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将极大损害人力资本价值和劳动效率，最终损害我国绝大部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对云南这一后发区域来说，由低成本竞争优势向高效率竞争优势升级是提高产业国内以及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内容。

高层次区位优势的实现要靠持续的创新。这种持续的创新从何而来？笔者以为，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是形成持续创新因素的重要来源。区位优势理论认为，特定区域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及相关产业集群构成区位优势的核心。产业集聚的发生均与某种形式的集聚经济有关。马歇尔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归结于企业为了追求外部规模经济；韦伯认为，如果企业从产业集聚中得到的好处大于它们因从分散布局地迁往集中地而引起的运输和劳动费用增加，集聚就会发生；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集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产生的，当贸易成本在中等水平时，集聚通过规模收益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归结起来，规模收益递增、可流动的生产要素、较低的运输成本是产业集聚发生的三大命脉，缺少任一方面，产业集聚就不会自我发生、自我增强而持续下去。

产业集聚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形成、快速集聚、稳定发展和衰退四个阶段。区域产业结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形成产业集聚的阶段成为形成阶段；

在集聚机制的作用下，有一个快速集聚阶段，然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产业集聚发生衰退，集聚效益遭到破坏以后，成为衰退阶段。各阶段基本特点可归纳如表 6.2 所示：

表 6.2 产业集聚演变过程¹²³

阶段	主要影响因素	特点
形成阶段	创新时机、产业特征、区域环境、偶然因素、政府的支持	产业结构出现某一突出产业，并且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快速集聚阶段	技术优势、信息优势、外部效益等	增长速度快，区域出现明显的极化效应，区域内企业数量和产品数量快速增加，获取大部分新增市场，并蚕食其他企业市场份额
稳定发展阶段	良好的区位条件、信息优势等、网络结构、区域创新系统	成为该产业的主要生产区，具有系统性特征的企业群，具有区域品牌相应，增长速度相对平缓，产品具有低成本、多品种优势，覆盖面广，创新系统高效，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较快的技术扩散速度
衰退阶段	集聚机制遭到破坏，核心产业发生衰退或其他产业集聚区竞争等	企业破产、退出或减员，形成失业的浪潮，创新速度减慢，经济萧条

一般来说，高新技术园区是典型的高效率竞争优势集聚区。但是，不可能云南的所有地州市都设立高新区，这既不符合云南的现实，也不符合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云南以什么为载体来发挥产业的集聚优势呢？我们知道，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以特定的地域为载体而形成特定的经济区，产业组织活动也不例外。通过政府的扶持和宏观调控，构建产业的空间集聚结构是云南向高效率竞争优势转化的重要途径。对云南省来说，产业集聚区或集聚带的形成不仅要符合云南产业发展规划，对接中国东部、中部市场，更重要的是要有力地对接与

¹²³刘斌：《产业集聚竞争优势的经济分析》，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50页

次区域各国、东盟各国，以及南亚的经济合作。云南的关键是要争取亚行的贷款和国家的支持，建设好“三大经济走廊”。

一、高级区位优势实现的空间架构

所谓经济走廊指的是以空间上相对接近的大城市为依托，以铁路、公路、航空、航运线为纽带，以沿线中小城市为接入点，以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为基础，开展贸易、投资和工业、农业、旅游、交通、服务等产业的合作，建立沿交通沿线为辐射的优势产业群、城镇体系、口岸体系以及边境经济合作区，实现各种资源和生产力要素的跨区域或跨国流动，以形成优势互补、区域分工、共同发展的国内和国际经济走廊。¹²⁴

在云南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由于生态环境和历史积淀的原因，云南只能以陆路运输通道为轴，构建符合云南实际情况的产业集聚形态。亚行提出的两条“南北经济走廊”为云南实现自身区位优势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对云南来说，这两条经济走廊的建设可以形成与次区域其他国家完备的交通联系网，从而降低商品贸易运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更重要的是，运输走廊建设为产业聚集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建立在各地资源禀赋条件上形成的产业聚集区相互联系和竞争，为云南面向国际市场的优势产业群的形成奠定基础。中心城市增长点、产业聚集区以及连接的运输轴线构成了云南外向型产业发展布局结构。

加快新昆明城市建设步伐，提高昆明的城市首位度，增强昆明在带动云南经济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把昆明建设成我国面向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其核心功能就是服务于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长远来看，也为服务和南亚的合作做准备。在《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¹²⁵附件4第六条第五款第4点提出的“通过未来设定的特定程序与机制，指定东盟成员国与中国的联络点，作为推动与促进各缔约方之间贸易与投资发展的中心”，这正是昆明努力的方向。明确昆明作为面向东南亚服务中心的方向后，根据昆明现有的基础设施和15—20年后的建设目标，我们要把昆明建设成面向东南亚开放的区域性国际商贸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会展中心和教育、科技、文化合作和交流中心。当前，昆明要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第二次领导人会议的召开做好服务工作，并以此为契机，探索服务性中心城市的发展之路，以求在与

¹²⁴洪昆辉：《大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与三条经济走廊》，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0期。

¹²⁵《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全文见附录VII。

周边省份的博弈中抢占先机。以昆明为中心，带动曲靖、玉溪、楚雄等城市的崛起，形成滇中经济圈，为两条经济走廊的建设做好辐射带动的准备。

两条经济走廊产业布局的构建要结合云南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确定云南与东盟各国产业合作的重点，实现云南与东盟特别是与次区域各国产业开展的跨区域、跨国合作，推进云南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加强以昆明为中心的产业核心聚集区发展的同时，逐步向沿线、沿边地区转移，以众多小城镇为纽带，以沿线大中城市为支撑点，以众多小城镇为网络，构筑昆河、昆曼、昆仰三大经济轴线。

首先，抓住泛亚铁路建设和昆明—河内—海防经济走廊建设的有利时机，形成以河口和个旧、开远、蒙自城市群为主，面向越南市场的产业带。红河州在建设昆河走廊中和其他地区有相对明显的区位优势。红河州工业基础雄厚并已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冶金、化工、机械、建材、电力、煤炭、制糖、酿酒、卷烟、制药等 35 个门类的工业体系。玉溪市是云南省最发达的地区，其烟草产业是云南的财政支柱。在经济走廊的建设中，各个地区和城市要着眼于越南与东南亚和国际市场，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烟草业、有色金属和化工产业、矿产业、能源工业、生物资源开发、药产业、花卉及优质高效农业和旅游业等支柱产业，提高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使特色产业成为云南经济新的增长点。

其次，积极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充分利用昆曼高速公路这条经济纽带，形成以思茅、景洪和勐腊为主的面向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国市场的产业带。昆曼经济走廊是市场潜力最大的项目。因为泰国是次区域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实现云南市场与湄公河次区域和东盟市场的对接最主要的国家是泰国。昆曼经济走廊的建设将为泰国和云南的贸易投资合作提供较多的商机。当前，云南和泰国的合作应以旅游合作为先导，建设昆曼黄金旅游线，吸引泰国在旅游、餐饮、娱乐服务等领域上的投资。鉴于中药在泰国的广阔市场，云南省应加强生物医药资源的开发研制，利用云南“植物王国”的优势，开发治病类、保健类和美容类中成药的生产，开发泰国市场。

最后，加快中国通向缅甸和南亚的通道建设，以大理、保山、德宏为主形成进入缅甸和南亚各国的产业带。缅甸是云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建设昆仰经济走廊建设对云南和缅甸经济合作的意义深远，而且，南亚市场是一个能和中国匹敌的潜在大市场。云南要建设面向缅甸市场的农用机械、木材加工、珠宝销售服务、日用品和建筑材料等行业，充分发挥中缅边境贸易在昆仰经济走廊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昆仰经济走廊建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大通道建设进度，目前，缅甸方面的公路建设还没有落实，但可以预见，若干年后国际大通道建成将对云南与缅甸的经济、贸易、投资、旅游等合作提供最基础的条件。

两大经济轴线的主要任务在于沟通中国与东盟尤其是云南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经济往来，在开放型的交通网络的基础上发展开放型的经济网络，进而实现次区域经济区的建设。云南应积极发挥比较优势，把次区域两条运输走廊建成国际贸易走廊、外向型工业走廊和国际旅游走廊“三位一体”的经济走廊。

二、吸引投资—中国云南省高效率区位优势实现的重要环节

两条经济走廊的构建为云南面向次区域以及东南亚市场的产业集聚区的形成提供了框架，通过什么方式有效地建设这两条外向型的产业集聚区，实现高效率的区位优势呢？笔者以为，通过政府的投资政策导向可以快捷地完成两条经济走廊的建设。投资政策核心是改善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制定优惠完善的吸引投资政策。这里所指的投资，既包括外国投资，省外投资等，更重要的是鼓励私营企业、组织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投资。在这里我们将外国投资和外来投资统称为外资，赋予它更多的内涵。之所以不局限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因为在云南的国外投资中有一部分来自于国际组织的投资项目，它们通过直接投资或招标的方式在云南进行项目建设，故这里统称外国投资。

首先，外部投资的进入可以是云南的潜在比较优势显性化。它们为云南提供了所缺的生产要素，如技能、技术、资本品和中间投入等，可以使云南充分发挥静态比较优势。一方面利用了云南闲置的静态比较优势。因为对云南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等要素，比较优势并未自动地发挥出来，所具有的天然要素禀赋和廉价的劳动力只代表着一种潜在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要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需要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条件。作为后发区域，可以借助于外部力量，即利用外部的投资来实现资源的开发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云南现有被发挥出来的比较优势中，有些优势利用的效率低下，通过外部资金技术等的介入，可以提高其利用效率，从而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

其次，外部投资的利用能创造出动态的比较优势。因为外部投资是资本存量、知识和技术的综合体，这些内容在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是最容易产生扩散和外溢效应的。它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条件、相关及支持性产业以及企业的战略机构与竞争等因素来作用于云南区位优势的实现。对云南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起关键作用的一点是，通过吸引外部投资为云南带来了稀缺的资源，帮助云南将内向型产业转变为出口导向型、有区际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实现云南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

吸引外资涉及两方：投资方和引资方。在双方的博弈中，寻求利益的结合点。在这里，我们主要谈作为引资方的云南省如何吸引外国投资和外省投资的问题。

在影响投资方区位的选择中，引资方的投资环境是重要的内容。实质上，区位就是投资环境。对于影响双赢的投资环境因素分析，按照因素的最突出功能和作用，归结为三类因子共 11 个因素。三类因子是指：基础型因子、激励性因子、创新性因子；11 个因素是指：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市场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法律法规、劳动力及其因素、社会因素、政策因素、金融因素、科技因素、生态因素等。¹²⁶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各因素组合的影响力不同。对外商投资影响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由三个方面：(1)引资方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性以及经营便利性措施；(2)引资方的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包括有效率的基础设施、引资方的市场规模与劳动力成本；(3)引资方吸引外资的政策框架和规制政策。如果我们将吸引外省投资的投资环境因素考虑进来，可以简单概括为“3I”：激励性因素（Incentives）、制度性因素（Institution）、基础设施因素（Infrastructure）等。这里的制度性因素主要是指当地政府吸引外部投资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等。

对云南投资环境的评价和优化已经有学者进行了研究¹²⁷，但是这些研究将云南看成是一个封闭的区域，静态地对其投资环境进行了空间归类，存在着一些不足。从产业中观层次来看，云南吸引外商和外省的投资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按照《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¹²⁸的精神，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管理制度，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建立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发展多种融资方式；培育规范的投资中介服务组织，加强行业自律，促进公平竞争；健全投资宏观调控体系，改进调控方式，完善调控手段；加快投资领域的立法进程；加强投资监管，维护规范的投资和建设市场秩序。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最终建立起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

¹²⁶付晓东、胡铁成：《区域融资与投资环境评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 11 月版，第 220 页。

¹²⁷唐邦勤：《云南省投资环境的综合评价与优化研究》，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2000 级硕士论文，2003 年 6 月。

¹²⁸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 年 7 月 29 日，www.sdpc.gov.cn。

其次，树立区域营销的观念，紧紧抓住云南独特空间区位形成的“双向桥头堡”作用，吸引外部投资。所谓区域营销是指，区域从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出发来塑造投资环境，并把整个投资环境像产品一样对外推销，来吸引投资者投资的一系列与投资市场有关的活动的总称。¹²⁹对于云南来说，由于自身市场容量有限，对那种市场导向型投资的企业来说吸引力不大。云南的真正优势就是空间区位优势。“双向桥头堡”的大通道优势是云南值得做的文章。对省外企业来说，在云南投资一方面可以直接出口次区域市场，而且还可俯瞰南亚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云南也是它们进一步直接投资东南亚市场的信息中转站。对于东南亚和南亚的投资者来说，抢占云南市场，投资云南产业，对进一步投资中国内地市场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场。要将云南具有优势的产业项目通过全新的营销手段推向国内外市场，以项目投资带动产业发展。

第三，及时修订吸引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对省外投资应该开放所有国家法规禁止开放的产业，最大限度的扩大利用外省投资的范围。对于外国投资，云南省政府部门应根据国家《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04年修订）》¹³⁰的内容，根据云南省的实际情况尽快出台最新的云南省的指导目录。而且，应该根据经济发展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实际进程实时调整。

第四，在吸引外部投资的产业布局上，优先考虑有利于三大经济走廊建设的外部投资项目。应该说企业的投资行为是自主的市场行为，产业集聚的形成是企业区位选择的首要考虑因素。但是，由于企业的逐利特性，市场的自主行为往往背离社会发展的道德方向。为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政府必须在其中发挥调控作用。一是在企业投资具体区位选择上的干预，二是在企业投资项目产业类别上的干预。在次区域的经济合作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已成为各国吸引外商投资重要的考虑因素。

除了外国投资和外省投资外，如果从投资来源的性质上分可以将投资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在扩大内需和西部大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政府投资仍是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一些交通运输、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仍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因为政府投资是对政府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的落实，所以在这里所谈的吸引投资主要以吸引非公经济成份为代表的民间投资为主。

2005年2月19日，经过长期而广泛的讨论之后，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重要文件（又称“非公三十六条”）。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七个方面的

¹²⁹王定一：《区域营销—招商引资新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19页。

¹³⁰商务部：《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04年修订）》，2004年8月3日，www.mofcom.gov.cn。

政策措施中，第一条即为放宽市场准入，公平待遇。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并在进入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国防科技工业等领域明确了改革方向和措施。这无疑为在政府财政不十分充裕的情况下，通过民间渠道大量吸引和鼓励民间投资，有力地推动云南区位优势的实现，促进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次区域经济产业项目的合作上，要坚持国民待遇原则，彻底消除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不平等待遇，凡是规定对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所有优惠措施原则上也应当适用于内资企业和民间资本。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电信服务业等行业。进一步开拓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的投资领域，加大对民间资本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上放宽监管和限制，鼓励民营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和债券，扩大民营企业融资渠道。

第三节、政府在中国云南省区位优势实现中的重要作用

政府在后发区域的发展中一般处于主导地位，并有“政府第一推动力假说”的说法。云南区位优势的实现经历两个转化：一是区位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二是低成本的初级竞争优势向高效率的高层次区位优势转化。在这两个转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

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来说，经济主体要持续获得较多的比较利益，有效的制度安排必不可少。只有产权明晰的制度安排才能促使经济主体具有比较优势提升的可持续性、交易效率提高的可持续性，由此比较优势才能顺畅的转化为竞争优势(如图 6.3 所示)。¹³¹

比较优势、交易效率和制度安排是影响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其中，交易效率的提高，不仅能发挥现有的显性比较优势，而且能将隐性比较优势显化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而交易效率提升依赖于有效的制度安排。

高效率的高级区位优势持续获得需要持续的知识创新因素，包括崇尚创新和竞争的区位文化推动、智力资本的积聚、鼓励创新的政策体系和能迅速促成知识创新成果产业化的企业集群(组织创新)。知识创新是区位优势的真正源泉，区位优势的生命周期的演进最终将受制于创新的力度。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将为区域持续创新的形成，为区域低层次的竞争优势向高效率的区位优势转化提供制度保证。这就是政府的核心任务，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方向。

¹³¹ 李晓钟：《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理论与实证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04页。

产业集聚的创新优势依托于其区域创新系统。产业集聚区域创新系统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技术知识、市场信息，与外界连成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的联合体，与供应商和客户保持良好的链接，从而保证研究开发、设计研制、制造工艺、生产销售的顺利进行。在云南这样一个知识创新环境并不优越的地区，政府要从长远战略角度出发，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辅之以市场机制，提供区域创新系统运转的有效制度安排，推动产业集聚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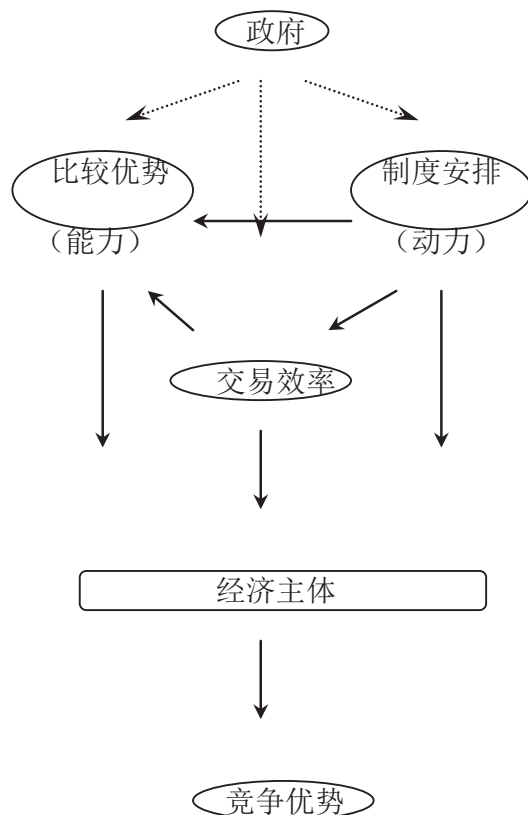


图 6.1 影响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区域创新系统是指在一定经济区域内与创新全过程相关的组织、机构和实现条件所组成的网络体系及其运行规律，由主体、环境和连接三个部分构成，具有输出技术知识、物质产品和效益三种功能。区域创新系统主要由参与技术创新和扩散的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地方政府组成，并有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广泛介入和政府适当参与。

区域创新系统不同于国家创新体系，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具体化。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结构有以下几大部分组成：①区域技术创新；②区域知识创新；③

区域人才创新；④区域观念创新；⑤区域制度创新；⑥区域产业创新；⑦区域政策创新；⑧区域市场创新；⑨区域管理创新。如图 6.1 所示。¹³²

在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中，企业是区域创新的主体，大学（研究机构）是区域创新的源泉，中介服务机构是区域创新的桥梁，而政府在区域创新发挥着航标灯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政府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机制就是通过它对于技术创新活动资源配置的影响来改变技术创新的速度、方向和规模。但是，政府也增加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政府有效地干预技术创新体现在两方面，即技术创新障碍排除的有效性和资源分配的有效性。换句话说，政府只能间接地参与技术创新活动。它一方面通过改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来营造创新的硬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在实施政策、计划、规划、法律法规等宏观措施的过程中，使自己由直接的干预者转变为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信息环境的建设者，进而影响着或引导技术创新的直接参与者（大学、企业、研究机构等）进行创新活动。¹³³

为适应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必须从新的视角去考虑区域竞争优势的获得，这样才能使区域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继续创造或保持区域不懈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

首先，政府直接参与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的建设和经营，以纠正市场机制失灵。公共物品是存在巨大外部经济效益的产品和服务，然而由于产权界定困难或是市场交易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等原因，政府效率导向型的提供公共产品可以提高市场交易效率。尤其是在云南大通道建设重点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为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提高市场交易效率等采取的软措施。此外，一个国家要从生产要素中获得竞争优势，重要的是要有一套能持续提升生产要素的机制，这就要求政府要重视教育、培训、技术创新和吸引省内外人才的优惠政策。

在这里，笔者就云南开发省内外人才资源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对云南来说，要重视两类人才的利用，一是云南籍在外省求学而要返回云南工作的大学生，二是非云南籍在云南求学而要留在云南工作的大学生。对于前者，人们都说云南人是“家乡宝”，这些通过优异成绩考入省外重点高校的毕业生首先想到的是回云南看看能不能找到工作。在人才交流市场，这个群体太大了，也给本省高校的毕业生形成一种压力。然而，他们的就业状况并不理想。很多毕业生为了能留在云南，学非所用，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还有一种情况是，用人单位一看是省外重点高校的拒绝接受，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小单位“养”不起你。笔者以为，这些毕业生不能说比云南高校的毕业生优秀很多，但至少他们走出云南，见了世面，现在云南缺的就是这种有开放意识的人才。后者，主要是

¹³² 方创琳：《区域发展战略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72页。

¹³³ 方创琳：《区域发展战略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74页

研究生这一群体。他们在省外受的教育，不排除有一部分来云南读研究生是投机性的。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愿意留在云南发展的，因为这里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平台，没有像北京、上海等城市存在严重的地域歧视问题。对于这两类人才，政府部门的眼光应该放长远一些，通过各种措施，增加人才储备。既然云南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服务平台，对有助于推动云南和东盟各国合作的就业岗位、就业政策一律给予优惠，为这两类人才以及云南人力资源的开发创造良好的环境。此外，在云南面向东南亚和南亚的对外开放中，需要一所专门性的对外经贸高等院校。这样的一所高校首先必须是国际化的，完全采用国际化学校的运作模式，采用全英文授课，以小语种为专业语言，直接服务于云南甚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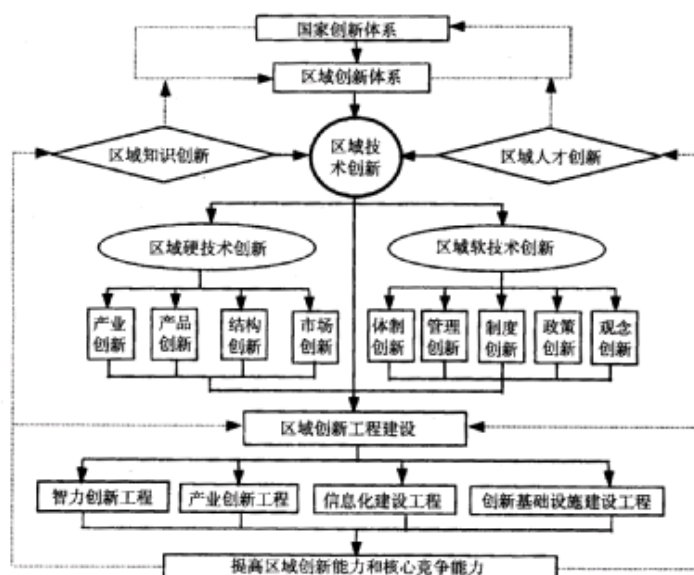


图 6.2 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框架示意图

其次，积极服务于企业“走出去”的制度措施。政府从两个层面服务于企业对外投资，一是从宏观上，通过与投资对象国政府达成政府间的多边经贸协定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企业在东道国的正常经营和正当利益提供国际保障；二是在微观层面上的支持。主要体现包括为企业对外投资做好咨询服务工作和提供金融上的支持。目前我国已与次区域五国签订了保护贸易和投资的框架协议，在框架协议的保护范围内，企业的合法经营权利得到保障。企业“走出去”可考虑四个重点：(1)在国外投资建设国内有短缺趋势的战略性资源和初级产品；(2)投资开发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3)投资云南省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4)通过对外投资寻求建立国际区域信息网络、商业咨询中心以及一些生产环节和研发机构。

政府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财政金融方面的优惠政策。在财政税收方面，对“走出去”的企业实行国外收入阶段性免税，以加强资金积累。在金融方面，以优惠贷款或适当放宽信贷额度，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适当放宽企业海外融资限制，并实行短期外债余额管理。在信息服务上，政府应在快速传达国家最新外贸政策的同时，努力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向企业提供国际市场供求信息、次区域各国和各行业的贸易环境信息、产品标准和市场准入认证信息等。

第三，努力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但是在市场行为主体的具体运作中，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通过法规性制度建设为公平竞争环境的创建奠定基础。政府应该从两个方面努力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1)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上，打破地区保护主义的地方封锁，使“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化。在中国，表现为行政区区际间的经济摩擦造成的经济割据现象。这种割据造成国内贸易极低的交易效率，不利于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也就制约着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转化。所以说，当前我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仍不能说是贸易强国。因此，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向“行政区经济”的转化，将是今后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方向。(2)进一步放开外贸经营权，支持中小企业扩大对外投资，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次区域合作，也就是打破政府的行政垄断行为。建立完善非公有制经济服务体系和融资担保公司、信用担保机构；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参加基础设施建设及兴办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和中介机构等服务业；加快自身和技术创新，增加科技投入，调整产品结构；完善规范合作机制，形成有利于中小企业、非公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第四，通过产业发展政策，构建区域优势。以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在比较优势基础上产生的产业部门，一般都能够成为主导产业，主导部门的产生是比较优势作用的结果。政府在区域优势的构建中，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安排：一是对主导产业及相关产业的政策扶持；二是对主导产业的空间布局。政府的产业政策干预源于市场失灵，产业发展的目标和过程是对各产业的非均衡协调发展。因此，政府在产业政策执行的具体过程中，应有所侧重，全面协调。政府应该侧重于确定并壮大主导产业，扶植新兴产业的成长。因为市场规则并不必然的支持这些微小的未来主导产业的快速成长，政府的扶植可以防止这些新兴产业被市场竞争扼杀在幼小阶段。同时，由于产业具有自身的生命周期，对那些将要成为衰退的产业以及资源型城市要进行及时的结构调整。以三大经济走

廊的建设为契机，以云南经济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通过主导产业以及相关产业链的选择和扶持，构筑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云南产业发展格局。

第五，优化云南的法制环境框架。实施国际大通道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环境改造工程”，这其中又以营造和优化良好的法制环境至关重要。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成功经验表明：完备的法律体系和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吸引外资的关键因素。云南“双向桥头堡”的通道优势，使得云南的对内对外投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良好的法治环境对改善云南的投资环境起着关键作用。在 WTO 规则的框架内，结合云南的特殊情况，充分利用各种合理的投资倾斜措施，建立比较稳定、统一和系统又具有一定灵活性的云南省投融资法律法规体系。要兼顾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和吸引外资以及内资两个方面的法制保障。

结语

基本结论

通过运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结合政治经济学、博弈论、经济地理、空间经济学，开放宏观经济理论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贸易效应、直接投资效应、增长效应，收入分配效应以及产业聚集效应等现象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着重研究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为进一步探索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研究，实现对外开放经济走廊战略与桥头堡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思路，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属区域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交叉应用性研究。文章从合作的基础、动力机制、发展组织形式、合作的重要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二）亚洲开发银行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其倡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次区域最重要的合作机制，也是中国参与次区域合作的主要载体。

（三）“东盟意识”，具体表现为“东盟方式”，除了影响到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外，对次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也产生重要影响。它是次区域合作意识形成和巩固的重要基础。

（四）作为松散的国家间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终极目标，由于东方文化的特殊性，不可能完全形成像欧盟一样的组织形式。而且，次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在进行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是次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两大战略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将丰富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内容。

（五）大湄公河次区域六方按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三个层次：泰国处于第一层次，越南和中国云南省处第二层次，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属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属第三层次。泰国是次区域其他国家吸引外资的重要对象。在此区域范围内，可以形成“次区域投资循环圈”，推动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完善和经济的发展。当然，我们不能静态的看待发展的三个层次，通过发挥后发优势，次区域各方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

（六）战略利益观是中国（云南省）参与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指导观。

（七）面对次区域其他国家所具有的低成本劳动力比较优势，云南和国内其他省份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独特的区位优势，处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

结合部的中国云南省，推进经济走廊战略和桥头堡战略，既是突破“马六甲困局”的需要，也是把空间区位优势上的区位比较优势向高效率的区位竞争优势转化的现实选择。

主要创新

作为一篇应用性的研究论文，文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可能的创新和贡献之处有：

（一）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丰富南南型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内容。

（二）构建了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理论的框架体系，探索国家间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是文章在理论上的主要创新之处。

（三）将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应用于区域优势的分析之中，探寻区位优势实现途径。文章指出传统的比较优势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静态的比较利益，要获得现实的区域比较利益及持续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必须在充分发挥现有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向更高层次的区位优势转化。

（四）除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外，亚行还倡导了中亚经济合作，再加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倡导的图们江流域开发合作等，这些都涉及到中国与周边的区域经济合作。作为现阶段比较成功的次区域合作形式，通过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以及提出国内的对策性发展思路，可以为中国参与其他次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提供借鉴。

（五）此外，文章还提出了以下一些基本观点：

1. “东盟意识”的形成和扩展对次区域合作意识的形成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东盟意识”抑或“东盟方式”为次区域合作意识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思想保证。

2. 文章认为，推动次区域合作的经济基础力量存在内在缺陷，真正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动力在于：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强烈的合作愿望和泰国的推动作用。

3. 亚行的目标宗旨和次区域的区情决定了亚行应发挥主导作用。

4. 文章指出，诸如“次区域共同体”、“东亚共同体”、“亚洲共同体”等目标都不能完全按欧盟的发展形式来运作，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强烈的民族性格决定着亚洲的“共同体”目标和欧盟的不一样，我们要在实践中探索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组织形式。此外，由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薄弱，现阶段次区域合作属于松散的国家间合作。但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范围内，次区域合作同时在进行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文章认为，国家间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两种性质不同的合作形式同时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出现，是次区域面临的重大问题。这种开拓性跨越式发展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5. 文章提出战略利益观是中国（云南省）参与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

济合作的基本观，同时应成为此区域各国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进行利益协调的基石。

6. 基于后发优势基础上的空间区位优势是中国云南省的绝对优势。经济走廊建设、“桥头堡”建设是云南实现自身发展的基础。

7. 交易率是区位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关键因素：产业聚集的形成和发展是低成本区位优势向高效率的高级区位优势转化的重要条件。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由于笔者学识资历的限制，对区位经济一体化理论框架的构建，尤其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理论的综合运用还有提升的空间。论文对空间技术手段——“3S”技术的运用还不够，对产业聚集的空间分析上还不够直观，这也是今后论文努力的方向。论文中使用的调查参考的数据时间跨度较大，加上研究途中发生比较大的国际国内事件（如世界经融危机，国内领导人换届等），导致某些阶段的数据不具备说服性和参考价值，所以没有使用，使得论文看起来某些地方的数据相对陈旧，也是未来可以提高改进的地方。

参考文献

ADB: *The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Article 1, www.adb.org

Amjadi ,Azita ,and L. A. Winters: “Transport Costs and “Natural” Integration in Mercosur” ,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Vol. 14, 1999

Aiim El-Agru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rgration*, London, 1988, second edition

阿米塔·阿查亚 《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安树伟 《“十二五”时期的中国区域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5

Baldwin, Richard E. Adomino: “Theory of Regionalism” ,NBER Working Paper, No. 4465, 1993

Baldwin, Haaparanta and Kiander, eds. :*The Domino Theory of Regionalism in Expanding Membership of the European Un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Burisher M. E. Robinson S. and Thierfelder K. : “Regionalism Old and New, Theory and Practice”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griculture Policy Reform and the WTO: Where are We Heading?* June

白恩培 《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云南日报》2009年12月21日

Bela A. Balass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rgr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65

Bela Balassa: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blems and Issu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May 1963

《巴厘第二协议》2003年10月7日

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国际经济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版

彼德·罗布森 《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中译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年版

Chang, Won and L. Alan Winters: “How Regional Blocs Affect Excluded Countries: The Price Effects of MERCOSUR”,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Vol. 92, 2002

Cooper, C. A. and Massell, B. F. :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Customs Un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3, 1965

曹云华 《东南亚国家联盟：结构、运作与对外关系》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1

茶洪旺 《区域经济理论新探与中国西部大开发》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6

陈映 《论共同富裕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 人民出版社 2011.4

陈保江等：《云南正积极构建面向东盟现代化物流信息平台》[N]. 云南日报, 2007-7-24。

陈自芳 《区域经济学新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7

Devereux M. and Lapham B. : “The Stabilit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9, No. 1, 1994

东盟秘书处 《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报告》（英文版）

《东南亚经济运行报告（2008）》，2008年10月

丁文丽 《大湄公河次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理论、基础与对策》 人民出版社 2009.2

Fernandez, R. J. Portes: “Returns to Regionalism :An Analysis of Nontraditional Gains form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2, No. 2, 1998

Frankel, Jeffrey and Wei Shangan: “Trade Blocs and Currency Blocs”, *NBER Working Paper*, No. 4335, 1993

方创琳 《区域发展战略论》 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付晓东、胡铁成 《区域融资与投资环境评价》 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版

宫占奎 《2011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10

古小松 《中国—东盟知识读本》 2004年版

《广西“东盟热衷的冷思考”》 新华网广西频道 12月11日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2004 年 7 月 29 日

《共建和谐“花园”，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新思路》[N]. 人民日报, 2006-10-27.

何大明 《澜沧江水电开发对怒江开发的启示》 绿家园志愿者整理, 转自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 2003 年 11 月 6 日。

贺圣达、王学鸿、宫占奎等 《CAFTA 建设与云南面向东南亚开放》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8 月版

贺圣达 《21 世纪初云南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 载《思想战线》 2004 年第 2 期

韩越 《东南亚南亚商务环境概论》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

洪昆辉 《大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与三条经济走廊》 载《中国软科学》 2004 年第 10 期

John Funsto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001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2007. 9

Johnson, H. G. : “An Economic Theory of Protectionism, Tariff Bargain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Customs Un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3, 1965

江小涓等 《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III》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

Kemp M. and H. Wan: “An Elementary Proposition Concerning the Formation of Custom Un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6, No. 1, 1976

Krugman.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ci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9, 1991

Kindleberger C. P.: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1, 1996

L. Alan Winters and Chang Wo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mport Pri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51, No.2, 2000

- Lipsey, R. G: “The Theory of Customs Unions: A Survey”, Economic Journal, Vol. 70, September, 1960
- Lipsey, R. G: “The Theory of Customs Unions: Trade Diversion and Welfare”, Economica, Vol. 24, 1957
- 李克 《适度差距与系统优化：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李平, 陈耀, 郝寿义 《中国区域经济学前沿 (2010/2011) : “十二五” 区域规划与政策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 5
- 李启昌等: 《“十一五” 我省口岸建设将展现下辉煌》 [N]. 云南日报, 2007-8-14。
- 李晓钟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理论与实证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版
- 李兴江等 《中国区域经济差距与协调发展: 理论. 实证与策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4
- 李众敏: 《中国区域贸易自由化战略研究》, 《世界经济》2007 年第 2 期
- 刘斌 《产业集聚竞争优势的经济分析》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版
- 刘方、张立韬 《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 1 月
- 刘稚 《东南亚概论》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 刘稚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研究》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9
- 卢正惠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与模式》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1
- 卢漪、贺友华、汤健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域探讨》 载《经济问题探索》 2004 年第 1 期
- 陆大道, 樊杰 《2050: 中国的区域发展: “中国至 2050 年区域科技发展科技发展线图” 研究报告》 科学出版社 2009
- 陆荣飞等: 《中国—东盟“两会” 成果丰硕》 [N]. 中国贸易报, 2007-11-8。
- 陆玉麒 《区域发展中的空间结构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Press,1920(1890)

- Michael Frenkel and Thomas Trauth: “Growth Effects of Integration among Unequal Countries”, *Global Finance Journal*, Vol. 8, No. 1, 1997
- Meade, J. : “The Theory of Customs Union”, North-Holland Amsterdam, 1955
- 孟庆红, 罗宏翔, 武友德 《桥头堡战略背景下的滇南经济发展研究》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11
- 门洪华 《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Perroni, C ,Whalley , J. : “New Regionalism :Trade Liberalzation or Insurance?” ,NBER Working Papei, No. 4626, 1994
- Peter Robson, *The E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London, 1991
- 裴王月: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受益巨大》, www.cafta.org.cn , 2004 年 11 月 30 日。
- <泰>素帕猜·巴尼巴滴和<美>马克·克利福德: 《中国重塑新世界》,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年版。
- 秦光荣 《桥头堡战略对云南具有划时代意义》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 年 6 月 20 日
- Richard E. Baldwin, Anthony J. Venable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Gene M. Grossman and Kenneth Rogoff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III.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1995
- Rivera-Batiz, L.A. and Xie, D. : “Integration Among Unequal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23, 1993
- Samson, Ivan and Greffe, Xavier: “Common Economic Space: Prospects of Russia-EU Relations”, *White Book, Russian-Europea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Moscow, October 2002
- Schiff, M. :Will the Real “Natural Trading Partner” Please Stand up?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Department Press, 1999
- Soaniely Andriamannanjara, Maurice Schiff: “Regional Co-operation among Microstat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9, No. 1, 2001

Soloaga, Isidro and Winters, Alan L.: "Regionalism in the Nineties: What Effect on Trade".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2183, 1999

Summers, Lawrence H. :Regionalism and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I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rade and Currency Zones, Federal Reserve Bank Press, 1991

塞缪尔·亨廷顿等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

尚国骥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试验田：早期收获计划》 《国际商报》2005 年 8 月 2 日

商务部 文件号“2003 年第 81 号”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

商务部 《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04 年修订）》 2004 年 8 月 3 日

商务部、外交部 《关于发布〈对外投资产业导向目录〉的通知》 2004 年 7 月 8 日

石大安 范全欢 《乡镇经济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10

舒庆、周克瑜 《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版

T. Scitovsky: *Economic Theory and Western European Integ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Tinbergen, Jan: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Suggestions for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Press, 1962

谭晶纯，谢炜 《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新目标振奋人心》 《云南日报》 2009 年 12 月 13 日

唐邦勤 《云南省投资环境的综合评价与优化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2000 级硕士论文 2003 年 6 月

托利等 《区域性贸易协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定期出版物 第 93 期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3 年版

Venables A. J.: "Equilibrium Locations of Vertically Linked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6

Victoria Curson, *The Essential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4.

Viner J. : *The Customs Union Issu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ress, 1950

Wonnacott, Paul and Wonnacott, Ronald: "Is Unilateral Tariff Reduction Preferable to a Customs Union? The Curious Case of the Missing Foreign Tariff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1, No.4, 1981

汪碧瀛 《当代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8.8

王必达 《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王定一 《区域营销—招商引资新说》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2年7月版

王勤 《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特点与前景》 载《南洋问题研究》 2003年第4期

王丽娅 《泛珠九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6

王子昌 《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与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

韦嗨鸣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经济整合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12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3月5日，新华社发。

温家宝：《在第十一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N]. 经济日报，2007-11-21。

吴红缨. 陈勋儒 《将云南建设成为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年3月8日

吴综之 《中国：全球经济中日益重要的角色》

小道清【日】：《对外贸易论》，周宝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熊义杰 《区域经济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1

杨武 《当代东盟经济与政治》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9

易小淮 首届中国商务发展论坛发言词 2004年11月27日

严汉平 《区域协调发展：大国崛起的必然选择》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12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5月版。

杨宇白、史爱萍：《积极应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J]. 经济问题探索，2002，（12），此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城市经济：区域经济[J]. 2003，（3）全文转载。

杨宇白：《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前景分析》[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1）。

杨宇白：《广西和云南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抢占先机的思考》[J]. 桂海论丛，2003，（3）。

杨宇白，胡矿：《次区域合作中云南贸易与投资战略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2004，（4）。

《云南省促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五年计划》（2004—2008）

《云南统计年鉴》（2006）

《云南桥头堡战略凝聚着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各级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深情关怀 鼎力支持》《云南日报》2011年5月31日

曾珍香，张培，王欣菲 《基于复杂系统的区域协调发展：以京津冀为例》 科学出版社 2010.2

赵伟 《中国区域经济开放：制度转型与经济增长效应》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5

赵永利、鲁晓东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作》 载《国际经济合作》 2004年第1期

赵银亮 《聚焦东南亚：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12

张彬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比较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0.6

张明之、乔蔚虹 《基于区位优势的产业竞争力：整合与升级》 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4年第3期

张平 《2011 国家西部开发报告》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8

张伟 《后发优势与贸易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

张小蒂 《国际投资导论》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学：“十二五”时期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1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2001 年 11 月 6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人民日报》，2011 年 3 月 18 日

《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

周鹏 《区际经济协调发展与管治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5

周起业等 《区域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朱启贵 《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http://www.gx.xinhuanet.com/dm/2009-01/20/content_15501771.htm

<http://news.sohu.com/20070714/n251055942.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1/22/content_10700948.htm

<http://www.cafta.org.cn>

<http://news.eastday.com/c/20081029/u1a3947030.html>

<http://www.gxradio.com/2006caexpo/index.asp>

<http://www.166.cn/html/2006/01/11/3550.htm>

http://www.gxzf.gov.cn/gxzf_gxdm/gxdm_jckmy/jckmy_zgdm/200812/t20081205_94828.htm

http://www.gov.cn/zwjw/2006-01/09/content_1524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86170.htm>